



主编：卫任泉

编辑：《零八宪章》月刊编辑部

《零八宪章》网站：

<http://www.2008xianzhang.info/>

《零八宪章》论坛：<http://taolun.info/>

《零八宪章》签名信箱

xianzhang2008xianzhang@inbox.com;

xianzhang2008@aol.com

零八宪章
CHARTER 08

总第 6 期

2009年12月8日

《零八宪章》一周年纪念特刊

目 录

【卷首语】

从宪章共识到宪章运动

张祖桦

【零八宪章】 文 本

【焦点事件】

- 1 《零八宪章》第十七批签名人正式名单（309人）
- 2 致所有《零八宪章》签署人的倡议书
- 3 “中国零八宪章签名人全体”荣获第23届杰出民主人士奖
穆文斌
- 4 请你们记住一个中国名字——刘晓波
高 瑜

【本刊首发】

- 1 《零八宪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杨 海
- 2 从宪章文本到宪章行动
陆克武
- 3 关于宪章文化运动的思考
张鉴康
- 4 普世价值与《零八宪章》——与钟哲明教授商讨
王德邦
- 5 我们是驯兽师——写给《08宪章》的签署者
陈 西
- 6 《零八宪章》公布一周年网络研讨会
——部分湖南籍联署人发言汇编
张善光/马 萧
- 7 这一年，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李德铭/黎建军

【宪章论坛】

- 1 专政必亡，宪政必兴
于浩成
- 2 《零八宪章》：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里程碑
欧阳懿
- 3 《零八宪章》往何处去？
张 辉
- 4 弘扬普世价值，反击御用教授钟哲明
张 辉
- 5 《零八宪章》不是什么？
洪哲胜
- 6 维权之脚与宪政民主运动之脑
陈 卫
- 7 宪政民主：民主的系统工程
陈 卫
- 8 支持刘晓波
陈子明
- 9 从柏林墙到《零八宪章》
楚江风

- | | |
|------------------------|-----|
| 10 中国大陆人权理论的三大误区 | 胡显中 |
| 11 百年梦想与“自由力量”的觉醒 | 牟传珩 |
| 12 从学术角度看《零八宪章》 | 綦彦臣 |
| 13 从《零八宪章》看未来中道联合的可能 | 王光泽 |
| 14 零八宪章，君子之光 | 夏 明 |
| 15 中国民主进步缓慢，乃因现实的三个不够 | 宣昶玮 |
| 16 《零八宪章》与中国民主化的条件 | 杨 光 |
| 17 由二十年民间抗争谈《零八宪章》的意义 | 杨宽兴 |
| 18 从柏林墙到《零八宪章》 | 楚江风 |
| 19 《零八宪章》——自由社会的基本“常识” | 易 尧 |
| 20 终将穿破专制黑云和物欲阴霾的精神光芒 | 张世航 |
| 21 《零八宪章》：中国人普遍性身份的宣言 | 陈奎德 |
| 22 《零八宪章》与我的“爱情” | 赵常青 |

【卷首语】

从宪章共识到宪章运动

张祖桦

一年前的12月9日,303名中国各界公民联署发布了震撼世界的历史性文件——《零八宪章》。宪章文本充分表达了中国公民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共和的坚贞不屈的信念和申张公民各项基本权利的鲜明诉求,从而揭开了中国人权与民主宪政史上的新篇章。

一年来,宪章在中国公民社会引发的反应空前强烈,参加实名联署的公民超过万人,签署人遍及各个领域与各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到工人、农民、市民、维权人士、法律工作者、基督徒、佛教徒、穆斯林、民主党人、共产党员、体制内的官员……,从风华正茂的中学生到耄耋之年的老人家,覆盖面之广泛为多年来所罕见。至于虽未参加签署但表示认同、支持宪章内容的人则更是为数众多,难以计量。中国公民以各种方式在互联网(民间网站、网络社区、博客、QQ群、聊天室)和民间论坛、研讨会、沙龙甚至是公开的课堂上对宪章展开讨论,其热度为多年来所罕见。宪章发布后的第一个月就被超过30万个网站和个人博客所转载和引用。Google搜索“零八宪章”一度达到34万5千条,“08宪章”更高达100多万条。特别令人感到鼓舞的是,宪章的影响正日益向社会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公民延深,并成为伸张权利,争取自由,要求民主,落实宪章的公民运动的政纲。

官方对待《零八宪章》显得过度恐慌和手足无措,宪章尚未发布就抓捕了刘晓波,传唤了张祖桦并查抄了他的家产。宪章发布后,当局把宪章的签署人一律视为敌对分子,并动用大量警力进行打压,对签署人展开全国性的传唤、讯问、查抄、监控与软禁。刘晓波博士已被关押一年并面临被起诉和判刑的前景。由于害怕宪章的传播,当局不仅严禁平面媒体报道《零八宪章》,而且对互联网进行全面管制,凡是涉及“零八宪章”或“08宪章”的字眼一律在网上过滤掉。同时,在官方媒体如《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瞭望》杂志上,组织了一批御用文人以社论、评论的形式批判《零八宪章》和普世价值。可笑的是,这些文章字里行间明明是在批宪章却无人敢提《零八宪章》;迄今为止只有一位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的原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长钟哲明先生在内部报告中指名道姓地大批特批《零八宪章》,其观点虽荒诞不经,但勇气倒是值得肯定。此一现象足以证明官方御用文人和写作班子的底气是何等的匮乏。

《零八宪章》之所以受到中国公民的普遍认同与欢迎,并非是由于它自我宣示“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也不是由于它有什么神奇的魔力,而是因为它喊出了中国公民的心声,表达了中国公民的真实诉求,描绘了实现自由、民主、宪政的蓝图,是质朴无华的中国公民权利宣言。它将如同英国1215年大宪章、美国《五月花号公约》和《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捷克《七七宪章》一样,在本国民主宪政史上发挥重要作用,产生深远影响。

宪章在国际上同样产生了强烈反响,国际上各大主流媒体都对之做了专题报道。2008年12月

19日，捷克共和国前任总统、《七七宪章》的主要发起人瓦克拉夫·哈维尔在《华尔街日报》上以《中国的人权捍卫者需要支持》为题专门撰文声援《零八宪章》。文中指出，“中国政府应当汲取《七七宪章》运动的教训：恐吓，开动国家宣传机器，以及镇压不是理性对话的替代品。只有立即无条件地释放刘晓波才能显示北京已经从《七七宪章》的经历中学到了教训。”

今年3月11日，哈维尔亲自将捷克 people in need 基金的 Homo Homini 人权奖颁予刘晓波及全体《零八宪章》签署人。颁奖词中写道：“每年，我们（People in Need）都会将 Homo Homini 奖颁给那些为人权、民主事业和非暴力解决政治冲突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士。08 年度的 Homo Homini 奖颁给刘晓波先生，一位系狱的中国知识分子、政治抗议者、《零八宪章》首批签署者之一（其他签署者与刘晓波先生一同获奖）。”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崔卫平教授、徐友渔先生和著名维权律师莫少平先生代表《零八宪章》签署人参加了颁奖会。

今年11月14日，在美国注册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举办的第23届杰出民主人士颁奖典礼在美国旧金山孙中山纪念馆隆重举行，“中国零八宪章签名人全体”荣获该奖。中国和解智库大陆召集人、冲突与和解网主笔王光泽先生和著名维权律师江天勇先生代表《零八宪章》一万多名签署人领奖。会后还举行了“零八宪章与维权运动前景展望研讨会”，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著名汉学家林培瑞教授、纽约市立大学夏明教授、《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等人在会上做了精彩讲演。

《零八宪章》的历史意义和强大生命力必将会在中国民主转型的过程中逐步展现出来。林培瑞教授在研讨会的发言中指出，“今年是德国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零八宪章》是推倒中国‘柏林墙’最重要的武器，其历史地位可以等同捷克《七七宪章》。《零八宪章》的根源没有国界，这是最根本的国际普世价值。《零八宪章》的语言是借的国际普世价值观点，但其最重要的作用是将来，是指导中国走向民主化的重要纲领。”

从起草者和发起者的立意来讲，我们的愿景是：第一、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当下的现实及未来的发展目标，提出公民社会的（总体性的）愿景和建议；第二、鲜明地表达中国公民社会对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法治、共和、宪政这些普世价值和制度安排的坚定认同与努力追求的基本原则立场；第三、对待专制不能总是停留在道德批判与义愤声讨的水平上，需要提出理性和建设性的改变现状的具体目标和原则主张，供人们在实践中加以参照；第四、对于如何妥善解决社会政治转型中的疑难问题，尽可能降低转型的代价与成本，实现转型正义与社会和解，提出可供参考的思路；第五、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预先为未来的自由民主中国提出立宪原则，指出一个大体的方向和轮廓，供各界有识之士深入思考和讨论，以期早日达成共识，形成预案；宪章虽然不是宪法，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宪章中阐释的宪政、民主、共和、法治、保障人权和联邦制的原则却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的制宪原则与立法原则；第六、在宪章共识的基础上逐步集结社会力量，形成持续不懈的公民运动，直至最终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制度。

美国政治学大师亨廷顿在《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指出：在世界范围内出现过三次民主化长波。第一波起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始于 1828 年，前后持续了约 100 年，其成果是 30 多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第二波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的占领促使民主制度在西德、意大利、奥地利、日本和韩国建立，之后波及到拉美亚非诸国。这一波大约持续了 20 年，又有一批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第三波始于 1974 年的葡萄牙政变，实现了由

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而后希腊和西班牙也转向了民主。随后波及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前殖民地拉丁美洲，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拉丁美洲的威权政治一个接一个地垮台，让位给民主。其后涌进亚洲，韩国、菲律宾和台湾开始了向民主的过渡；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这股民主化浪潮已足够强劲，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有数十年历史看似非常坚强的斯大林模式被冲垮，这个地区纷纷转向议会民主；接下来，90年代初，多党民主风潮登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一批国家采纳了多党民主制度模式。甚至在中东伊斯兰国家，一向属于民主的沙漠地区，也受到了民主化潮流的激荡。从90年代后期直到今天，虽然民主化浪潮高峰已过，个别国家还出现了威权政治的回潮，但民主化浪潮仍然保持着它的强劲势头，包括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伊斯兰教大国、不丹这样的封闭落后的喜马拉雅山中的王国，都走向了民主。前些年，在中亚和东欧，一批已经采纳民主制度的国家相继发生了“颜色革命”，进一步推进了民主。

经过这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扫荡，当代世界政治格局已经根本改观。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和澳洲都已经是民主的大陆，非洲的权威主义政权成为民主化浪潮中的若干孤岛，在亚洲也有超过一半的国家实行了民主制度，世界上已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反观曾经盛行于一时的共产党执政的红色阵营，只剩下可怜的“一大带三小”——中国和朝鲜、越南、古巴还在强撑着，但也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日薄西山，人命危浅。

衷心希望《零八宪章》能够开启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不仅能推动中国的民主转型，而且能鼓舞其它仍处在极权政体或威权政体统治下的国家实现民主转型，建立宪政民主政体。网上的一段评论写得很好：“《零八宪章》不只是一份藏在博物馆的历史文件，而是一个行动纲领，是一个凝聚共识的旗帜；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进行时；不是已经结束，而是刚刚开始。”要把宪章建立起来的社会共识转化成源源不断的民主化动力，演变为持续不懈的公民运动，直到把中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纵观历史，物竞天择，大浪淘沙，沧海横流，大江东去，不禁令人想起曹孟德的千古诗篇：“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步出夏门行·观沧海》）

2009年12月9日

【零八宪章】 文 本

零八宪章

2008年12月10日公布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 60 周年,“民主墙”诞生 30 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 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 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 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改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埋葬了延续 2000 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 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 1997 年、1998 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 2004 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党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签署人：（略）

《零八宪章》网站：<http://www.2008xianzhang.info/>

《零八宪章》论坛：<http://taolun.info/>

【焦点事件】

《零八宪章》第十七批签名人正式名单（309人）

签名整理小组说明：“零八宪章”公布将近一年了。到此批公布的签名为止，签名联署“零八宪章”的人士已经突破一万人。

一年来，来自国内各地以及港台海外各国的签名以及前签名者真挚的留言，见证着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承担和关怀，常让我们感动不已。一年来，签名活动受到各种封锁、阻挠和打压，最初公布的信箱被破坏；或许还有相当的一些签名被拦截，因为到现在，依然有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告知他们很早就签名但至今未看到签名出现在公布的签名名单里。一些签名人士甚至受到国保人员的骚扰，约谈，恐吓，然而迄今为止，签名依然突破各种封锁陆续传达到我们这里。我们向这些朋友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的行为昭示零八宪章运动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因为它象征着中国人对自由的追寻，对权利的捍卫，它所涉及的问题，是所有真正关注中国前途命运者都必然会关注的，牵涉到每个公民乃至我们子孙后代的幸福。

从参与起草到参加联署“零八宪章”的各界朋友，大概没有什么人会认为“零八宪章”是一个绝对的律令条文，显然它更不是中共那种不容置疑的指令文件，它只是一个凝聚了许多人回顾历史，观察当下，探索未来的思考结果的文本。只是为凝聚公民共识，开拓公民讨论空间，推动公民运动和社会变革而发布并存在。无论是就其具体内容还是主要观点，都欢迎各界朋友甚至官方提出批评，加以讨论，给与传播，以期使之更加完善，更好地体现变革期社会各方的观点和期待。遗憾的是，象在对待中国当下的许多问题上采取的鸵鸟态度一样，官方除封锁和打压零八宪章的传播和联署外，不敢也不愿正视“零八宪章”的存在以及其提出的有关中国未来的各种建言的合理性。而与此同时，却是中国社会各种危机性因素令人忧虑地进一步积聚。

在未来的一段时期里，宪章的联署者将继续本着理性和平和对国家负责的公民态度，与海内外各界朋友携手努力，推动中国的和平变革，探索解决中国各种危机的制度性途径，为中国人的权利保障和持久的幸福做出贡献。

一年来，一些与“零八宪章”相关的杂志网站论坛陆续开通创设，关心的朋友们可以加以注意，登入 <http://www.2008xianzhang.info/>，了解相关信息。同时，也请继续传播“零八宪章”及其签名信箱 xianzhang2008xianzhang@inbox.com；xianzhang2008@aol.com。此外，还要再次重申，因这些信箱有可能在有关人士的“关照下”失灵，为保险起见，签名的朋友也可登入网站察看签名信箱是否有变。关于这方面的信息，我们会随时在网上提供。

再次谢谢大家的支持，祝大家岁末安康！

张 林（安徽，作家）
端启宪（本名：陆恒宪 广西南宁 维权人士）
张田雨（泰国，自由职业）
莊曉陽（香港，記者）
Alison （台湾，上班族）
朱恒星（广西，学生）
赵展乔（香港，市民）
单春晓（四川，教师）
洪家泽（香港，学生）
黄志强（四川，遂宁 基督徒）
谢昀庭（台湾，学生）
Wong Tsz Chun（香港，学生）
楚岳锋（湖北 恩施）
马 俊（四川，遂宁公务员）
张 晶（湖南，大学生）
趙沛恒（香港，政府工作人员）
苏美雅（台湾 世新大学）
Lian Chung Ren（香港，摄影师）
李达仁（台湾，公务员）
马达德（北京，大学生）
吴豪人（台湾，辅大法律系副教授）
田 辉（四川 自由职业者）
Ka Ng（香港，文员）
李家齐（台湾，台大城乡所博士生）
邱伊翎（台湾人权促进会文宣）
华春辉（江苏无锡 民主人士）
王 纘（北京，自由职业者）
黄 波（上海，维权人士）
陈幼飞（美国 马萨诸塞州 软件工程师）
张 立（山东，自由人士）
谢宏伟（台湾，学生）
叶淑贞（香港，学生）
邱丽玲（台湾，CTS）
包维文（浙江绍兴，公民）
周若兰（香港，市民）
管新增（北京，自由撰稿人）
邱麗玲（台湾，社运工作者）
Hung Yuk Ting（香港，学生）
李鸿志（台湾，夏生一人大乐队）
余跃波（四川 职员）
郑怡玲（台湾，社会人士）
吴叡人（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助研究员）
王梦溪（山西，维权人士）

Kenneth Ng (香港, 市民)
曾 远 (成都维权人士)
赵元辉 (成都维权人士)
刘志男 (香港, 教师)
王雅慕 (台湾, 台大外文学生)
黄德伟 (香港, 市民)
张仲成 (香港, 工人)
许伟泰 (台湾, 自由作家)
Wong Ching Elizabeth (香港, 学生)
植超明 (香港, 文员)
饶朋友 (四川, 企业主)
尚书阁 (山东, 自由职业者)
苏瑞锵 (台湾, 政大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LEUNG MING CHO (香港, 学生)
李衍德 (台湾, 苏州 研究员)
陈子林 (香港, 社工)
吴荫强 (香港, 学生)
田赋奎 (河南, 维权人士)
Eric Scheihagen (台湾, 编辑)
李鹤婷 (台湾, 家管)
Leung Ka Ho (香港, 学生)
李继渊 (贵州, 公民)
江怡莹 (台湾 学生)
魏百谷 (台湾, 台俄协会副秘书长)
宣泽民 (甘肃, 职员)
许佩旻 (台湾, 成大学生)
SOPHIA TONG (香港, 学生)
林信真 (香港, 主妇)
陈冬冬 (无锡, 市民)
尤骏钦 (中国, 公民)
简素琤 (台湾, 明伦高中教师)
Hung Lai Sze (香港, 市民)
李昀真 (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学生)
陈家明 (香港, 市民)
吴佳臻 (台湾, 台湾人权促进会执行委员)
王晓琳 (四川, 自由职业者)
ERROL Hugh (香港, 建筑整治筑师)
曾仁全 (湖北, 作家)
赖文辉 (中山大学化学系学生)
刘广义 (上海, 维权人士)
王学界 (广西, 企业主)
黄帝颖 (台湾青年智库理事长)
廖福特 (台湾, 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员)

覃德文（广西，教师）
刘海滨（山东，维权人士）
梁礼全（香港，学生）
陳俊傑 Gordon C. K. Chan (香港，文员)
孔令瑜（台湾，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 干事）
许国隆（台湾， 社会服务人员）
庞翠怡（香港，市民）
袁 枚（湖北，公务员）
邝文海（香港，公务员）
利英台（台湾，高雄民生医院）
潘耀明（香港，商人）
FUNG WAI YING（香港，学生）
许雅筑（台湾，文化工作者）
何广志（湖北，企业主）
王小钰（浙江湖州 民主人士）
魏千峰（台湾，律师 魏千峰律师事务所）
宗颐先（四川，自由职业者）
萧恩婷（台湾，无职业）
Sam Lam（香港，学生）
杨文伟（山东泰安，公民）
陈 兵 (四川遂宁自由职业者)
简圣哲（台湾，台湾国办公室-王献极秘书）
Huey-Rong Chen（台湾，文化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
李文斌（湖南，企业职员）
金学灿（山东，维权人士）
吴佩珍（台湾，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
孔 杰 (四川遂宁公民)
王昭文（台湾，学生）
黄靖杰（台湾，国立台北大学社会工作学系）
李湘江（湖南，自由职业者）
谭荣禧（香港，市民）
刘嘉智（香港，市民）
沈志和（北京，教师）
吴京保（大陆，商人）
王振益（台湾，学生）
黄长玲（台湾，台大政治系副教授）
Laurence Leung（香港，公务员）
李素梅（香港，市民）
郭晋恩（香港，香港大学学生）
孙爱莲（香港，文员）
王颢翰（台湾，东吴大学人权研究所）
Daphne Yang（台湾，Individual）
李威宜（台湾，个人）

钟 山（广西，维权人士）
利佳玲（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潘丽兴（香港，美容）
黄晓海（北京，学者）
张有雄（香港，司机）
许皓淳（台湾，台大医学系实习医生）
上官良治（台湾，台湾大学国际企业学系学生）
沈 禹（芬兰，留学生，前解放军中尉）
高满峰（湖北，企业主）
宋 斌（香港，市民）
萧世正（台湾，工程师）
倪夏莲（河南，维权人士）
杨 建（香港，市民）
陈一君（上海，维权人士）
周泰然（广西，学生）
张力道（商人）
董健生（香港，市民）
Hsin-Huang M.Hsiao（台湾 Academi Sinica）
李怡桦（台湾，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学生）
郑凯文（台湾，台湾大学研究所学生）
杨尚群（湖南，教师）
陆恒宪（广西南宁，维权人士）
周楠森（湖南，作家）
庄骐瑞（学生 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
薛克昭（台湾，学生）
Tashi Tsering（台湾，Regional Tibetan Youth Congress）
洗子文（香港，市民）
陈标健（香港，学生）
姚混沌（上海，中学生）
罗舜文（香港，大学教员）
Kwan Wai Ki（香港，学生）
李盈萱（台湾，东吴大学学生）
郭保胜（美国 学生 作家）
周 睿（安徽阜阳，学生）
王雅萍（台湾，政大民族系讲师）
Chiang Shing Chun（香港，市民）
李介媚（台湾，图博之友会）
郑咏欣（香港，学生）
利佳儒（台湾，佳敬有限公司）
温静文（香港，美容师）
黄文佳（香港，市民）
李 定（湖南，维权人士）
许志伟（香港，学生）

Yvonne Liu Suk Han (香港, 教师)
毛秋雨 (北京, 公司职员)
黄暉翔 (台湾, 树德科技大学学生)
宋再民 (北京, 商人)
范文龙 (北京, 学生)
TO HEI LAM (香港, 学生)
许复钧 (台湾, 无业)
Yiu Ho Ying (香港, 学生)
段成功 (湖南, 教师)
王惠慧 (台湾, 新兴小区大学)
黄钰雯 (台湾, 编辑)
徐凌峰 (杭州 学生)
郑园艺 (上海, 维权人士)
冯柏林 (北京, IT 从业者)
沈建志 (台湾, 台湾师范大学学生)
黄国暉 (台湾, 台湾大学经济学研究所硕士生)
庄豪隆 (台湾, 怡仁基金会社工员)
蔡 浮 (香港, 市民)
Tasha sojinn (台湾, self employed)
江安中 (台湾, 现观科技)
陈 文 (香港, 专业人士)
姚凤霞 (湖南, 工人)
缪和平 (贵州, 公民)
William Mak (加拿大 Toronto Designer)
李瑞冰 (湖北, 教师)
郭俊文 (香港, 市民)
吴崇德 (台湾和平草根联盟理事)
肖 翔 (湖北恩施 学生)
Anna Cheung (美国 New York, Professor)
李世明 (台湾, 公共事务业)
赵晓春 (北京, 学生)
刘玉章 (成都 退役军官)
温继耀 (香港, 文员)
黄慧雯 (香港, 市民)
戴智诚 (北京, 学者)
Andie Cine ma (台湾, blogger 作者)
朱玉和 (香港, 市民)
赵 岩 (大连, 工程师)
鍾友全 (台湾, 台大历史所硕士班)
周 业 (香港, F5 学生)
祝平次 (台湾国立清华大学)
George Choi (台湾, 大学生)
李展华 (香港, 市民)

邵锦德（北京 工程师）
吴明章（台湾，社会工作者）
王 平（香港，商人）
黄璟迪（台湾，业务人员）
彭枫林（湖北，教师）
邓潮先（香港，市民）
冯传翔（湖北，教师）
沈宝莉（台湾，辅仁大学心理所）
黄国政（台湾产经建研社）
方约恒（香港，政府公务员）
蒋锡伯（山东，维权人士）
Tang Po Yi（香港，学生）
林季达（香港，市民）
黄家颖（香港，市民）
唐 给（湖南，自由职业者）
纪岳君（台湾，断境音像工作室）
ONG, Uika（台湾 个人）
李 猛（香港，工人）
郑诗颖（台湾，台大社工所）
吴孟容（台湾 高雄市第一小区大学课务专员）
唐 彬（北京，学生）
米 克（北京 软件工程师）
Jacky WONG（香港，设计师）
王信亨（台湾，四川师范大学学生）
郭毅然（上海，维权人士）
何莉莉（香港，学生）
李婉菁（台湾 台北作曲家）
翁伟涛（湖南，维权人士）
黄奕潏（台湾 NGO 工作者）
吴江河（湖北，教师）
梁凯旋（成都 维权人士）
谢明璟（台湾，台湾部落客协会）
Yau Yuet Chi（香港粉岭，市民）
樊俊朗（重庆 一年级政法大学生）
马战友（上海，维权人士）
孟春晖（广西，自由职业者）
苑志坚（湖南，大学生）
Marx Chen（台湾 世新大学法律系讲师）
柯欣欣（台湾，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干事）
银 夏（四川遂宁 自由职业者）
吴镇安（台湾，台湾大学）
石 婧（北京 艺术家）
Richard Chau（香港，教师）

李尚仁（台湾，中研院）
邱晃泉（台湾 郑南榕自由基金会董事长）
卓秀凤（香港，市民）
简 芃（台湾，阳明大学心智哲学研究所硕士班学生）
黄琬婷（台湾，个人）
彭克勤（湖南，大学生）
谢意天（湖北，自由职业者）
倪绰如（香港，学生）
沈学欣（山东，维权人士）
黄 伟（香港，公务员）
张文涛（内蒙古，失业）
董 彬（北京，工程师）
TANG KUI WAI（香港，学生）
林培元（香港，劍橋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生）
马 明（河南，学生）
江盈谊（台湾，台湾智库研究部专员）
魏龙达（台湾，东吴社会所）
容超明（深圳，学生）
吴沛忆（台湾，台湾大学政治系学生）
梁咏恩（香港 学生）
谢阿琴（台湾，爱上阅读美语补习班）
Ho Wai Chan（香港，主妇）
安静茹（河北，自由职业者）
洪庄丰（香港，市民）
郑晓超（上海，维权人士）
Stephen Jian（香港，CUHK,Hong Kong SAR）
张 瑞（北京 艺术家）
甄別離（廣東，文員）
陈香兰（香港，市民）
刘伯锐（北京，大学生）
李庭芳（香港，研究员）
范崇智（山西，维权人士）
黄怡碧（台湾，台湾国际医学联盟/项目协调人）
吴妍仪（台湾，自由业者）
林 华（河北，教师）
谢嘉汶（香港，顾问）
Dinn K. H（台湾 Taiwanese）
孔令安（湖北，公司职员）
沈 志（广州，公民）
郑亘良（台湾，中央英文所）
NG KAI WING（香港，货仓助理）
张家译（北京，离休干部）
王琬灵（台湾，台湾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陈启昌（香港，工人）
刘汉昆（美国 法律博士（J.D.）
李 晋（纽约，康奈尔大学）
萧锡惠（台湾，魔术师）
黄智圣（台湾，FOXCONN-ENGINEER）
周育明（香港，工人）
江廷振（台湾，政治大学法律学系学生）
邓逸轩（香港，学生）

零八宪章网站 <http://www.2008xianzhang.info/>

致所有《零八宪章》签署人的倡议书

尊敬的《零八宪章》签署人：

你们好！

从2008年12月9日《零八宪章》正式发布以来，已经有超过1万名各界人士，不畏强权，公开参与《零八宪章》的签名联署，使得《零八宪章》成为中国大陆最近20年来最重要的公民权利宣言。

令人不能接受的是，中共执政当局迄今对此攸关国家民族未来的重要建言不仅不做正面回应，反而通过其掌控的媒体，有明显针对性地大肆宣扬中国不适合民主选举、议会制、多党制、军队国家化等论调；同时暗中加紧行动，在《零八宪章》公布的第16天，突然动用一切技术手段，从互联网上全面封杀相关内容，只字不留。更令人愤怒的是，在《零八宪章》的签署和传播过程中，作为重要推动者的刘晓波先生被中共当局无理羁押并逮捕，命运未卜，而大部分签署人则被中共警察以各种他们自己也不肯公开的方式骚扰和威胁。当局的这些作法，是对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粗暴践踏，是对公民尊严的严重侵犯。令人感到鼓舞和欣慰的是，在专制体制的政治高压之下，迄今为止并没有任何一位签署者宣布退出签名，而《零八宪章》在严酷的封锁下，仍在网络世界继续传播，其所载明的普世价值和基本主张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认同。

在《零八宪章》即将迎来其发布一周年之际，在刘晓波先生依然被中共当局羁押的状况下，我们希望和全体签署者一起，来共同分享宪章追求自由，推进民主，捍卫人权，为民族未来勇于担当的精神，来共同承担签署宪章的庄严责任，特此发出这份倡议书，邀请所有《零八宪章》签署人和关心中国社会进步的公民们，一起参与进来，持续推动《零八宪章》更广泛的传播。为在中国实现民主转型打下理念基础做出努力。我们的倡议如下：

1、通过各种方式向您身边关心公共事务与社会进步的朋友介绍《零八宪章》，让他们了解宪章的内容，并鼓励他们向更多朋友推介，鼓励更多认同《零八宪章》的朋友参与签署。在《零八宪章》公布一周年之际，以向1到10位朋友宣传其内容或鼓励1名认同其内容的朋

友参与联署来纪念这个日子。

2、在日常交往活动中，主动、热情地和您身边的朋友交流和讨论《零八宪章》提出的理念，虚心听取他们对《零八宪章》的意见与建议。

3、对于那些在交流中持有不同意见的朋友，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鼓励他们参与讨论，收集和整理他们的意见，为《零八宪章》的充实与完善做积累。

4、利用商务出访、出游境外的机会，或委托出访、出游境外的亲友，留心购买在香港出版的《零八宪章》等书籍，访问志愿者建立的《零八宪章》网站，阅读《零八宪章》月刊，并对如何推进宪章运动提出建言献策。

5、请在自己方便的时候，写一篇博文或随笔、札记等，介绍、阐述《零八宪章》载明的理念，让更多的朋友与你分享；也可以用《零八宪章》的理念，分析中国社会现实，促进人们的思考。

6、请关注因为《零八宪章》而被当局逮捕的刘晓波先生和其他被各地警察骚扰、恐吓的宪章签署者，请以各种方式为刘晓波先生的自由展开呼吁，或者以自己方便的方式帮助、鼓励、声援身边的宪章签署者。

7、在适宜的时候，和您所在城市或周边的《零八宪章》签署人进行交流，相互认识起来，分享经验，分享对未来的信心。

各位朋友，今天，在官方刻意营造的“繁华盛世”的表象背后，是尽人皆知的各种危机因素和社会不满的积聚，本世纪已将跨入第二个十年，中国人为建设一个共和国而奋斗牺牲的辛亥革命也将届百年，遥想先贤，面对世人和后辈，我们更应感到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本着理性、和平、负责的态度，继续坚忍不拔地推进中国的自由、民主、人权事业，为使中国大地成为一个所有人都能自由生活并享有平等的机会和社会公正的家园而竭诚努力。

《零八宪章》部分签署人

2009年11月30日

“中国零八宪章签名人全体”荣获第23届杰出民主人士奖

穆文斌

2009年11月14日下午，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举办的第23届杰出民主人士颁奖典礼在美国旧金山孙中山纪念馆隆重举行，“中国零八宪章签名人全体”荣获该奖，中国大陆著名维权人士、北京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江天勇律师和中国和解智库大陆召集人、冲突与和解网主笔王光泽先生代表“零八宪章”运动一万多名签署人领奖，会后举行了“零八宪章与维权运动前景展望研讨会”。与会代表包括了周锋锁、蒋亨兰（女）、封从德、方政、陈奎德教授、夏明博士、林培瑞教授（美）、王希哲、郭平、郑存柱、郭保胜、穆文斌、伏虎等知名民运人士，为争取“回国权”的冯正虎在东京机场通过越洋国际电话连线发表了讲话。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自1987年在旧金山成立至今，长期致力于和平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自由人权事业。创始会长黄雨川先生，现任会长为前“六四民运”学生领袖周锋锁先生。历届“杰出民主人士奖”得奖人包括魏京生、刘宾雁、王若水、方励之、王若望、李柱铭、司徒华、王丹、柴玲、吾尔开希、王军涛、吴宏达、刘青、王希哲、丁子霖、柏杨、达赖喇嘛、王有才、鲍彤、卢四清、江棋生、辛灏年、刘晓波、杨建利、严家其、胡石根、高智晟、天安门三君子等民运知名人士。上届得奖人为“陈光诚、胡佳”，本届得奖人为“中国零八宪章签名人全体”。

2008年12月初，著名民运领袖、学者、作家刘晓波博士及无数中国各界著名人士为了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六十周年，以捷克的“七七宪章”为蓝本，发表“零八宪章”，反对一党专政，呼吁中共推动政改及保障自由与人权，并主张建立联邦共和制度，以平等、公正的精神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以高度的智慧来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体制，保障自由与人权，实施法治，和平推动中国的民主转型。

“零八宪章”发表后立即获得海内外的热烈反应及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但中共当局却迅速逮刘波。刘晓波在狱中度过半年多的艰难岁月，最近中共当局正式以“阴谋颠覆政府罪”控诉刘波。周锋锁表示，中共以言论及政治主张入罪刘波实是严重的违法事件，以违反中共所制定的保障言论自由的宪法。

周锋锁还认为，“零八宪章”是过去一年中国最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事件。他说，即使在中共残酷封杀打压之下，从北大教授到上访人士，从成功商人到中共党内开明派，纷纷公开表示对“零八宪章”的支持，这是“八九民运”之后唯一的一次全面社会动员。“零八宪章”发起人提出的主张确是非常理、务实的政治改革蓝图，获得无数海内外人士的认同，也是对民主运动的重大贡献。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纵览中国》网刊发行人兼主编陈奎德教授认为，“零八宪章”象历史上东汉“公车上书”、明朝“东林党”、1989年“六四民运”一样载入史册。“零八宪章”上万人签名人在争取中国人的基本权利和普世人权准则，同时也是中国民运“软实力”的体

现。他认为，中共在全球搞了二百多所“孔子学院”，我们有必要发起类似“老子学院”等的文化实体相抗衡。陈教授大胆预测，本世纪上半叶中国将转化成民主宪政国家，现在正是在过“长江三峡”，中国的民主宪政前景一定是光明的。

美国著名汉学家、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林培瑞教授表示，今年是德国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零八宪章”是推倒中国“柏林墙”最重要的武器，其历史地位可以等同捷克“七七宪章”。他认为，“零八宪章”的根源没有国界，这是最根本的国际普世价值。“零八宪章”的语言是借的国际普世价值观点，但其最重要的作用是将来，是指导中国走向民主化的重要纲领。

中国和解智库大陆召集人、冲突与和解网主笔王光泽先生认为，“零八宪章”的出台反应了中国人民追求宪章社会成熟的表现，该“宪章”考虑到了执政党的退路问题，提到妥协、和解和转型。他表示，近现代历史表明，专制政权一般不会超过80年统治时间，如中国台湾、韩国、菲律宾、印尼、前苏联、东欧各国等，他大胆预测中国走向民主化还在2019年-2029年，在中共统治80-90年发生。目前中国大陆由于互联网的兴起，中国上网人数为全球第一，网络上形成了网络政治组织、网络言论自由，网络力量强大，有利于民间维权运动。他表示，由于目前中共政治体制改革不彻底，改革越晚，发生革命的可能性越大，中共学习国民党和平过渡到民主政治是最好的选择。

纽约城市大学斯德顿岛学院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表示，中国几千年历史，都是大乱大治二元论，只有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下才能产生政治三维观，社会发展从无政府状态，过渡到专制体系，最后进入到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近二百多年产生的，是人类社会目前最好的社会政治制度。全球二百多个国家经过调查，四十多个国家是不自由的，中国是其中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民主制度建立一套竞争机制，民主的机遇比专制要强。

中国大陆著名维权人士、北京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江天勇律师是首先签署“零八宪章”303人其中之一，他认为“零八宪章”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5·12”汶川大地震、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爆发的历史时期出台的重要民主宪章纲领。在中国每天上百起群体事件、无数人上访无门、贫富差距日亦加大，“零八宪章”为中国争取民主自由人权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历史几千年轮回，现在我们要面对中共暴政，我们怎么办？是暴力革命还是体制内和平变革？“零八宪章”提供了一个和平变革进入民主制度的道路。

曾在中国南方为工人维权的民主人士郭保胜摘录了一些网络博客中有关宪章的有意思现象，表达了广大社会民众对“零八宪章”的支持，表明了“零八宪章”真是一个全民社会运动，得到了网络时代、国内外追求民主自由大多数民众的响应，如“喝茶”指“公安约谈话”，“县长”指“零八宪章”，“今天你县长了吗？”，“签署家庭”反应家庭全体成员对“零八宪章”的支持，著名艺术家艾未未的“勇敢才是浪漫”，北大法学院公开发邮件抵制“零八宪章”、张祖桦投诉公安不“敬业”，常熟公安购买刘荻08宪章文化衫等等，别具意味。

连续八次争取回国权、被中国拒绝入境的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滞留东京成田机场星期六（11月14日）已进入第11天，他通过国际电话对正在举行的第23届杰出民主人士颁奖典礼表示祝贺，他认为“零八宪章”是理论上作为中国维权争取民主人权的纲领文件，他本人连续八次争取回国权，就是要用行动来争取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回国权”，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政府禁止本国公民进入自己的国家，他指控了中国上海警方绑架他上日本航空公司飞机的违

法行为。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负责人穆文斌也表示，“零八宪章”充分反映很多人希望和平方式促使中国民主化的努力，在中国大陆所谓的宪法和法律下人民的权利是有限的，只能步步紧逼进行维权，用中共法律来维护人民的基本权利；但是，我们不能完全认可中共的法律体系，象中共这种流氓政权根本不遵守自己制订的宪法和法律，民运人士应争取有新的法律体系，“零八宪章”是新的法律体系纲领性文件和宣言。

2009年11月14日

请你们记住一个中国名字——刘晓波

高 瑜

11月17日是捷克天鹅绒革命胜利日，被捷克共和国定为「国家民主自由日」，在二十年前革命的发祥地著名的查理大学科学院人山人海，许多今天的大学生穿着纪念衫参加庆祝，人群中许多当年的学生领袖和七七宪章签署者。查理大学庆祝活动结束之后，十几万人按照当年的路线游行，沿途不断有打着旗帜的市民加入。庆祝游行的终点是当年胡萨克政权准备好警察阻挡学生的国家街。

晚上这条宽阔的位于布拉格市中心的著名商业街成为庆祝中心，从街面到人行道被人们挤得水泄不通，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大街被几十万人填满。在大街的一头搭起临时舞台，捷克和从美国来的著名乐队进行演出。受捷克人民尊重的七七宪章领导人，前总统哈维尔演出之前发表讲话，获得热烈的欢呼。

中国零八宪章签署人高瑜和今年欧洲萨哈罗夫人权奖获得者俄罗斯人权组织“纪念”Memorial负责人 Oleg Orlov 先后应邀到查理大学发表讲话。高瑜还应邀在晚上国家街的音乐会上发表讲话，她讲话的内容是：

亲爱的捷克人民：

我作为中国零八宪章的签署者而来，我翻墙而来，天安门大屠杀之后中国一直在加固阻挡公民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高墙。

我请求你们记住一个中国名字——刘晓波，他领导我们向七七宪章学习，起草了零八宪章，因此被抓进监狱，面临国家的审判。

我呼吁欧盟的政治家和人权组织像捷克令人尊敬的哈维尔先生和“在困境中的人”一样，声援我们，声援刘晓波获得自由。

（源于：独立中文笔会）

【本刊首发】

《零八宪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杨 海

去年12月8日，中国大陆公民联合发表了《零八宪章》。这一文献极大地震撼了华夏大地，使无数彷徨的民众为之欢欣鼓舞，让海内外华人看到了未来中国的真正希望。《零八宪章》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公民运动的正式崛起，是中国当代历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零八宪章》的深远意义现在还远远没有展现出来，随着中国公民运动的不断推进和发展，《零八宪章》的光辉将会与日俱增。

《零八宪章》所提出的基本理念和主张汇聚了当今中国公民社会的最大共识，它对公民自我觉醒和行动的呼唤和期许，将会使得中国大陆未来的总体社会变革沿着理性、公开、非暴力的公民运动的方向坚定而迅速的迈进。可以说，《零八宪章》之路就是公民社会之路，就是民主宪政之路，只有这样的道路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正的必由之路。

要更深刻理解《零八宪章》之路，就必须回顾一下中共建政60年都走了些什么邪路、死路和弯路。中共建政60载，前27年，毛氏独裁暴虐，肆意妄为，治国无方，百姓苦难深重，精英深受涂炭，即便是中共自身的高官元老也多横死牢狱，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主席刘少奇被万般羞辱残酷迫害致死则是对毛氏登峰造极暴政的最好诠释。中国大陆在毛氏治下的27年，走的是一条个人极权主义的死路。

毛死后，毛氏集团迅速垮台，邓小平复出掌权，在胡耀邦先生、赵紫阳先生的大力协助下，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开启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国大陆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邓小平以他实用主义的民生思想取代了毛氏的共产乌托邦，以“改革开放”为旗帜，完成了对毛氏暴政的实际否定，使中国走上了一条邓小平式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胡耀邦、赵紫阳两位中共总书记的前台领导下，80年代的中国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最有朝气和希望的时代，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改善和提升，社会的民主化气氛日益浓厚，中国有希望走上一条自上而下的由开明专制向民主宪政转型的康庄大道。

然而，1989年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遭到血腥残酷的镇压，使得中共自身改革的道路嘎然而止。随着赵紫阳的下台，80年代中共的开明专制没有向民主宪政转变，而是向权贵专制的方向无可逆转的发展下去了。“六四”镇压，不但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其实它何尝不是邓小平的悲剧，何尝不是共产党的悲剧呢？六四镇压，实际扼杀了中共刚刚启动的政治体制改革，缺少以“民主宪政”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跟进和保障，邓小平式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纯粹经济改革道路最终变成了通向“权贵资本主义”的邪路。今日中国大陆种种因社会不公、贪污腐败所造成的严峻危机都是“六四”镇压的最直接的后果。

六·四后，江氏主政，疯狂倒退，至邓小平南巡讲话，才遏制了中国大陆向左转的危险态势。江氏被迫顺应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但此时中国大陆已经丧失了政治改革的良机。在单边经济改革的道路上，中国大陆在经济上取得一系列进步和发展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不公已经开始迅速积聚。由于民主政治体制的缺失，使中国大陆迅速陷入到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境地。江氏主政13年，是中国大陆官僚迅速腐败的13年，是社会矛盾急剧增加的13年，是江氏家族、李鹏家族等特权家族疯狂攫取公共财富和利益的13年。

至2002年江氏被迫交权，胡温执政之时，中国大陆已经到了民怨沸腾、怨声载道的危险境地。胡温执政之初，在非典突袭、江氏集团极力掣肘阻碍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大力扭转和纠正江氏错误的执政路线，开启以亲民为突破口的胡温新政。随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宪法至上，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确立了中共崭新的执政理念和政治路线。而至温家宝总理勇敢地肯定普世价值之时——“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此时，胡温新政向世人展示了他们力图开启一个新时代的的决心和图景。但是，在江氏集团的疯狂反对下，胡温新政步履维艰。在旧体制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下，胡温新政面临着重重困难。

2008年12月，中国大陆公民社会和体制内民主派联合发出《零八宪章》这一震惊世界的文本，以民间独立而强烈的声音表达了对“宪政民主之路”的坚定信念。而胡温新政在其进退维谷的艰难处境下，也在此时获得了公民社会的宝贵支持。江氏集团则气急败坏而又气势汹汹地回应《零八宪章》，吴氏、贾氏连续发出“决不搞西方民主那一套”的叫嚣，实际上反映出了江氏集团面对《零八宪章》中伟大而正义理念的空前焦虑。而胡温新政，是走向民主宪政的新生之路，还是因循所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老路，这是一个摆在胡温面前的最关键的问题。胡温能否把握历史的契机，在强大民意的支持下，开启“民主宪政”的改革，把中国引向一条真正的“伟大的民族复兴”的道路，人们正在拭目以待。

《零八宪章》所提出的六大基本理念和十九项基本主张，以及对公民运动的期许，向人们展现了一条真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这六项基本理念的完整阐释，标志着未来中国的立国原则与人类普世价值的接轨。十九项基本主张向人们勾画出民主宪政改革有效的可操作的路线图。公民运动的再次提出，将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着眼于最广大的个体公民，以一个个个体公民的自我觉醒、行动和联合的方式来完成中国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根本转型，从而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了真正的希望和保障。

只要中国公民在《零八宪章》和公民运动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持续不断地在公民启蒙、公民维权、和公民社会制度建设的三大领域里进行坚韧不拔的努力，那么我们必将迎来中华民族真正的伟大复兴。

《零八宪章》给予我们以崭新的希望，我们坚信，在我们的行动中这个今天的希望必将成为明天的现实！

从宪章文本到宪章行动

陆克武

2009年12月9日，是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的纪念日。回顾零八宪章运动一周年的历程，我们深信，这一历史性的文本已经深入人心，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零八宪章，理解零八宪章，并且身体力行地加入零八宪章运动。零八宪章运动对于整合力量，凝聚共识，唤醒民众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官方的网上封杀措施，加之对宪章运动的参加者采取了各样的迫害和限制，以及我们策略上缺乏系统性的考量，宪章运动尚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展望宪章运动的未来，我们需要在路径、诉求、行动策略等方面考量，将零八宪章运动引向深入。

■ 路径选择

零八宪章运动要持久深入发展，窃以为应该遵循这样的路径：从宪政专家走向普罗大众，从精英走向草根，从文本走向行动。而宪章行动将是零八宪章运动最精彩最有力量的部分。

历史将表明，在宪政形成之前，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完美的文本，文本的起草和颁布已经告一段落，即使有不完美的地方，修订也没有多少意义。而最关键的是宪章行动。

零八宪章运动一定不能只有公共知识分子参加，一定是一个广泛的各阶层参加的运动。那些普通的专业知识分子，应该参加进来，他们是工程师、教师、医生、律师、职业经理人、职员、老板；各级政府官员，也应该了解零八宪章到底是一场什么运动，并根据自己对历史使命和担当的理解，选择相应的行动；产业工人和农民应该参加进来，他们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更应该成为运动中最重要参与者，在研讨会上，在各种集会上，应该有公共知识分子以外的社会各阶层的身影和声音。

从文本走向行动，是零八宪章运动的高级阶段。冯正虎的“归国运动”已经从中国走向世界，是零八宪章运动的最好注解。行动是全方位的，是多方面的，既有形而上的行动，如宪政课题研究、宪政环境下的立法草案探讨、各类宪政研讨会、公民上书、宪章传播，也有形而下的行动，如制作相关实物产品和网络游戏，传播零八宪章的名称和理念。

■ 诉求与策略

宪章的文本已经提出了很高的诉求，在持续进行的新一轮宪章运动中，当务之急是提出切实可行的贴近民众的具体诉求，这些诉求要广泛考量各阶层的真实需要，特别是急迫的需要。基于此，我们要求政府以“释民怨、纾民困、得民心”为指导思想，做三件事：修劣法，废苛政，限恶行。

“释民怨、纾民困、得民心”的“三民”离宪政民主当然还很远，但这是当务之急。暴政之下的民怨、民困会产生暴民和暴乱，而一个完全失序混乱不堪的社会，很难走向现代民主，即使走向民主，其代价也过于高昂。所以，我们以“释民怨、纾民困、得民心”为突破口是

合宜的。而劣法、苛政、恶行是阻碍今日中国现行制度体系的最直接体现，它窒息中国发展的生机，阻碍社会前进。

这些劣法有：《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宗教事务管理条例》、《户口登记条例》、《劳动教养条例》、《精神病条例》、《互联网条例》、《集会游行示威法》、《社团登记条例》、“经租房的相关规定”、征收土地的相关制度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恶劣条款”散布于各种法律法规中。

苛政是和劣法相联系的，当前最主要的苛政是：暴力征地和暴力拆迁，对“经租房”遗留问题置若罔闻和“经租房”维权的持续打压，随意劳教关押，随意将人关入精神病院，对待维权人士、宗教人士的关押判，互联网的种种限制措施，新闻出版领域不断增加的限制措施等等。

而恶行包括：禁止政府不喜欢的公民回国、不给办理护照、禁止出国；利益集团的互相包庇、互相利用，集团分赃；瓜分国财，化公为私，于民争利；财政混乱，随意浪费纳税人的财产；面对民怨民困，充耳不闻，冷漠以待；行为堕落，道德败坏等等。

我们应该在“公民上书行动”中，在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中，在各种研讨会中，不断将我们“修劣法、废苛政、限恶行”的诉求告诉公众，今天该如何以具体的行动来回应“零八宪章运动”，使中国从一个政改停滞倒退的国家，从一个“群体性事件”的中国，变为向前走的国家，变为走向宪政的国家。

从时间策略上，零八宪章运动应该是持久的运动，不是二年三年，五年七年就能完成，它要一直到政治多元化实现为止。这个过程要多长，实在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

在行动策略上，应该坚持温和、理性、联合的原则。只有温和、理性才能持久，才能长期坚持。只有联合才能赢得更多的民众并吸引他们参与其中，也才能动员共产党内的民主健康力量加入，实现精英和民众的大联合，实现朝野互动，激活业已停滞甚至已经死去的政治改革。

■ 方法与行动

没有行动的文本是死的文本，而零八宪章运动的精华部分是它的宪章行动部分。是以温和、理性的策略动员社会各阶层参加，引导朝野各派力量，达到中国社会的多方共赢。

在行动中，网络行动是零八宪章行动的主要阵地。

除了传统的网站、博客、BBS之外，还要借助skype、qq、msn群，借助facebook、tuitite等微博客，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有个《零八宪章》，零八宪章运动代表着广大的老百姓的利益，发出了百姓的声音。

除了网上宣传之外，在网下举行各种宪政研讨会，如“英国自由大宪章”研讨会、英国宪章运动研讨会、77宪章研讨会、宪法法院研讨会、宪法与选举研讨会、比较宪法研讨会等等。让普通老百姓参加这些研讨会，而不是把这些研讨会仅仅局限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沙龙中，让全民都来参加宪政建设。在传统举办讲座的区域，如“三味书屋”、“万圣书园”等增大密度

和频度，另外再开辟新的讲座和研讨会。每一场研讨会，尽管可能主题很学术性，但都会是一场六经注我式的零八宪章宣传活动。

推动“公民上书行动”，目的不仅仅是解决当事人的苦难，更重要的是让这个国家不争战，不沉沦，不混乱，不倒退，不停滞，使国家走向宪政民主的轨道。

“公民上书行动”不是为零八宪章的文本进行诠释，而应该是就各自的诉求上书，不要求文本的精致，要有不同群体不同地方的特色，要为那些无辜被劳教者、暴力征地和拆迁的受害者、强行被送入精神病院者、宗教压迫的受害者发声。

“公民上书行动”应该是“上书”，就是将真实的签名和诉求，以纸文本的（可以辅之以电子文本）形式正式送达各相关的当地立法、行政、司法机关。

“公民上书行动”是分散的，不需要同时进行，每有一定数量的签名上书者，都可以上书。当然，主题是一以贯之，就是呼应零八宪章运动。

“公民上书行动”暂时不要清理最敏感的历史旧账，包括当年的“土改”、“镇反”、文革受害、特别是“六四”运动。因为旧账太多，这不是一个“公民上书行动”能够承载得了的，它的使命仅仅是推动变革，反对停滞，而不是解决一些问题。

与形而上的零八宪章运动相呼应，还有一个形而下的零八宪章行动方案。这个方案是和现代商业社会不可分割的，也是和网络不可分割的。

零八宪章行动应该设计 logo 系统，包括标识，标准字体和标准颜色。围绕这一标识，零八宪章行动可以免费（可以接受商标使用权捐赠）授权足够多的 NGO 甚至商业机构，设计制造周边衍生产品，这些产品不管其功用如何，都会传播一个共同的名字——“零八宪章”。

首先可以推出印有“零八宪章”标识系统的服装、玩具、礼品、生活用品，包括 T 恤、衬衣、围巾、帽子、太阳镜、钢笔、笔记本、皮包、腰带、雨伞、水杯、玩具、台历、打火机等。这些服装的穿着，玩具的使用，礼品的馈赠，营造了一种氛围，创造了一个社区，就是那些接纳“零八宪章”的社区。这些产品在国外可以公开销售，在国内可以内部馈赠流通。

其次推出零八宪章的网络游戏（包括单机版）。通过“零八宪章网游”将宪政的理念普及到千千万万的老百姓那里去，如果连全国的网络游戏爱好者都知道零八宪章，它有什么理由不会普及到民间呢？

“草泥马运动”将一个专制体系用一种非常戏谑的方式解构得体无完肤，而零八宪章的应用系统和围绕标识的周边产品的设计、制造、流通、使用、传播，无疑将会掀起一轮更伟大的宪政建设运动。

零八宪章运动需要策略，需要行动，需要我们以坚韧不拔的品格长期坚持下去，直到宪政的来临。

关于宪章文化运动的思考

张鉴康

2008年12月9日《零八宪章》横空出世，后极权的中国为之震颤不已。一个硕大的病体在这一伟力的冲击下，从此一蹶不振，颓然倒下；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中国其曼妙的身姿已在天际若隐若现。作为《宪章》共同体的一员，笔者对此感悟至深。不过，自此通向宪政民主中国之路也仅仅刚刚开启，我们任重而道远。现在我们能够努力的 就是尽量缩短这一迈向宪政民主中国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长短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拥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我们的脚步是否坚实有力。

《零八宪章》（以下简称宪章）不只是一个关于未来中国愿景的静态描述，对于如何实现宪政中国的宏伟愿景，宪章在结语中有原则性地宣示：“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然而，如何开展公民运动，这是我们经常应当检视、思考的问题。笔者以宪章所提出的“公民运动”为原点，生发出关于中国当下宪章文化运动的思考。

笔者认为，中国将依次经过宪章文化运动、宪章政治运动最终通达宪政民主中国。宪章政治运动，属于第二过渡阶段，它的到来 依赖于第一阶段宪章文化运动地充分发育并蓬勃发展。关于宪章政治运动的问题，因尚不具当下的紧迫性，故留待日后探讨。

一、宪章文化运动宗旨：传播、渗透宪章精神，以期形成强大的宪章新文化思潮。思想是有力的，而演变成思潮的 思想更有力。近代欧洲发轫于文艺复兴，明治维新吸纳欧风美雨，即使连中共都得益于当时几乎全球性左倾的 文化思潮。人类历史在在印证思潮狂飙般的 冲击力（不管是 正面的还是 反面的）。要让宪章精神深入人心，就必须 将宪章文化时尚化、流行化。宪章以及宪章人物（包括宪章连署人、宪章捍卫者、宪章杰出的 传播者、演说家）一旦成为中国公众的 公知性话题，那么任何强权都不能将宪章的精神从中国公民的心灵中抹去。

二、宪章文化运动的 敌与友：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谬见叫“无敌人”。事实上敌人一直就有。有基督，就有敌基督。当反宪政民主的 势力以宪章派为敌并以镣铐斧钺相逼时，岂是一句“无敌人” 这一虚假的政治幻象就能淡化逼迫的残酷性？只不过，我们对“敌人”要做窄尺度把握，对朋友要做宽尺度把握。我们也不主张对敌人就要采取肉体消灭等 极端措施。那些依恃公权力封杀、封锁宪章传播、力图阻挡中国 宪政民主进程的人，可以宣布为 “宪章文化之敌”，鸣鼓而攻之可也。而 那些对 宪章内容及表述有反对或不同意见的 公民则是宪章文化之友。（“无是非公民”总是 占大多数，实际上他们中存在着大量的潜在的宪章派）宪章文化运动要有声有色、轰轰烈烈的开展，需要公民广泛的讨论、诘难、和辩论。

三、宪章文化运动方法散论：自 2008年12月9日宪章颁布后，除了最初的10余天因官方一时间进退失据 造成失控传播以外，宪章是被中共死硬当权派强力封锁的 首要目标。在国内百度搜索引擎上 竟然查询不到任何关于宪章的蛛丝马迹。宪章连署人也都 纷纷被传唤逼迫。

发起签署人刘晓波明明是 因宪章而 被逮捕，当局为了 蓄意抵消宪章的 影响力竟连逮捕的真实原因都 不敢公开。不管是封网还是现实的威逼，中共当局的用心和动机都 昭然若揭：这就是竭力制造恐怖气氛，全力封杀宪章。因此如何有效突破封锁，就是宪章文化运动当前亟应解决的问题。

1、网络传媒平台：网络传媒现在 已经成为中共爱恨交集的 对象。网络的瞬时性传播特性是任何人为封锁的 天敌。加之花样翻新的破网翻墙术，使得封网几成不可能之事。宪章颁布一年来，宪章派已经在网络上开辟了 08 宪章网、《08 宪章月刊》等网站或电子刊物。宪章派以此平台为阵地发起无数的呼吁、声明，影响巨深。现在的 关键是应该将破网软件传递给更广大的 中国公民（似乎处于无是非状态的公众）。想一想，你的 亲戚、朋友或邻居是否还处在被封锁状态。帮助弱者冲破封锁这是 每一个 宪章派成员义不容辞的 责任。而 传递破网软件本身也是实现公民知情权的具体途径之一。

2、纸媒和声媒系统：纸媒和声媒是中共强权控制最彻底的地方。目前突破国内纸媒一党垄断局面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在海外可以利用无线电技术先成立属于宪章派的 电台，定期传播宪章精神并播出宪章文化类节目。待条件成熟，国内的 宪章派可以尝试突破报禁。真正突破报禁言禁大抵要到宪章政治运动功德圆满之时。

3、现实生活层面：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宪章文化运动应当因应千姿百态的社会生活而生动鲜活地 展开。在校园和书店等中青年知识分子较集中的 地方，可以开展与宪章文化有关的文化沙龙活动，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开展宪章文化演讲会；在工人、农民、及军人上访群体中，宪章派可以组团开展送温暖活动，让公民大众逐渐理解宪章所倡导的宪政民主和民生利益其实息息相关；宪章派群体中不乏 文学艺术音乐领域的 精英人物，应该发挥其才智创作出能为公众喜闻乐见的宪章文化作品。如：宪章文化之歌、宪章文化衫、宪章文化书法、绘画及雕塑作品。对成绩卓著者可以颁发宪章文化运动贡献奖；在每一个重大节日，宪章派都应该面向中国大众发出自己的 声音：或问候祝福或呼吁表态。社会生活是宪章文化运动的 源头活水，宪章派只要深深切入公众生活，并以灵活柔软的身段凌波微步，就能有效冲破 中共人为的政治封锁，开拓宪章文化运动的大好局面。

四、宪章文化运动期间：这一问题已困扰笔者多时。鉴于历史发展的复杂多样性，宪章文化运动的期间不可能准确预知。“人类一思考上帝就会发笑”，其是之谓欤！不过若果读者好而奇之，笔者只能说：这一期间，五年较短，十年太长。而那个历史背后的力量也可能对中国失去了耐心，其轻轻地一击就改变了一切人类的徒劳安排的秩序（包括我们自作聪明的预言）。

普世价值与《零八宪章》——与钟哲明教授商讨

王德邦

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近年来成为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一个热点，尤其 2008 年 12 月 9 日一批知识分子联合发布《零八宪章》后，中国官方虽然一直避免直接回应《零八宪章》，但是中国官方中的顽固势力及其主导下的一批学人，以批判“普世价值”作为拒斥《零八宪章》，已成为时下一种既回避问题又表明立场的政治技巧。最近中国教育部网站登出“（2009）第三期工作简报”，报道钟哲明教授关于“普世价值”问题报告会，就集中反映了一个官方学人对“普世价值”与《零八宪章》的批判观点。其中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商讨。

对于钟哲明教授整个报告对普世价值的否定与批判，在此我无意一一列举其中逻辑与事实的悖谬，我仅就钟教授对于普世价值的理解问题与论断谈点看法。

钟哲明教授认为：“至今没有任何权威的书籍和词典，明确地对普世价值下过定义。世界一切事物都是随时间、地点、条件而变化的，哪有绝对的，永恒的。联合国有一个委员会，集各国专家 1997 年开了一个会，想找出普世的伦理价值，普世的伦理观念，结果各种文明、各种宗教背景的人都不同意，说找不出来，无果而终。”

钟教授对普世价值这个论断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至今没有权威的书籍和词典，明确地对普世价值下过定义”。我想请问一下钟教授什么才叫“权威的书籍和词典”？是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经典中没有给出定义？这种似是而非的含混不清的所谓“权威”事实是个逻辑上的诡辩之术，让人看来似乎很有说服力，其实仔细一推敲，发现是个假命题。因为对普世价值不仅外国许多思想学术文献中多有论及，而且中国也有诸多这方面的理论探讨。

如新华网转载的“理论前沿”上《国内学术界关于普世价值观的论战》的文章在探讨普世价值时，明确指出：“普世价值就是普遍适用的、含有‘根’的意味的价值，即符合人性根本需要的价值。就是植根于人性基础上所获得的某种文化的概括。普世价值观，是指世界各地的人们普遍赞成，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宗教、各个民族普遍赞成的价值观。普遍赞成，就是多数人赞成，并不是人人赞成。承认普世价值，是因为人类除了各自的个性和特定群体的共性外，还存在着超越于一切差别的共同性，就是通常说的‘人性’，也可以说是人的天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东方的，西方的，只要是拥有着共同的身理和心理特征的人，总有其共性的地方。这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同时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尽管在东西方的思维习惯上有着不同的方式和传承，但承认共通的人性则是阐明人道，孵化理性，建立文明以及进行繁衍和发展的人类的基石。人类普世价值的存在，不否定各民族在迈向文明未来时保有自己的特色文化，也不否认各民族根据自己的现实选择前进的节奏和行动的策略。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是永恒的，而民族特色是会变化的。”

通过百度搜索，随便就有一百多万条关于“普世价值”的论述。维基百科对此的定义是：“在哲学或人文科学上，普世价值泛指那些不分畛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任何一个自诩文

明社會的人類，只要本於良知與理性皆認同之價值、理念。”百度对此的定义是：“在哲学上，普世价值指一些有限的、所有人类都认同的观念集合在一起。普世价值泛指那些不分畛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任何一个自诩文明社会的人类，只要本于良知与理性皆认同之价值、理念。作为代词，是‘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的另一种说法。天赋人权：‘人’的位阶在‘国家’之上；‘人’才是国家存在之目的，而非‘人’是为了国家而存在。因此，国家有义务捍卫人人有生俱来的权利，如生存的权利、免于恐惧的权利、生育的权利、知的权利、免于匮乏的权利、思想的自由、表达的自由、集会游行的自由。这是国家存在的目的。若做不到的政府，人民得以随时更换或推翻。”

如李民教授在新华网发表的《尊重普世价值，实现科学发展》一文中也论述：“普世价值观，是指世界各地的人们普遍赞成，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宗教、各个民族普遍赞成的价值观念。普遍赞成，就是多数人赞成，不是人人赞成，没有人人赞成的东西。普世价值观并不玄奥，是很朴素的道理。它无非就是引导教化人们，以人为本比以其他的东西为本好，人要有尊严地活着，自由比奴役好，法治比人治好，公正比歧视好，平等比特权好，尊重比歧视好，宽容比狭隘好，和谐比争斗好，理性比极端好，仁爱比冷漠好，多彩比单调好。普世价值观是人类在深刻总结两次世界大战和专制制度的教训后形成的。”

如果说如此数以百万计的对普世价值的探讨，与其中关于普世价值大同小异的定义，还是没有“权威书籍和词典，明确地对普世价值下过定义”，那么请问钟教授什么才叫下定义？怎样才叫权威“书籍与词典”的定义？是否只有你钟哲明先生的定义才是定义？或者只有你钟哲明接受的定义才是权威的定义呢？

第二，钟哲明教授“世界一切事物都是随时间、地点、条件而变化的，哪有绝对的，永恒的”论断，是典型的哲学相对主义怀疑论。事实上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最终都会滑入怀疑论泥潭，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一再批判的相对的怀疑主义思维。钟教授这个以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原理而否定事物的质的稳定性，以真理是发展变化的相对性特点来否定真理的稳定的绝对性的特点的思维，是哲学上“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辩证法落入“人甚至不能一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诡辩论陷阱。这种以普世价值具有相对性、变动性特点，会“随时间、地点、条件而变化”，来否定普世价值内涵的质的稳定性、绝对性，是完全违背辩证法，是典型的诡辩术与怀疑论。

第三、钟哲明教授举出“联合国有一个委员会，集各国专家 1997 年开了一个会，想找出普世的伦理价值，普世的伦理观念，结果各种文明、各种宗教背景的人都不同意，说找不出来，无果而终”，来作为普世价值没有定论的论断，也是缺乏事实与学理依据的。为此我专门咨询了研究联合国问题的有关专家，他们说没有看到钟教授这个论据的事实。从学理严谨而言，这种论断显然是道听途说，或者根据某个个别偶然的小事来放大成一个整体的定论，因而不实的论断。对此，如果钟教授略微了解一点联合国成立历史与《世界人权宣言》形成及发布的经过，就不会草率作出这种没有“定论”的定论了。要知道联合国酝酿成立及商定《世界人权宣言》之初，这些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是否有普遍共同认同的价值的价值问题就是联合国主要研究过的课题，为此联合国曾专门成立过两个调查委员会，分别对世界各民族、各文化、各宗教展开调查，最后结论是虽然各民族、各宗教、各文化有很多不同特点，但是她们有着一些共同的价值与标准！正因为如此，才有联合国的成立及其《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所以钟教授这个没有定论的“无果而终”是与历史不符，与事实相背的。

对于普世价值是否存在这个问题，联合国的产生与《世界人权宣言》的发布就是最好的回应。应该说联合国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基于有世界各国共同认同的普遍价值，而《世界人权宣言》之所以得到通过，正是世界普遍价值的文本体现。如今一些抵制普世价值的人，怎么就不能正视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他们常常在普世价值前面加上个西方的定语，那么普世价值难道真的就成了西方的专利？

事实上对凝聚人类共识的普世价值及其代表文献《世界人权宣言》，中华民族以五千年文明之深厚积淀而作出过应有贡献。据记载，当年参与《世界人权宣言》草拟的中国教育、外交专家张彭春，由于他在起草工作刚刚启动时即提交了自己的方案，且具相当水准，因此被推选为起草委员会副主席。张彭春在《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工作中贡献良多，他的声音不仅代表了中国，同样也代表了亚洲，代表着东方民族与文化。在宣言起草过程中，张彭春成功地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融入到《世界人权宣言》之中。在他看来，“宣言应该既反映出托马斯·阿奎曼的思想也反映出孔子的思想”。例如，《世界人权宣言》在第一条中即明确指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其中，“良心”一词便是基于张彭春的建议，是融入儒家价值观的典型反映。他甚至还建议起草委员会成员花上几个月时间来深入研究儒家思想。对此，学者萨尼·突维斯认为：“中国代表张彭春当年把儒家的一些理念、观点引入《世界人权宣言》的审议过程，这种努力导致了宣言的最后形成并通过。在智慧的高度上，张彭春对宣言的形成所尽的责任比谁都要大，他将具有更为普遍性而非纯粹西方的思想注入于世界人权宣言之中。”张彭春主张立足于普遍主义，坚持取消一切借助于自然和神的措辞，他的观点最终为起草委员会主席罗斯福夫人所接受。据法国代表卡森说：全靠张先生用适当词句，摒除障碍，宣言才得以顺利通过。此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张彭春极力支持和赞同将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等方面的内容列入宣言之中。

可见，今天世界公认的普世价值并不是西方人独有的价值与贡献，她同样凝聚着东方人的文化、思想与宗教观念。所以中国今日一批学人将普世价值与西方价值等同，这显然既缺乏对历史的了解，也缺乏对普世价值的基本认识，是一种给西方人脸上贴金而给自己民族脸上抹黑的否定民族自身价值、出卖民族尊严的作法。

对于普世价值，中国一批有世界大局意识、人类整体关怀与现代文明观念的领导人，也是深表认同的。2007年11月，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李保东大使在人权理事会第六次会议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通过60周年仪式上发言指出：“和平、自由、平等、公平与正义，是我们的前辈们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确立的最朴素的普世人权价值，直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散发着不朽的文明之光、人性之光和理想之光。”2007年3月16日上午11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大厅与采访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我最近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个道理，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是背离的。我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我同时强调，世界上有2000多个民族，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的社会历史发展不同，他们的发展水平不同，民主的形式和途径也是不相同的。这种文化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可见温家宝先生在强调民族、国家与地区的多样性时，也肯定了“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

追求的价值观”。

同样对普世价值认同在中国社会也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绝不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博客中国 2008 年 7—9 月做了一个调查，题目是：“你认为是否应当提倡普世价值观？”截至 9 月 12 日，有 1424 人投票认为“应该”，占 93%；有 115 人投票认为“不应该”，占 7%。由此，中国民间对普世价值问题的态度可见一斑。

2008 年 12 月 9 日，中国 303 名知识分子联合发布了《零八宪章》，及其随后在官方严密封锁下的持续签名，至今已经达到一万余人公开实名签署，也鲜明的反映着中国社会对普世价值的呼求，反映出中国社会对普世价值的认同与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意向。《零八宪章》起草人张祖桦先生在《〈零八宪章〉与中国公民社会勃兴》一文中对《零八宪章》有过全面阐述：《零八宪章》正文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前言”，主旨是概括性地总结中国 100 多年来的现代化的历程和经验教训以及对当下面临的局势进行解析，指出问题的要害之所在。第二部分“我们的基本理念”，主要是阐述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是人类社会共有的普世价值和制度保证，我们这些中国公民和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公民一样认同和珍视这些普世价值，并愿意一起承担为在中国实现这些普世价值而努力践行的责任。第三部分“我们的基本主张”，就是我们这些宪章的签署人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的具体建议。第四部分“结语”指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结论是：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作为中国官方学人钟哲明对《零八宪章》的解读是：“它的基本理念是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基本主张是修改宪法，要把那些普世价值弄到宪法里面去。再就是搞分权制衡，司法独立，撤销党的政法委，实现军队国家化，共产党退出军队，公务员保持政治中立，设立人权委员会，保障人权，开放党禁，政党活动自由，搞多党制等等。还要把刑法里面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废除。”应该说这些解读基本上是符合《零八宪章》精神的。只是后面钟哲明教授对《零八宪章》成因追溯为：“‘08 宪章’是海外反华敌对势力和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甚至体制内某些人相互勾结的产物”。这个论断显然又是凭空臆测，肆意武断，与事实不符，是沿袭以往阶级斗争思维，承续抓辫子、扣帽子、打棒子的文革做法。

《零八宪章》的确是对普世价值的中国表述，其内核就是普世价值，对此钟哲明的判断是准确的。但由于钟哲明对普世价值有着先入之见，并且囿于自身利益需要的解读，所以对《零八宪章》有着天然的仇视与恐惧。

由于《零八宪章》是普世价值的中国载体，所以对《零八宪章》的态度就是对人类普世价值的态度，也就是对联合国及其《世界人权宣言》的态度。那种以自身的特殊性而拒绝认同普世价值，事实是拒绝融入人类主流文明。对此诚如《零八宪章》开篇第一段中的直陈：“21 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我们是驯兽师——写给《08 宪章》的签署者

陈 西

去年，在《世界人权宣言》发表 60 年纪念日之际，以刘晓波、张祖桦为代表的签署者们推出了《08 宪章》。我们如何理解一个国际的，一个中国的文本呢？作为首批签署者之一，我认为，是去践行。

随后，贵州人权捍卫者编撰了《人权捍卫者手册》，作为主笔的我在手册后加注为（驯兽师手册）。正是这个加注引来了争议。因为，这个关键词有着自己的一套文化词汇，如：动物、猛兽、驯化、驯服、笼子、驯兽场等等。

有人说：“要尊重我们的对手，我们是人，是人权捍卫者，不是动物，更不是猛兽”，“驯兽师”一词，既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对手”。

有人说：“驯兽师淡化了敌我关系，是在为那邪恶的、凶残的、无人性的专制党开脱，……，”

我认为，这里面有一个观念转换、观念更新的问题；或者说，是我们使用的日常用语体系不同的问题；严重一点说，这是一个有关真相，有关路径，关系到我们怎样理解民主宪政的问题。

首先，从人类的历史来说。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驯化的历史。从驯化动物、猛兽，到驯化人，人类走过了几千年。对野生动物的驯服，在文明史中已有了大量的记载，并且已经获得了巨大成就。而与之同步进行的另一个进程，即人类对自身的驯化，却较少受到关注，而后者远比前者重要得多。我们认为，不论把动物驯化得多么好，只要这个社会成员自身的野性未脱，这个社会仍然不能算是一个文明的社会①。

人类最重要的历史不是阶级斗争史，不是使用工具的发明史，也不是道德国家的文明史，更不是 GDP 的增长史，而是人类自我驯化的历史。这种驯化到现阶段才看到了成果。这个成果对世界来说，就是《世界人权宣言》，对中国人来说，就是《08 宪章》。正如前美国总统小布什在捷克发表的一段总结性话，“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08 宪章》就是我们为中国的统治者设计的笼子，我们签署者的使命是要像驯兽师一样，把中国的统治者关进笼子里。

其次，讲尊重不能不顾客观事实，不能无知到不晓宪政民主的学理。宪政学的起源就是在于对人性的深刻洞见。人是什么东东？

从客观事实来讲，人与动物是有不同，但人与动物同属于生物类。在人类的进化史上，人类学家把人与动物，尤其是与人猿科动物并提。中国远古有个“巢氏”时代，说明了人明显的动物属性。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把人定义为“没有羽毛的两脚动物”。在凶猛的野兽，都没有这个两脚动物凶狠手辣，许多动物不食同类，人食尽了其它动物外，还专对同类施暴。在中

国有许多“人不如狗”，“人不如富人的宠物”的事例。中国人没有做人的尊严，这主要是共产党统治国策使然，共产党的少数统治者否定中国人享有人权。

从宪政的历史进程看，是中国人还未完成对其统治者的驯化。宪政学理对人的属性早就有了彻底的认识。法律的存在是要证明人的兽性（罪性），是要表明人的不可能完善性和不可信任性，法律的惩罚性是不尊重人的。宪政学的大师大卫·休谟出于对人性的了解，告诫人们说：在设计宪法时，我们不能够信任人，更不能够信任统治者，我们的立法要在这样一个基点上，假设人是无赖。只有能够管住无赖的宪政设计，这样的宪政制度才是合格的，经受得住长期考验的。

合格的宪政民主制度是把人视为无赖的制度，这种制度设计是不尊重人的。然而，正是这种驯化人的制度才是人类文明的真正保障。而，那种所谓尊重人的道德国家观念才是害人，吃人的。

其三，观念更新和路径。

中国的民主宪政化要有本土资源。宪政民主的话语来源于西方，更进一步说，来源于基督教文化。把人与动物彻底分开的是上帝创造论信仰，人是依神的形像创造的，在神面前人人平等转化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世俗化、唯物主义、被进化论教导的中国要原封不动地接受起源于西方的宪政民主文化是有困难的。然而，世俗化、唯物主义、被进化论教导的中国却容易听得懂宪政“驯化的历史”。中国文化很早就把人看作是动物，中国人都在 12 生肖属相内，只要是动物，就离不开被驯化。尤其是针对当权者的驯养。因为，当权者手握大权，其兽性最容易显露。霸权、强权政治、强者为王，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暴露了独霸者的兽性主义。我们践行《08 宪章》的理念时，要认清这样的兽性主义思想，有效的担当起驯兽师的职责。

因为，驯兽师有自己的路径。在驯兽师面前，没有敌人，只有猛兽②。而在革命党人面前则有“阶级斗争”；在国家主义者面前则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敌对势力”；在道德家们面前则有十恶不赦的“邪恶之徒”和凶残的“坏人”。每一种角色已经确立了自己要走的路径。

驯兽师的角色走的是民主宪政的路径。他把自己的对手看着是猛兽，他要用《世界人权宣言》和《08 宪章》等等这样的饮食去喂养、驯化他的对手和自己，他把民主宪政之路看成是驯化猛兽之路，而不是消灭异己，铲除坏人，夺权之路。对猛兽要加以的是生态环境的关爱、驯养，把猛兽关进笼子里，让猛兽为观光旅游的社会做出贡献。目前，我们驯兽师所面临要驯化的就是共产党统治集团这头“利维坦”巨兽③。

革命党人认为人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史，其路径就是消灭剥削阶级、消灭产生阶级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存在的一切土壤、坚持阶级分析的立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 2009 年 5 月 27 日，中共教育部关工委理论中心和北京交通大学关工委邀请到的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钟哲明教授做的“关于普世价值”的报告。革命党的“知识保镖”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社会的观点是普世价值。

国家主义者的路径，对内，为了国家利益要把人民当做生产力，当作没有生命和知觉的工具；一切为了国家利益，或者说，为了国家的稳定，可以牺牲一代人、千百万人、极少数人的生命。对外，敌人亡我之心不死，要坚决同敌对势力斗争到底。

道德家的路径是疾恶如仇。对一切“邪恶之徒”和凶残的“坏人”，要象对待仇敌一样坚决彻底的铲除掉。道德家要建设的是一个君子国，小人们都会“被”——（被代表、被消失、被喝茶）

革命党人、国家主义者、道德家们都渴望着掌握专横的权力，大开杀戒来实现它们的目标，然而，权力越专横，野性的成分就越重，其霸气就越能证明兽性主义的存在。

其四，民主宪政的历史是由驯兽师们书写的历史

在人类的五千年文明中，一部人类政治的演化史，实际上是从“猴王”到人王，从人王、官员、高高在上者到人民的公仆、卑微的服务员的驯化史。

人类文明最早的驯兽师是有产者（地主）。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不被王权侵吞创立了罗马民法。公元1215年，英国的地主们共同联合起来，第一次把法律当作武器，法律项圈成功地套到了国王的颈上。这是在罗马民法被统治者遵守的背景下得以成功的。

重要的驯兽师是基督教徒，当统治者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时，公仆的思想就深入人心了。在这个前提下，基督教徒就有机会驯化国王。1560年后，被称为苏格兰长老会之父的牧师，诺克斯与镇压新教徒的玛丽女王有过四次会晤。最后一次，玛丽女王傲慢地斥责这个曾做过奴隶的人，“在这个国家，你以为你是谁”，敢如此对君王说话。诺克斯这样回答她：

“尊贵的女士，我和你一样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尽管我既不是伯爵，也不是子爵或男爵，但上帝使我成为一个对国家负有责任的人……”④

今天，中国的统治者已经承认人权，人权已经写进宪法，我们人权捍卫者便成为当下的驯兽师。我们要拿起人权、法律，和上帝赋予我们的权利去驯化统治者。我们现在可以当着统治者的面大声重申“天赋人权”，勇敢的去驯兽！

然而，驯兽师的职业是冒险家的职业，是敢于挑战猛兽（权威者），承受弱者疾苦的职业。冒险，就是说，猛兽会吃人，驯兽师有可能会被猛兽吃掉；承受社会的疾苦意味着驯兽师会受到伤害，被猛兽（权威者）咬伤（或有牢狱之祸）。

您敢担当驯兽师的职业吗？

注：

①刘军宁，《这一千年的统治者》，《南方周末》，“思想评论”1999，12，29。

②陈西，《“贵州模式”关于民主维权的一种争议》。

③《利维坦》，英国宪政哲学家霍布斯的著作书名，这个词出现在《旧约全书·约伯记》中，说的是一种强大无比的兽，被霍布斯象征为专制权力。

④（美）道格拉斯·F. 凯利博士著《自由的崛起》16-18 世纪，“加尔文主义和五个政府的形成”王怡 李玉臻译，第 2 页。

2009 年 11 月 27 日

《零八宪章》公布 1 周年网络研讨会——部分湖南籍联署人发言汇编

囚禁刘晓波，囚禁不了《零八宪章》的传播

——在网络沙龙上纪念《零八宪章》发表一周年的发言

张善光

《零八宪章》公布已经一年。

一年来，不管政府对《零八宪章》是如何拼命地封杀、打压，不管政府对《零八宪章》的签署人是如何狰狞地威胁、恐吓，都未能阻挡《零八宪章》如三月的东风一般在寒冷的土地上向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传播春的温暖与希望。仅仅一年之久，宪章的签署人从最初的 303 人扩展到今日的突破一万人，这当中有工人有农民，有专家有学者，甚至有公务员有中共党员，而且我的一位做教师的蒋姓朋友在阅读完《零八宪章》全文并立即签名后，激动地发出了一声真实的感叹：“如果政府不死死捂住《零八宪章》的公布，中国十几亿老百姓中不知有多少会签上自己的大名！”是的，《零八宪章》所呼吁的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享有权利，享有做公民的权利，而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又会有哪一个不会认同宣扬公民至上的《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的传播是任何力量都遏制不住的，她的破土而出的强盛生命力已经清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然而，《零八宪章》主笔人之一的刘晓波先生却被政府囚禁了，囚禁在《零八宪章》公布的前一夜。警察们是匆匆忙忙慌慌张张把人带走的，命令来自于大惊失色的当权者最高层。政府囚禁刘晓波，逮捕刘晓波，是政府害怕《零八宪章》恐惧《零八宪章》的表现，是昂纳克下令对如洪水般翻越柏林墙的人群开枪的重演，是八十年代波兰当局拘禁瓦文萨的延续，是苏共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翻版。丛林里的鬼魅见了熊熊火焰必然心惊胆战慌不择路，千万条事实证明，这是一条不变的真理。逮捕刘晓波，囚禁刘晓波，这就可以解除《零八宪章》对他们的千钧之冲撞吗？试看每一个《零八宪章》的签署人都勇敢地昂头不退缩，试看《零八宪章》签署人的群体在高压下愈来愈壮大，就足以可知，只要政府把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利继续做空头支票，继续做专制的遮羞布，那么不管你逮捕谁，囚禁谁，《零八宪章》就一定会像滚动着的雪球一样，把全中国东南西北四面八方所有不愿做奴隶者的诉求凝聚成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最终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向中国的巴士底狱，冲向中国的柏林墙，直至把刘晓波先生从黑暗的牢房里迎出来，直至把中国人做公民的权利从权力者手掌中夺回。

刘晓波先生，你去年十二月八日晚被抓，在即将满一年的今天，你仍然还关在黑暗的寒冷的见不到亲人见不到朋友的大牢里。但是，刘晓波先生，你不会从我们心中消失，你不会孤独，

我们每一个《零八宪章》的签署人都是你精神上的朋友，关押你，拘禁你，就是关押我们拘禁我们，我们的命运已经系在驶往公民社会彼岸的同一条“五月花号”船上。我们会为你的自由，也是为我们自己的自由，不停地去呐喊、鼓噪《零八宪章》所宣示的伟大的公民精神。

《零八宪章》万岁！公民精神万岁！

2009年11月30日

在《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网络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马 萧

各位朋友：晚上好！

今天，《零八宪章》公布一周年部分湖南联署人网络研讨会如期召开，首先，我预祝这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回顾过去的这一年，我认为，是中国现代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中，以《零八宪章》为旗帜的公民运动在中国民间如火如荼进行，在官方的强烈压制下，虽然，现在还很难预测这场公民运动能否最终实现《零八宪章》宣示的政治愿景，但毫无疑问，它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效，这一点，从官方对《零八宪章》联署公民的威胁、骚扰、抓捕之中可以看出来，从官方开动宣传机器连篇累牍的批判“普世价值”可以看出来，从国际社会对《零八宪章》的积极回应态度可以看出来，从社会各界人士踊跃签名、传播、宣传《零八宪章》可以看出来，尤其令人感到振奋的是，在当前萎靡的社会精神氛围下，在政治警察持续的恐吓下，至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位联署的公民公开声明退出《零八宪章》。

回顾《零八宪章》公布一周年，从最先公布的 303 人名单，到最近公布的统计数字，已经超过了整整 10000 人，这个“10000”，绝不是像官方所公布的那些统计数据一样，为了应付上面交待下来的差使，一项根据上个年度递增或递减的虚假公事，毫无实际价值、言之无物，这个“10000”，乃是一个个有良知、正直、负责任的公民经过郑重思考后签名的产物，乃是由一个个具有独立辨别能力的公民堆砌和建立，我认为，每一位签名公民身上所蕴含的威力，足以与一万个千人一面的政府官僚加在一起的总和相当，因为，自由不可阻挡！

在过去的一年中，《零八宪章》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其联署公民先后获得了“捷克人权奖”、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时代百人”以及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评选的“中国杰出民主人士”等赞誉，同时，《零八宪章》也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政治支持，《七七宪章》运动的主要发起者、捷克前总统、作家瓦克拉夫-哈维尔先生公开撰文声援《零八宪章》，美国、加拿大、欧盟等自由世界的政要领袖们都在密切注视这一来自中国民间的公民运动，在强大的专政机器面前，这些公民没有畏惧和退缩，展示出了团结的力量。

以上是我所看到的，同样令我感到担忧的是，《零八宪章》文本的主要起草者刘晓波先生至今

仍然关押在监狱之中，失去自由，我们不当对他的境遇视而不见，因为，自由不可分割。

我们前面的道路还很长，我们面临的环境随时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我们已经选择了勇敢地迈出第一步，而且，这极有可能是历史的一大步，在正义、荣誉和真理面前，我们除了继续勇敢地往前走，别无选择。

2009年11月30日

这一年，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纪念《08 宪章》签署发布一周年网络研讨会发言

李德铭 黎建军

《零八宪章》签署发布一周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这个宪章发布之后，给这个纷乱复杂的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惊，在这一年里，有一批又一批敢想敢为、求新求变的中国人勇敢地站了出来在《零八宪章》上签署了自己的姓名，让世人且悲且喜再一次清楚地看到不甘沉沦的中国人还在暴政的棍棒和枪口下挣扎，若干血液如油点火即可燃烧的人们，再一次从不同的角落发出了争自由求民主的呼声。

在这份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文献向全世界发布之日起，所有签署人的命运就捆绑到一起了，尽管所有签署人的性别年龄、社会阅历和成长背景各不相同，可从这一天开始，我等求同存异公认《零八宪章》是一份推动中国民主运动行动纲领的同时，每一个来自海内外和社会各阶层的签署人，就选择且背负了我们所处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这种责任和使命正如《零八宪章》所说的那样：“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面对腐朽没落正在挣扎的独裁集团，《零八宪章》崇尚的普世价值与诉求的民主思想，所面临的对抗与争取远比历史上的每一场社会变革更加艰险，自《零八宪章》发布后，在中国境内所有传播宪章的网站都遭到了当局的封杀，宪章发起人刘晓波先生被捕入狱至今，首批 303 名签署人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和打压，在这种极其恶劣的环境下，要背负神圣而艰难的使命把中华民族推进一个新的时代实现伟大复兴，这个过程，对每一个签署人来说都将面临一场最为严峻的考验，面对严酷的现实，我们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做了什么？这是我们每一个签署人必须思考深省而获得彻底觉悟的原则问题。

事实上，在《零八宪章》签署发布之后，我们除了在境外网络媒体上看到部分签署人在为接连获奖狂热欢呼 and 继续叫阵外，就没有做什么了。尽管有一部分人想做事，由于得不到方方面面的支持也没能做成一件大事。回顾一年来，震惊全球的群体抗暴事件接二连三暴发，成千上万深受压迫、陷入危机、彻底清醒且命如悬丝的访民聚集京城向当权者讨说法而得不到

说法，与不讲理的黑恶政客去讲理本身就是自寻死路，若干著名和非著名的维权人士在讨公道的过程中接连栽在没有公道的天牢里、绝路上，面对中国各阶层民众彻底清醒的艰险抗争，《零八宪章》这个被世人誉为是代表中国多数民众发声的民主运动群体沉默了，这个时候，脱离民众置民众于生死而不顾的沉默，给那些支持《零八宪章》的人们带来感受多是不安和失望，所有准备签署和即将签署的人们，对这个敢想不敢做，敢做不敢当的思想巨人和行动矮子，最后一线期望仍然是长叹和失望？！

如果我们在签署《零八宪章》之后，就当前中国社会风起云涌震撼人心的公民维权运动谨慎观望或袖手旁观，仅靠我们这批人当中能写的文人撰写文章唤醒民众和声讨暴政，让民众在呐喊中觉醒，让统治集团在愤怒的声讨声中觉悟，这是多么可怕的决策和多么可恶的幻想，任何一种幻想让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集团，依照《零八宪章》所指出的要领主动或被动来推动变革和完成变革，既不现实也可能。如果我们在签署《零八宪章》之后，没有以实际行动来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即使《零八宪章》拥有上万或上亿的签署人，又能改变现实的什么呢？！关键时刻，如果我们不能警醒，我们就会在危机与生机并存的节骨眼上，错过了求新求变的最佳挡期；关键时刻，如果我们不能在警醒中有所行动，《零八宪章》每一位签署人的身心必然与无数抗争的民众拉开了距离而脱体为一群脱离现实能说不能做的怪物；关键时刻，对所有为中国民主运动不停战斗身陷牢狱的同仁不闻不问，这个舞着民主革命大旗的庞大群体迟早也会被受难的同胞所唾弃。

任何一场社会变革都会付出必要的代价，古今中外最完美的变革思想与理论都需要有人传播中推动，且在推动中实现愿望和目标。如果签署《零八宪章》能够完成变革的话，那我们就接着签吧，签了《零八宪章》宪章，又签《零九宪章》，再签《2010 宪章》……直到统治集团头痛脑胀低头认输答应变革为止！

现实告诉我们，中国现阶段的民主革命运动的确需要有人呐喊叫阵，但所有的精力都集中来呐喊叫阵，一切都完了；现实同样告诉我们，中国现阶段的民主革命运动那种不相为谋、相互排挤、各自为阵、一盘散沙和争权夺利的混乱格局没能彻底打破的话，一切也都完了！

中国现阶段的公民生存状态有目共睹，近年来，接连爆发的群体抗争事件，充分说明中国民众的民主意识比任何时期都清楚地认识到社会问题和生存危机。如果说 89 年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反腐的学生运动代表着那个年代的一次觉醒，那现在，接连发生的群体抗暴和不同阶层的民生维权，甚至出现像杨佳、邓玉娇这样不畏强权用武力向恶棍讨公道的义举，就证明了全民已经全面觉悟。民不聊生的生存状态给民众带来最多的是生死不能的愤怒，这种愤怒不需要策划和启蒙，我们现阶段的使命就是让非常愤怒的群体如何凝聚起来，在明确变革目标的前提下形成强大的公民力量向暴政问罪和恶贼开刀。考问中国历史，我们能够清楚看到，腐朽透顶的满清王朝的灭亡是一种必然，只要做好该做的事，必然灭亡的时间就会在偶然发生的事件中提前了。中共独裁暴政的灭亡也是必然的，如果，我们能与普天民众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民众中来到民众中去，想民众之所想，关注民生做好每一件事，那么，它必然灭亡的时间同样在偶然事件爆发中到来。

作这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进步人士，我们的主张不能停留在只给苍生规划未来的文字上，也不能以救世主的身分自居，更不能逃避凶险坐在安全的角落号令天下，让民众去冲锋陷阵，甚至也不能靠《零八宪章》的影响力满足现状坐享其成，把海内外资助挪为他用挥霍一空，

这种十足的投机行为必然变成历史的罪人。未来的民主政治不可能推举一个纸上谈兵的角色担当总统。历史不断地造成人，也不断地淘汰人。任何靠玩政治把戏变成政治明星的梦想，都会在世人的眼前破灭。

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要具备三个条件：一要有远见卓识；二要有牺牲精神；三要想方设法贯彻主张。现实中的我们很难找到具备三个条件的天才，在这个腐朽没落的时代，我们如同当年被逼上梁山的难民，我们只有团结一心，将那些有远见卓识、牺牲精神和能够贯彻主张的同胞统统联合起来，共同为《零八宪章》所提出的愿景而努力奋斗，国家才有希望，民族才有希望。

【宪章论坛】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专政必亡，宪政必兴

于浩成

去年今日，2008年12月9日，北京上空宛如晴天霹雳一声巨响，《零八宪章》，一个堪称近二十年来最为重要的公民权利宣言，横空出世。一个新的宪政运动开始了，《零八宪章》在互联网上发布，立即得到国人广泛而热烈的响应，签署者由最初的303人，很快成倍增加，至今已经超过万人，遍及全国各省区，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侨和流亡人士。既有少数知识精英，也有广大普通民众。

《零八宪章》在中共当局对一切异议严密封锁中破网而出，是他们震惊和惶恐，一方面放话说，高层对《零八宪章》定性为民运策划的反动纲领，目的是推翻现政权，另一方面他们关押主要起草人之一刘晓波，并由警方出面，对首批签署者303人，每一个人都进行传讯、盘问，加以威胁警告。但这一切都未能达到将其扼杀的目的，反而造成进一步的宣传和传播。《零八宪章》在互联网上继续传播，签署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没有一个人因为当局压力，而声明退出，取消签名。

今年三月，刘晓波为代表的签署者群体获得捷克人权奖，签署人代表崔卫平、徐友渔、莫少平赴捷克领奖，受到捷克“77宪章运动”领导人、前总统哈维尔的接见。哈维尔在美国大报上发表讲话，对《零八宪章》高度赞扬并预祝取得胜利。今年七月，美国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将本年度的杰出民主人士奖授给《零八宪章》全体签署人。《零八宪章》在国内外影响日益扩大，这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宪政运动正方兴未艾，势不可挡奋勇向前。

最近几年来，在媒体和网络上也曾多次征集签名的活动，但这一些大都是昙花一现，热闹一时，影响不大，未能像《零八宪章》这样一直持续下来，历久不衰。其原因何在呢，我以

为一是由于签名大都针对个案，一时一事发表意见，而《零八宪章》乃是就国是发表政见，并提出一整套民主宪政的纲领；二是由于其问世恰逢一个关键时刻，适合国人的需要，它的破空而出，正如大旱之年，天降甘霖。

《零八宪章》不早不晚恰好在2008年底破土而出，绝非偶然，因为从近处谈，2009年乃是八九民运被血腥镇压的二十周年。官方主导的所谓改革开放的“三十周年”，以及中共建政六十周年；从远处谈还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中国立宪一百周年。这一些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给人启示和反思，引发人们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特别是不少有识之士早就对官方大肆吹嘘和欢庆的改革开放的“三十周年伟大胜利”十分怀疑和不满了。余世存、陈永苗、王俊秀等在香港夏菲尔出版社出版的《改革之死》、《中国改革的末路》，早已宣判了改革死刑，他们揭开了官方改革的骗局，让中国人民付出极大代价，送走了文革的极大浩劫，又迎来权贵资本主义（官方称之为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一场浩劫。宣判改革死刑思潮的兴起，是《零八宪章》出台的民间最大背景。改革死了，民间就要发出自己应有的政治宣言，这就是《零八宪章》。否则“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欠一个符合当前形势的回答。其实早在2003年起，人们对官方改革话语烦透了，几乎不提起，取而代之的是公民维权运动，被称之为近二十年最为重要的公民权利宣言，乘势而生。有人讲到《零八宪章》与公民维权运动的关系，将二者比喻成“维权之脚与宪政之脑”，对二者关系作了生动阐释。

《零八宪章》发布一年来，中共做了敌对定性，并对签署人进行政治迫害，还由一些狗头御用学者在媒体上著文攻击，这一些狗头大都将普世价值作为靶子，很少公开指责《零八宪章》。这大概出于恐惧心理，担心这样做的效果，反而会为《零八宪章》扩大宣传。在签署人和支持者对《零八宪章》文本讨论当中，意见分歧并不冲突。这一情况表明中国应走上民主宪政之路，大多数人有普遍共识。有人把《零八宪章》称为“最大公约数”，很好的说明了《零八宪章》凝聚共识这一特点。但也有人认为《零八宪章》乃是老生常谈，理论色彩不强，深度不够，岂不知这正好是《零八宪章》作为政治宣言的优点，而非缺点。正如潘恩的《常识》在美国革命大业中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真正的意见分歧在于《零八宪章》的第十八条联邦制问题，不但中共当局有意将联邦制度的提出，当做罪行，在政治学者中也有不同看法。对联邦制持异议的人，并不了解，在前西方诸大国实行联邦制乃是宪政题中应有之义。宪政主义主要原则之一，就是分权制衡。在国家结构中横向方面，是三权分立，纵向则是上下分权的联邦制。我国从秦汉以来，一直实行中央集权制度，到民国初年曾有联省自治，有的省还曾自制省宪。

联邦制原本是中共自己的主张。毛泽东于1945年10月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中曾主张联邦制，“中国境内各民族应根据自愿与民主原则组织中华民主共和国联邦，并在这个联邦的基础上组织联邦政府。”“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决权及在自愿原则下和汉族联合建立联邦的权利”。直到1949年10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也还宣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及自由加入中国联邦的权利。但在1949年建政后出版的《毛选》中，这一些文字均被删除。由此可见，实行联邦制不过是回应中共自己有过的主张，何以成为与现行制度敌对的罪行呢。

还应指出，《零八宪章》中提出联邦制，对和平统一台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一国两制”将台湾贬为地方，以至于遭到他万同胞的反对。以联邦制来实现中国统一，将是最为可

取的方案，也是实现宪政中国的便捷路径，其政治重要性显而易见。

一年来的事实充分说明，以《零八宪章》命名的这场新宪政运动，已经开了一个好头。我们坚持不懈地推动下去，必定会取得最后胜利。最近读到部分签署人在《零八宪章》论坛上提出的七项倡议，我表示完全赞同。有意思的是，当我们纪念《零八宪章》的日子里，恰逢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纪念活动，《零八宪章》签署人江棋生说得好，众推墙才倒。我们更加充满信心，坚信在中华大地上：专政必亡，宪政必兴！

2009年12月2日

（源于：民主中国）

《零八宪章》：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里程碑

欧阳懿

1949年3月，武装割据22年的中共党首毛泽东氏，和他的同志们从河北一个叫西北坡的农村转进到古都北平城，预备建政，那时他想起和他有着相似经历的农民造反者李自成、洪秀全，他看似幽默实则惴惴地说：“咱们这是进京赶考！”

正如大家知道，隋唐以来，进京赶考是每一位中国式读书人的人生大课题。独对寒窗，或数年，十数年甚至数十年，有功到自然成而金榜题名者，从此有了花团锦簇的人生；有皓首穷经难得门径者，名落孙山枉自嗟叹成为永远的边缘人；也有科场上下舞弊或得或失者。公元1968年，我出生在四川省遂宁市一个偏僻的农村，那个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试卷上，“镇反”、“清匪”、“打土豪，分田地”、“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洗澡”、“反右”、“大跃进”……任由湖南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氏信笔涂鸦或绣龙雕凤几近20年。没有人敢给他的试卷做客观的评判，因为他有枪，有很多的枪，以及握着枪扼着枪机的人；没有人敢给他的试卷做客观的评判，因为他有监狱，有很多监狱，有足够关押数以亿计人口的大监狱……

普遍的粮食短缺和对“旧社会”的张扬使我无法将毛泽东氏的答卷与我自身的饥饿和发育不正常联系起来。我最早前的郁闷来自一个名字叫路遥的作家和他的作品《人生》，作品主人公高加林的命运，对我的意义指向是中共政权下的国民不平等性，他对我根本性推动是我必须加倍努力地读书或许能够挣脱加诸我身体上的卑贱性烙印。

1984年，我进城读重点高中，以对“文革”的否定为起点的新的共产党中央主导的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共产党说：“改革就是对旧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扬弃……改革会遭遇到保守势力的阻碍……青年学生要有爱国热忱……要把自己的理想与改革事业的发展结合起来……要有忧患意识。”那时我想，共产党的改革必然包含了或包含着对一切不平等不自由不人道的现实限制的扬弃，那么，我有什么理由不热爱不拥护这样的改革呢？那么，我有什么理由不为她的进程满怀忧患呢？在我满怀忧患的青葱岁月里，或许因为同样的热情与愿望，

我的学长蔡昕（1986年保送入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我的同班同学刘贤斌（1987年入人大）、吕鹏志（1987年入北大）、罗宗杰（1987年入南京大学），我的同级同学陈卫（1988年入北京理工大）、梁擎墩（1987年入北师大）……也满怀忧患。

我们大多是愚钝的人，比如：“第五个现代化”、“警惕新的独裁”、“言论自由”就不是我们这些青葱的忧患所能够想象的，我们的忧患所积蓄的能量把我们送上1989年那些街头和广场正好。

蔡昕学长从坦克履带的碾压中侥幸活命，亡命天涯；梁擎墩在鹰犬追逐和国际援救的博弈中流亡；陈卫在镇压开始的第一时段被投进秦城监狱；吕鹏志找不到怯懦的侮辱者的公平决斗预备让自己像他的诗歌皇帝海子一样在山海关将自己开成一朵血花；我被发配边远农村经受过三岔五的审查……血、火中我们坚信：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进步的基础，是人类个体有尊严活着的粮食。

1990年，在寒冷的乡居宿舍里展读刘贤斌给我搞来“七七宪章”和“第二国际”的资料，我多么盼望着某一天，我的同胞们也有那样的一个宪章，我和我的同胞们也都神圣和踊跃地签上自己的姓名。这种盼望，对一个以嗜血暴力和密谋变革社会为传统的民族是多么的渺茫。

1993年，刘贤斌出狱，稍后盘桓于北平，直到1995年《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的公开张扬，才使我们的盼望有了一些希望。从此，“公开、理性、非暴力”和人权保护等观念在我们的心底深处发育滋长。

1999年7月，因为筹备中国民主党，刘贤斌、余万宝再次被捕入狱，获刑13、12年。我无法推测那是别人眼里怎样凄然的政治严冬，有刘贤斌、陈卫好友的身份包裹足以让我得到来自持不同政见和自由知识分子方面的温暖，我受命奔赴成都，延续和协调四川、川渝人权民运事宜。因为与林牧先生和任晓明先生关于清末立宪预备的交流，我们对宪政民主建设的当下认识趋向一致。以此为基点，西南人权民运的地缘格局得以实现。而互联网的出现和运用，足以让我们构建西部联盟、联接两湖、遥望江浙、京津与东北。我们无法想象人们对于卧龙岗上闲谈人的思维的满腔怀疑和鄙视，民运之持不同政见阶段的性质本身决定我们需要接受这种质疑和鄙视。“有没有意义？”当人们以昆德拉的方式追问的时候，我们想起了哈维尔和他的朋友们的“七七宪章”运动本身就是有一个回答，但对于更多的人而言，哈维尔们是被遮蔽的一只黑猫，黑暗中人们说没有一只猫。我们的努力是坚持住和发展“公开、理性、非暴力、良性互动或多远互动”的原则，以“蛛网结构”和“沙石理论，相容模式”寻求真民主、真共和、真宪政的实现可能，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的民运文化建设的全部内容。我们将以此全部，肩扛着来自传统和现实相铰接的专制压力，给毛泽东氏、邓小平氏及其余脉的“赶考试卷”说：NO，从而将这个社会推进到现代道路上去。

2002年12月的入狱，其实是强迫我陷入闭关修炼的幸福生活中，我坚信我的被监禁不会很长久，我的长久日子是在监狱以外而不是监狱之内。我在幸福中将《新旧约全书》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细读了四遍有余，我在报纸的边角里读刘洪波的《缅甸黎明的曙光》，读“宪政论衡”王怡先生关于“宪政”和“共和国”的解读，看由《晚钟：紫禁城最后的改革》改编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以及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的当下倒掉。所有这一些使民运或者中国社会现代化实现的目标、原则、阶段性、社会基础、行为模式，无不清晰、敞亮地展示在沉思

者面前。

2005年和2006年初，我坐在电脑前将我的思想展开，我行走在亚自由或伪自由的天空下，与周玉樵先生相识，与王怡交流，与贵州、广西、杭州、湖南、西安朋友见面，与赵昕、欧阳小戎、王金波、刘飞跃深入交流，我们的认识是：持不同政见运动基本结束，中国社会已经转进到非暴力公民权利实现的阶段。在西安，林牧先生赠我以《哈维尔文集》，我们一起憧憬着一个新的局面和阶段。

从西单民主墙到1989年的血与火的洗礼，从1989年镇压后的地下抗争到1995年的公开化到1998年的冲击党禁，从组党受挫到互联网时代普世价值的全面张扬和维权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力量积蓄足够将自己放置到一个新的局面和阶段。她不仅可以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卷上涂鸦60年的中共以客观公正的判卷，而且全面展示了新的政治力量的崛起的坚忍不拔、勇于探索和能够担当的形象。

20、30年的努力，成就着《零八宪章》的出现，昭示着百年宪政与共和梦想的延续不可避免，难以逆转。数日前，我对妻子说，《零八宪章》的出现和得到广泛的签名认可，除了赚钱以外，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需要已经没有任何一事情是我非做不可得了。我的意思是：今天，有那么多国民站立到“自由、平等、人权和民主、宪政、共和”的旗帜下，我一个人是否再做什么已经显得不很重要了。《零八宪章》和她主导的宪政、共和运动，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里程碑。我将不再艳羡捷克的哈维尔和他们的《七七宪章》以及由此而来的“宪章运动”，因为我们有了自己的宪章和宪政与共和运动。及此，活着并继续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们，可以告慰林牧先生一样的逝者，您的盼望，已经成为现实，并发展中。

2009年11月25日

（源于：民主中国）

《零八宪章》往何处去？

张 辉

自由主义理论虽然是一种宏大的理论，是一种以自由作为主要政治价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是一种综合的意识形态，其博大精深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就像马列主义一样是一种综合的意识形态。但是，自由主义理论相比马列主义有一个欠缺的地方，这个欠缺的地方就是实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方法问题，方法论的问题。当然，不是说自由主义理论完全没有方法论，而是说自由主义理论相比马列主义缺少了一些方法论。

马列主义既为人们描绘了共产主义的社会远景，也为人们描绘了社会主义的社会近景，同时提出了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方式方法，使用这些方式方法，马列主义者曾经获得过辉煌的胜利。自由主义理论主要是关于“民主”的理论，通过自由主义我们的眼界

中里确会得到一个“民主”的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但是这个“民主”的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很少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建立它，也很少告诉我们它有什么远景。我们很多人都在喋喋不休地证明“自由”和“民主”，怎么达到“自由”和“民主”，反倒成了弱项。

当然，民主化的理论也是形形色色，但是那些民主化的理论被反复琢磨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并不能复制，也不能移植。看到俄罗斯民主了，我们想学，但是找不到叶利钦；看到波兰民主了，我们想学，但是找不到瓦文萨；看到台湾民主了，我们想学，但是找不到蒋经国；看到不丹这个弹丸小国也民主了，我们想学，但是我们很后悔自己的国家没有开明的君王。怎么办呢？于是，更多的自由主义者陷入了空谈，并满足于空谈，他们时常发明一些新的词汇图谋显示自己比别人更高明。在专制的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空谈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因为总是有人在听。中国太大了，中国人也太多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总有显示自己高明的时间和空间，但是他们总是享受不到“自由”。

以宪法约束政治，用政治建设法治，以法治寻求公正，为公正捍卫民主，以民主保障权利，由权利抵达自由，这就是从宪政到自由之间的脉络，这样的脉络就是公民社会的脉络。也就是说，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的总和，就是公民社会。这个理念看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很多国人对“主义”并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我们如何才能享受宪政民主？自由主义的“外行人”会问我们这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你们讲这是一个“脉络”，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一条路径，如果是路径，那么，人们又是通过何种途径得到最初的宪政的呢？

《零八宪章》横空出世，应者云集。相对整个自由主义的理论来说，《宪章》没有什么超越性的概念，但是《宪章》的发布，说明中国的反对者在精神上的成熟，说明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和公民社会已经成了反对者的精神共识。《宪章》虽然缺少一个有效的组织载体，但它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资源和组织资源，这就是《宪章》重要意义之一。可是不仅如此，这还不是宪章的最重要的意义。《零八宪章》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在中国维权运动走向成熟的重要历史阶段发布的，它为中国维权运动展示了自己的方向。《零八宪章》的签署人主要都是中国维权运动的中坚力量。《零八宪章》不仅仅是一份知识分子的宣言书，也不仅仅是民间人士向当局表明态度，而是中国维权运动自我展示与自我整合的一种方式。《零八宪章》主要是中国维权运动写给自己的一个纲领性文件，这一点，可能是批评《零八宪章》的人所没有感悟到。

那么，《零八宪章》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就一目了然了，《零八宪章》应该往维权运动中去，应该往签署者的身体力行中去。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缺少的不是理论，而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而是实现自己公民社会理想的有效方法。《零八宪章》发源于中国的维权运动，也应该深入到维权运动中去，否则它将一无是处。

中国几千年的皇朝都在更替轮回，至今不变，但是具体到每一个皇朝更替轮回的方式，人们会发现，交替之际颠覆方式都不完全相同，也就是说，每一个皇朝的更替都不会完全重复上一个王朝的轨迹。皇朝虽会覆灭，但前朝的教训依然是最重要的教训，每一个当朝的统治者都会对前朝的教训有所警觉。现在的中国是共产党执掌政权，它会吸取国民党在大陆败亡的教训，这就可以肯定地说，不到万不得已，共产党不会给反对派办报纸的机会；不会给反对派建立民主党派的机会；因为他们是靠卢布起家的，所以也轻易不会给你一个接受外援的轻松机会。

中国社会的转型时必然的，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和公民社会也必然是中国未来的方向，这个世界没有别的选项供我们选择。但是中国的民主转型不可能有什么可靠的参照系统，学俄罗斯，我们没有苏联的联盟制度，不可能造就一个苏联内部的俄罗斯总统；学波兰，我们没有波兰工人的自由传统，也没有完全独立的天主教会；学台湾，我们没有蒋介石留给社会的县域自治，也没有像蒋经国那样对反对派比较仁慈的统治者。那么，我们中国怎么办呢？中国只能走维权运动的道路，因为维权运动在事实上已经成了中国的民主运动。

中国的文人不乏强国富民的愿望，也不乏建立民主中国的愿望，更不乏对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精神，但是他们在长期的专制社会里生活，无形中就有一个最大的弱项，他们最大的社会理想就是做“帝王师”，喜欢谏言献策，喜欢受到重用。中国的文人最需要反省的就是怎样去学习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怎么去做一个合格的公民。现在的中国就需要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需要他们独立地表达意见，需要他们积极地参与维权运动。零八宪章从文字上说是从知识分子脑中出来的，但零八宪章也应该从知识分子手中出来。

维权运动从一个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损失上启动，逐渐走到全面的社会问题上，其范围几乎扩大到所有的公民权利方面，例如，生存权、发展权、教育权、结社权、意见表达权、环境权、知情权、选举权和投票权等等。公民维权的范围越来越大，道路越走越宽，而公民对维权运动的参与也越来越主动和积极。维权运动即将形成一个社会体系，那么它就需要《零八宪章》的指引，也需要《零八宪章》签署者的积极参与，以使维权运动改造中国。

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应该满足于坐在书房里研究这个社会应该怎么样，而应该为心中的那个理想的社会去努力。具体到中国的问题，就是要积极参加维权运动。我们不难发现有一些文化人，自以为牌子很大，但是只喜欢说，不喜欢做，或者是不敢做，或者是不屑做。假如说突然发生了一起损害公民权利的公共事件，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大家坐在一起谈起来，都很愤慨，但是需要起草一个公共声明来表达态度的时候，都是推三阻四，谁也不起草，-----别人起草好了，他又意见一大堆，-----好吧，公共文件就应该按大家的意见修改，但当你按照他的意见修改后，他还是不签名。这个简单的事例，就说明有好多中国的文化人是什么样子的。

维权运动形成体系，并且按照《零八宪章》的既定路线行进，这才是改变中国的新路。一方面，如果不和维权运动走在一起，那我们永远在一个自我封闭的象牙塔里意淫。有一些民主派的先驱人物就是这样，他们长期生活在狭小的民主圈子里，只看到压迫和敌视，看不到社会变革的希望与契机。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通过维权运动扩大自己的影响并壮大自己的力量，那么即便你成立 100 个地下政党又有什么用处？

中国的事情，还是要落地在中国来办，中国民主的事情还是需要中国人来办。中国的民主不仅是一个脑力活，而且是一个体力活。如果我们自己不干活，那么指望什么美国总统来了见一面，或者出国去参加几个讨论会，是没有出路的。

2009年11月16日

(源于：民主中国)

弘扬普世价值，反击御用教授钟哲明

张 辉

【作者按】 据网上资料介绍，钟哲明教授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于人民大学，多年来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北大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是一位资深的博士生导师。钟哲明教授 2009 年 5 月 27 日教育部机关工委理论中心和北京交通大学关工委邀请到钟哲明教授来校做报告。钟哲明教授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以非常具体的事例，给大家做了一场深刻的报告。在报告中，钟哲明教授海阔天空，大批特批《零八宪章》和普世价值。之后，该报告的文字稿堂而皇之地发布于国家教育部的官方网站。

钟哲明教授在报告会中讲了三个问题：一是“普世价值”争论产生的背景；二是如何看待普世价值；三是被人们鼓吹的普世价值中的具体内容，即所谓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乃至宗教，该如何看待？体制内学者吃的是体制饭，说点体制话，这个一点也不奇怪，本人在他们以往大放厥词的时候也历来懒得批驳。但是，钟哲明教授冠冕堂皇的言论明显与官方对《零八宪章》的态度完全吻合，并破天荒地登上了教育部官方网。关于钟哲明教授的言论，我觉得有必要给予反击，特提出如下几点看法与之商榷：

第一，没有批评的自由，赞扬就毫无意义。《零八宪章》的内容和传播渠道被全面封锁，钟哲明教授批评《零八宪章》的时候，为什么不把宪章的全文公布？即便不方便公布全文，那也应该公布部分条文啊，难道你垄断了宪章的批评权？所以，我建议钟哲明教授在批判《零八宪章》的时候，也要先解决《零八宪章》是什么的问题，应该公布出来由国人共同批判。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有分辨能力的人，而不是圈养的猪，请钟哲明教授不要怕人们知道点什么。

第二，钟哲明教授善于老调重弹，坚决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这个马屁拍得未必恰当。就近的来说，中共高层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温家宝等人就经常把普世价值的话语挂在嘴边；就远的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也是为了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它只是要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实现人的自由，尤其是恩格斯在晚年已经完全放弃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个是有据可查的。可见，人的自由就是一种普遍的价值。人只要是人，只要有人性，就有相通的东西，就有普世的价值。钟哲明教授之所以看不见普世价值，或许是因为人性被异化的太多了，变成了“教兽”，他认为自己与别人不应该享受同样的权利。

第三，钟哲明教授认为，鼓吹普世价值的实质，归根到底就是要动摇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么老掉牙的东西，中共的高层都不好意思多谈了，钟哲明教授要誓死捍卫，那么请问钟哲明教授几个问题：

1. 中国正在走的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吗？公有制的基础还在吗？按劳分配的原则还在吗？计划经济还在起主要作用吗？
2. 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中有划分“人民”和“敌人”的标准吗？你来牵头建议中

共在全国范围内发放“人民证”和“敌人证”，如何？发放了“人民证”以后是否可以给“人民证”的持有者一张象征尊严的选票？如果是随意划分“人民”和“敌人”，你能保证自己永远在“人民”的阵营中？

3.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其法理基础是什么？如果说谁打的天下就该谁坐，这和秦始皇以来的皇帝们有什么区别？如果说谁有枪杆子就永远做老大，这和绑票的土匪们有什么区别？共产党的老一辈革命家死后，这个国家该由中国公民来管理，还是该由共产党领袖的儿女们来管理？太子党全面掌握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这些都是应该的吗？

4.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西来文化，还是本土文化？如果不承认普世价值，为什么毛泽东非要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普世价值）？就马克思主义的渊源来说，从恩格斯那里延续下来的第二国际到社会党国际一直在延续着，从列宁和斯大林那里产生的第三国际早已破产，我们即便认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就必须认可你所认可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谁是教皇谁就有主义，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它们一脉相承又完全矛盾，国人该信谁家的主义？如果钟哲明教授上台做了中共的总书记，我们是不是也必须要相信钟哲明教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四，钟哲明教授忧虑地说：“改革开放后，价值观流行起来，受西方的影响越来越大，潮水般地涌进来，堵也堵不住，怎么办？”我以为钟哲明教授过于忧虑了，党国不是可以封锁吗？不是可以把说话的人抓进监狱吗？你们所鼓吹的价值观既然美妙无比，怎么能有这样“杞人忧天式”的忧虑？钟哲明教授认为，反对和赞成普世价值的实质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当然，在我看来普世价值就是人人都能接受的价值观，比如生命的权利，表达的权利，选举的权利，这些东西不是说只有资本家才喜欢，无产者就不稀罕。钟哲明教授把这些东西诋毁为“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并没有充分的理由。普世价值，之所以成了钟哲明教授眼中的“洪水猛兽”，是因为钟哲明教授害怕人们一接触就接受它。人们之所以容易接受“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这样的洪水猛兽是因为它符合人性，而钟哲明教授所谓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本来就是个没人性的东西，它根本抵挡不住人性的洪流。

第五，钟哲明教授口口声声说，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坚决抵制把西方的那一套观念和制度搬到中国来。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說法，人类历史的全部活动就是在为人们自己争取更多的自由。现在钟哲明教授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么，我想请钟哲明教授给我一个无产阶级的自由化。中国社会的无产阶级确实需要一个自由化，它们需要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请给他们吧。

第六，钟哲明教授坚决反对宪政，宪政是什么？宪政就是用宪法国家的规范政治权力。为什么钟哲明教授反对宪政呢？钟哲明教授说：“面对这样的理论与实际问题，我们应当向唯物史观求教，要看锦涛同志的提法和中央的文件。锦涛同志提出三个至上：第一，党的事业至上；第二，人民利益至上；第三个才是宪法和法律至上。”钟哲明教授还说：如果三个至上弄颠倒了，就成了唯心史观。可见，钟哲明教授的马克思主义修养其实并不高，只是一个献媚者而已。我苦学马列主义多年，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党的利益至上了就是唯物主义，宪法的实施至上了就是唯心主义。反正钟哲明教授比我张辉能扯淡。

第七，钟哲明教授反对宪政的观点很明朗，反对宪政的动机也很明确——为了党：1.党的利益不能被宪法束缚手脚，这个话扇了邓小平一记耳光，邓小平说，党也要在宪法规范下活动；2.党的事业是第一至上，人民的利益是第二至上，这个也反映了目前的现实，中共执政六十年来的一切人和事，都是为了保证中共能够继续统治下去，人民的利益只在其次。党是什么？党不是空穴来风，党是一个利益载体，在当今中国，党是七千万人的一个大组合。钟哲明教授为了党，确实衷心可嘉，但钟哲明教授是为了七千万里的每一个人吗？是为了最普通的党员吗？是为了最平常的党支部书记吗？我看不是，他没有为这些人的权利说话。

第八，关于多党制，钟哲明教授说：“大家看看新闻就知道现在台湾搞的政党模式多么混乱，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动不动就游行、打斗。韩国、泰国都是多党制国家，现在的局面有目共睹。上台都靠金钱投入，下台后互相倾轧，贪腐坐牢的，跳崖自杀的，出国逃亡的，什么都有。”应该承认，在一些宪政制度不成熟的国家，上层政治经常表现为一种无序状态，台湾就常有这样的状态。但是台湾上层政治虽然有一些缺陷，但台湾人民的权利可是被充分保证了的，他们可以自由地说话，可以游行示威，可以罢工，可以罢免官员，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反观大陆社会，国家主席可以被批斗致死，党的副主席可以被迫坠机而亡，党的总书记可以被囚禁十八年，等等，至于贪污腐败和卖官鬻爵更是家常便饭，上台都靠金钱投入，下台后互相倾轧，贪腐坐牢的，跳崖自杀的，出国逃亡的，也是什么都有，肯定比台湾多得多啦。

第九，关于军队国家化。在宪政国家，军队不能干预国家政治，谁被人民选举为国家领导人，军队就听谁的。但是钟哲明教授认为这样不行，钟哲明教授认定，全民供养的军队必须由一个特定的政党来指挥，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特定的政党能够维持自己的统治。他说话放在当今的中国也没错，因为他的话印证了中国社会的专制性质，一个专制社会必须靠暴力来维持。如果没有暴力，人民会通过选票把不满意的领导人选下去的，中共的领导人都不想被人们用选票哄下台，所以不肯实行军队国家化。——所以钟哲明教授告诫说，要保证共产党的统治，“在这个枪杆子、刀把子问题上决不能有丝毫天真的想法。”

第十，关于民主，钟哲明教授认为：“民主不能简单地用好或不好来判断，需要做具体的历史分析，因为世上没有抽象的民主。”根据辩证法，抽象和具体是相互的，有具体的民主就有抽象的民主，也就是有民主的一般原则。民主就是民主，专制就是专制，这里面有决然的分别。这个钟哲明教授号称马克思主义大学者，其实马克思主义根本没有学好，很可能是一个混了学位的官僚学阀。你说没有抽象的民主，那好，你给中国人民一点具体的民主，让他们有个投票权，让他们通过自由选举国家领导人。

第十一，关于民主社会主义，钟哲明教授也是坚决反对，他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内部实行的一种改良主义，社会矛盾激化后，用剥削全世界得来的钱搞一点福利，使老百姓的基本衣食有保障，不要起来造反，这一套可不是科学社会主义。”钟哲明教授心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钟哲明教授说的很明白：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定义听起来非常肉麻。瑞典、瑞士和挪威等北欧国家认为自己搞的民主社会主义就很好，日本的发达也自称是吸取了社会主义的一些成分，这些先进国家哪一个也比中国更像社会主义。钟哲明教授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成了一个悲惨的样子，公民权利比人家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少，贫富分化却远比人家民主社会主义要大很多。

第十二，关于执政的合法性，钟哲明教授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实现了历朝历代都做不到的富强。什么叫执政的合理性合法性？这就是！对此，我们是既有决心也有信心的。”钟哲明教授这个说法根本没有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的思想，也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秦朝做到了周朝都做不到的富强，人们为什么要推翻它？清朝也做到了历朝历代都做不到的富强，人们为什么要推翻它？我来告诉钟哲明教授，任何靠暴力和谎言维持的专制制度终究都要被人们推翻。政权的合法性只能来源于人民通过正当程序赋予的合法授权，这样的政权才是安全的，才是没有后顾之忧的。

第十三，钟哲明教授还讲了一些其他废话。本人做为一个合格公民，需自重身份，不想再浪费自己神圣的言论权利与其做更多辩驳，因为这个人根本不具备现代公民的意识。（欲了解钟哲明教授全部观点请进：<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74/info1251957450312174.htm>）

2009年11月18日

（源于：民主中国）

《零八宪章》不是什么？

洪哲胜

对于《零八宪章》，它“是什么”，当然是最重要的议题，这方面大家已经发表了很多的精彩议论。我迟迟到现在才发言，谈谈它“不是什么”，铁定比较会有新意吧。

一、《零八宪章》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主张

- ◆ **基本理念：** 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
- ◆ **基本主张：** 修改宪法、分权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独立
公器公用、人权保障、公职选举、城乡平等
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
公民教育、财产保护、财税改革、社会保障
环境保护、联邦共和、转型正义

二、《零八宪章》不是一个把底层人民的利益排除在外的宪章

有人说，《零八宪章》是独立知识分子为自己的利益作出的诉求，它高高在上，没有把眼球放在对于底层人民的关怀，不值得人民大众的支持。这样的批评没有根据。

底层人民如果不是无权的老百姓、就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他们要出头天，要能够在中国的政坛上面以多数人的身分，集体发声，他们就需要拥有一个实行“宪政”的国家，让政府不得滥权，然后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参政、监政，参与“共和”，自利利人。这就需要大众拥有“自由”、“人权”、以及“平等”。所有这些底层人民出头天所必需具备的条件，正是《零八宪章》在其“基本理念”中所罗列了的东东。可见，就理念而言，不管它是哪些人、为了谁的利益所作出的诉求，它绝对“不是一个把底层人民的利益排除在外的宪章”。

细读《零八宪章》所推出的所有 19 项“基本主张”，从“修改宪法”到“转型正义”，也都是底层人民争取当家作主、追求自身福祉的一系列不可或缺有效措施。因此，就其具体主张而言，它也“不是一个把底层人民的利益排除在外的宪章”。

三、《零八宪章》不是一个仅仅争取右派利益的纲领

有人说，《零八宪章》是右派的纲领，仅仅关切右派的政治、社会、经济利益，不值得左派的支持。这样的批评也没有根据。

当今的中共已经不是 1949 年意气风发誓要践行其左派革命理想的中共，甚至不是改革开放之前的无钱可贪的中共。它已经不再保有左派关切工农大众的意识形态，因为，它本身就是大资本家、超大地主、权钱交易的受利者、大尾的社会寄生虫，以及凭藉党政军独裁专政、鱼肉工农大众图利自己的集团——它不但压制争取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迫害争取信仰自由的各种教徒，……，它尤其蹂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有赖游行、示威、罢工、集体争议争取出头天的工农大众。因此，中共剥夺着“它的垄断官僚统治集团以外的所有人民”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以及文化权利。它严打右派，却也对左派更加无情残酷地给予打击。

《零八宪章》既然倡导宪政民主，它自然就不只是右派的纲领、不只是左派的纲领、而是中国全民的纲领。说是“全民”，当然包括中共垄断官僚统治集团。说它追求被压迫者的解放，非常容易理解。说它同时还追求压迫者的解放，真有其事吗？这事当真，因为压迫者如果不想被推翻、被清算、甚至被歼灭，他们可以接受《零八宪章》，安心地把游戏规则从一党独裁改为全民选举，让自己也在新的民主游戏规则底下新生。当左派和右派都在中共的专政下觥觥的时候，《零八宪章》绝对“不是一个仅仅争取右派利益的纲领”。

四、《零八宪章》不是一个主张分裂主义的蓝图

有人说，《零八宪章》主张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就是容忍藏独、疆独、台独，就是鼓吹藏独、疆独、台独，就是搞分裂主义。这样的批评也没有根据。先看所谓的台独问题。首先，中共于 1949 年，把中华民国一分为二，在它所已经窃据（国民党的用语）了的大陆地区，建立它自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把台湾从中国踢走，让台湾不再属于中国。因此，分裂主义的始作俑者不是台湾人民，不是蒋介石的国民党，而是中共自己。有了这样的正确认识再来议论台湾的统独问题才会取得有实质意义的结论。加以，台湾人民已经通过数十年的民主斗争，终结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取得了民主，掌有了自己的命运。今日，台湾是否、何时、以及如何与中国统一，已经不再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民间组织之间可以私了的事务，已经

成为了台湾人自己可以决定、也才可以决定的议题。

既然台湾已经于 1949 年被中共分裂了,《零八宪章》显然无需也不能再分裂台湾。事实上,它正是在这个拥有一个甲子的分裂现状之下,提出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办法,企图探索有无可能取得大陆人民(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和台湾人民(即中华民国国民)可以共鸣、认可,以便进行统一。一清二楚地,对所谓的台独问题,《零八宪章》绝对“不是一个主张分裂主义的蓝图”。

再谈藏独和疆独问题。藏独和疆独有着分离主义的倾向。不过,无风不起浪,这样的倾向之所以会发生,乃是由于中共不尊重人民自决权,不尊重自己《宪法》所规定的真正的民族自治,不尊重藏人、维吾尔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尤其是宗教信仰自由。在此,分裂主义是既有的事实,而且其责任承担者乃是中共。《零八宪章》提出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主张,非常明显地不是要强化分离,而是要为消弭分离提供药方,希冀根据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所揭橥的“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的原则、采用富有包容力的联邦制方案、促使少数民族自愿地选择留在中国境内。因此,对于藏独和疆独的议题而言,《零八宪章》也绝对“不是一个主张分裂主义的蓝图”。

五、《零八宪章》不是一个向专政者叩头的请愿

有一些激进党人从相反的面向反对《零八宪章》。他们认为《零八宪章》太软弱,是在向中共专政者叩头请愿,甚至有着想要接受招安的存心。这样的批评也没有根据。宪政民主乃是今日中国人民自救的最优途径和近期目标。《零八宪章》的目的就是要走这条途径、要争取这个近期目标。如果向中共叩头,可以达成这样的目标,为什么不可以向中共叩头?!不过,《零八宪章》显然不认为叩头有用,因此它没有叩头,而是用底下这样的吁求来宣示它达成目标的手段:

“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分,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它把希望寄托在可以导致成熟的公民社会的一场公民运动。这就表示《零八宪章》认为,没有成熟的公民社会,通过一场暴力夺权,不会导致真正的民主,而只会重复以暴易暴的历史轮回。因为,终究而言,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人民要能驯服政府,要想永葆民主的青春,首先必需在民主运动当中自我启蒙、自我充电,自我形塑公民社会、成熟公民社会。可见,《零八宪章》“不是一个向专政者叩头的请愿”。

六、《零八宪章》不是一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檄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把《零八宪章》当做是一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檄文,而骚扰众多《宪章》的签署人,并且长期羁押它所认定的主要起草人刘晓波博士,并且企图判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样的认定是毫无根据的。

少于五千言的《零八宪章》没有任何一段文字、一个句子、乃至一个字,明示地或暗示地呼

唤人民起来使用武力非法推翻政府。相反地，它呼唤一场公民运动，让人们在运动当中意识化起来，形塑公民社会，然后凭藉觉醒了的公民去驯服政府，让专政者深深地意识到，继续专政再无可能，改而奉行宪政民主则是活路一条。专政的政府终将改弦更张，终结专政，还政于民。此时全民合议，采取《宪政》的第一条“基本主张”，合法地修改宪法，走出宪政民主的第一步。这里没有谁颠覆谁的问题。它要做的乃是催生、营造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让宪政民主水到渠成。可见，《零八宪章》绝对“不是一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檄文”。

七、小 结

◆认为关切底层人民利益是第一优先大事的人们，应该支持《零八宪章》，因为它“远”不是你们所想象的“一个把底层人民的利益排除在外的宪章”。

◆认为争取工农当家作主是中国人民自我解放的条件的左派，应该支持《零八宪章》，因为它“远”不是你们所想象的“一个仅仅争取右派利益的纲领”。

◆认为防止中国分裂是中国人责无旁贷的第一优先大事的人们，应该支持《零八宪章》，因为它“远不”是你们所想象的“一个主张分裂主义的蓝图”。

◆认为向中共叩头请求中共改革、甚至心存接受中共招安念头乃是最大罪恶的激进派，应该支持《零八宪章》，因为它“远”不是你们所想象的“一个向专政者叩头的请愿”。

◆认为《零八宪章》的签署人应该给予骚扰、它的主要起草人应该给予判刑关押的中共头头应该终止你们的一切迫害，而且应该支持《零八宪章》，因为它“远”不是你们所想象的“一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檄文”。

（源于：民主中国）

维权之脚与宪政民主运动之脑

陈 卫

人类的文明史大概是人们争取幸福的历史。人类在自然界中是渺小的，人们不得不结成群体相互扶持，共同面对生存和发展的挑战。人们不但以科学技术延伸自己的力量，用文学、艺术、宗教来寻找生活的意义，同时人们也发现人群的结构即政治制度。是关乎结果的东西。

政治制度大概是所有知识里最奇怪的了。这并不是说它的理论多么复杂和高深，而是由于其结果关系到许多人的长远利益，被别有用心的人或故意或无意识的引到了歧路上。在暴力的威胁和谎言的粉饰下，连最智慧和最具勇气的人们也只有对权利者及其附庸建造的不公平秩序望而兴叹，要么发出悲怆的哀鸣，在这个怪兽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要么视而不见，在象牙塔中做着自欺欺人的美梦。

人们渴望在公平和正义的社会中生活，从表面上他们确实得到了他们应得的东西。不过这都是画饼充饥。剥夺者总是将乔装的正义硬塞给他们。在正义的包装盒中却是绝对的不公平。人们的渴望一次次被充当着炮灰，一次次美好的愿望最后都在替他人做嫁衣裳中成为泡影，不得不接受被修改的正义和被剥削的公平。

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中，专制在大多数时间占据了舞台，扮演着充当黑哨的角色，让那些占据权利金字塔顶端的人心安理得地成为这场比赛没有悬念的赢家。让形形色色的秦始皇卑鄙而又自然的理想顺理成章的延续下去。不过，人性始终是浩荡的洪水，专制的大坝无法始终将其驯化成沉默的羔羊。稳定是专制者的理想，是强盗对肉票的奢望。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的建立一个吸血的天堂。

历史在强盗们走马换将中展开画卷，但是只见当权者吃肉，而大多数只能喝汤。不管城头悬挂什么旗帜，但是他们都十分默契，宣称只有他们这样优秀的人才统治的力量。

但是，再完美的谎言都经不住事实的冲击，民主精神在一次次冲击专制的大坝时获得了广大的承认。跳出专制之桎梏后，广阔的天地毫无遮拦的展现世人面前，原来美丽的谎言只是经不起风雨的肥皂泡。

中国人民追求民主的道路崎岖又漫长，理论的缺乏、现实的残酷双重折磨着追求民主的人们脆弱的心灵，在这个过程中无数人在扑向真理的彼岸时被烈焰灼伤，少数人在泥沼中蹒跚前行。

专制依靠精心编制的谎言来使事实上的不平等披上公平的外衣，用暴力和宣传迫使人们放弃质疑和反抗，但是民主却用最简单的平等概念直达人心。在良心面前、在受到压迫者的亲身经历面前，民主的价值观念长驱直入，专制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之争和暴力维持的张狂。

中国现代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是在妄图以高远的理想控制所有人的思想剥夺所有人的权利的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人们怀疑并抛弃后产生的。中国的民主运动来得很晚但是却再也不迷惑和彷徨。从西单民主墙、八九民运、九二自民党组党运动、九八民主党组党运动到《零八宪章》的联署发表，民主运动从怀疑权威、要求自由、冲击党禁到要求宪政民主，走上了一个个台阶。从个人情绪走向普世价值，从理想走向现实，从浪漫走向理性，民主运动越发具有更坚实的基础，越来越具有现实政治的意义。

与此同时，维权运动也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维权与民运成为中国民间政治运动的两把尖刀，冲刺在与专制斗争的最前沿。对于维权运动和民运之间的关系，很多人都非常关心，并引发大家的思考。我不准备就大家的争论进行回应，但是我想就他们之间的关系作一个简单的梳理，并作一个形象的比喻。

一、维权的兴起其实是民主运动长期努力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是不讲究什么个人的权利的，他们眼中只有他们把人民当作筹码和工具的权利。他们也不讲什么法治，他们的法治实际是要求人们俯首帖耳任他们奴役和宰割的法治。但是民运首先就是要讲平等这个基本的道理，将人权作为政治伦理的出发点，将法治作为基本的要求。虽然人权理论被当局以生存权、发

展权等动物权利进行歪曲和抹杀，将法律变成约束人民的绳索。但是民运却毫不动摇，始终以人权等普世价值对抗宣传机器的谎言，人权理论逐渐深入人心，法律也变成自卫的盾牌和囚禁猛兽的笼子，这正是维权兴起的原因。

二、我认为维权运动实际有三种形态：1）为自己维权；2）替别人维权；3）将维权和民主事业联系起来的维权。

大家普遍认为维权就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权利受到侵犯而采取种种措施捍卫自己的利益的活动。这些维权行动是在承认现行法律秩序基础上的合法行为。大致可以有法律诉讼的延续（比如申诉、上访等），以及围绕诉求的一系列其它行动，比如示威、针对性的威胁行动等。这种类型的维权是维权事件的主角。正是众多权利受到侵害的人们不依不饶的坚持自己的权利才汇集成了维权运动的洪流。

但是维权行动并不仅仅限于维护自己的权利。由于个人在制度面前的弱小，力量和信息的完全不对称，人们认识到光靠个人维权，是达不到维权的效果的。在维权的道路上，聚集了许多从维护自己的权利到为别人维权的人士，所谓人权捍卫者很多就是这样的人。所谓久病成良医，这些人权捍卫者大多数都有为自己维权的不堪回首的经历。在一次次漫长而心酸的维权过程中他们了解了许多关于人民权利的知识，他们也掌握许多的维权技巧，共同的不公正经历使他们对其他人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互助是他们的选择。比如今年2月发生在成都中院的“链子门”事件中，黄晓敏、幸清贤、严文汉、陆大春等人就是这种为别人维权的例子。黄晓敏等人本来与这个示威活动没有关系，但是也对成都冤民的行动尽力支持。陆大春则是从十几岁开始上访维权，后来他专门在成都访民中维权，幸清贤则是由于维护自己和其他工人的权利受到中铁二局开除后一直关注劳工维权。

还有一种就是从民主理念出发的维权行动。这些人认为民主的目的就是每个人的权利得到保护。这些人密切关注侵权事件，特别是因滥用公共权力给人们带来的侵害。他们将对民主的追求化作日常的维权行动。将高远的理想变成为人所容易接受的东西。比如，黄琦创建六四天网、谭作人不顾个人安危不信中共的虚假宣传进行地震死难学生调查。他们都不是为了自己的权益和替别人维权，但实际是在维护许多人的权利。

三、维权是现实民运的选择，民运是维权的必然结果。民运搞了许多年，但是民主并没有在中国开花结果，维权在现实中也是举步维艰。民运人士认识到民主是关系整个社会秩序的问题，是对现行专制制度的挑战，因此，在高压的专制社会中，民运的风险很大，成本很高。而且民主是一种社会安排，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为民主做出贡献，但民主实现后也一样可以享受民主的果实，所以跟个人的利益联系很少，所以“无票乘车”就是一种合理的选择。这导致了民运在高压下一一般都呈现萎靡状态，是先知先觉者的艺术。但是维权则绕过最终目标，力图寻找现实的支点。维权在不寻求整个社会的解决方案，而是利用现行的舞台达到自己需要的结果。所以通过维权，民运可以找到一个广泛的基础。而维权的开展也逐步让大家认识到，这个制度是一个产生腐败和不公正的根源，维权只是局部修整方案，人们维权的努力往往只能付诸东流。维权的人们不可避免的会思考造成他们不幸命运的原因，意识到维权的局限，从而理解到只有民主才是真正的维权。

维权和民运是不可分离的。当然，维权不能等同于民运，民运有更多的要求，民运除了维护

个人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将社会合法性的基础放在人民的同意上，这与维权是一致的，但是程度是不同的。更重要的区别是，维权的目标有限和参与的对象不同，维权的目的是具体的经济利益或其它个人权利，参与者也是比较明确的权利受到侵害者，但是民运则是关注的整体社会公正，有比较成熟的政治主张，参与者可以说形形色色，他们参与的原因各有不同，但都是对社会进行了长期的思考。

但是一些人从民运的高度退回来，将注意力集中在维权上，我认为并不是倒退。维权模糊了与制度的冲突，实际马上拥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将与专制的战争从少数精英的勇士行为扩大到众多维权者的自发行动。政治运动必须要有更多人们的参与，我认为这是一条可行的道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政治智慧就是将高远的目标化作一个个容易被接受的具体行动。这么说来，维权在许多人的参与下不但力图解决被侵权者的当务之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唤醒了人们的权利意识。朴素的维权走向理性的维权，即从维护个人的权利到维护大家的权利，维权的尽头就是宪政民主的开始，这实际就是宪政民主的道路。所以我认为维权就是民运的脚，一步步走向宪政民主的目标，而宪政民主则是维权之脑，只有宪政民主实现了，制度性的侵权才会根本消亡，维权也就会失去其意义。

（源于：民主中国）

宪政民主：民主的系统工程

陈 卫

对大多数社会来说，政治制度的来源不外乎有两个，一是沿袭传统，二是进行改革。传统是一个巨大的宝库，但是它也是一个巨大的漩涡，许多人很难从里面脱身出来。所以因循守旧是历史的常态，而变革则是难得一见的异类。

社会变化时期在两个方面造成了制度变革的需求，一是新兴群体对权利和利益要求重新分配，第二是社会公平性总是在社会变化时期以各种面目出现，并博得大家的认同。

政治制度的种类很多种，但是剥去神秘的面纱我们可以简单的划为两种，一种是专制，一种是民主，当然这是比较简单的划分方法，但是这种区别却解密了政治制度下面本质的东西。专制的政体表现个人独裁、群体独裁和多数专制。

个人总是追求利益，但是人群却将公平和正义放在首位，这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统治者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利，而建立理想国的声音在疯狂的打压下却不绝如缕。今天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封建专制没有市场了，但是我们依然没有享受到民主的果实，专制的变种一党专政披着民主的外衣延续古老的神话，百年的民主梦想依然是海市蜃楼。

我认为民主并不是高远的理想，专制也不是完美的童话。但是有几个方面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第一，当政者拒绝宪政民主实并不是由于理念的差异，而是利益的驱动。从来卧榻之

侧就不许他人酣睡，正是一些人将公共权力当作私家花园，他们才会产生那么明显的视觉盲点，他们才会理不直气很壮的拒绝宪政和民主的实现。第二，民主是一个系统工程，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切权力归人民，由全体人民掌握这个国家就行了，民主还必须配以宪政、人权、法治、言论自由等具体的制度或精神才能真正巩固。第三，民主不应该仅仅是思想上的变革，更应该是实际的运动，民主从来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深受专制之害的人们持续斗争的结果，是一点点从掠夺者手中抢回来的。

驳斥谎言并不需要太多的理论力量，谎言的成功并不是真理的缺乏和软弱，而是强权的结果，我们可以说强权之下无真理，就像历史上赵高成功地指鹿为马。同样，一个团体就可以永久代表人民，它可以永久的先进和正确和因为国情的独特那些被认为是普世价值的东西会在我们这里水土不服的说法也是经不起任何推敲的，一句话，貌似公正的理由之下实际包藏的是不可告人的私心。

民主曾经像旗帜一样引导无数的中国人为之奋斗，但是民主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要让民主在中国开花结果，我们必须从表面的涵义深入到其精神内核和制度层面去了解和把握，因为民主的敌人正是用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来蒙蔽人民作为拒不实行民主的托辞。

去年12月9日，303名中国各界人士联署发表了《零八宪章》，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作为首批303个联署人之一感到无比自豪和无限欣慰。这表明中国的民主运动的精神已经从单一追求人权和具体单个的目标上升到整体性的系统的层面，我们毫不犹豫的可以将其作为一个里程碑。显然，全面揭示其深刻内涵既不是一篇文章能够做到的，也不是我的学识能把握的，就此，我只想就几个我认为的重要问题谈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宪政民主不是有了宪法就可以的，宪法和宪政民主是有区别的。宪政民主是一种精神的体现，它规定权力来源于人民，它的手段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而宪法则只是一个法律文件，对专制国家仅仅如此而已。我们只有认识到宪政的精神是必须在人人平等之下的约定，就可以将其与那种在威胁或强权下的忍气吞声的城下之盟区别开来。对我们中国来说，尤其是将一个政党的统治地位写进宪法，这本身就是违背宪政的精神，所谓坚持什么的“领导”不外是统治的代名词。

第二，宪政的特点是保护人权。我们可以认为公共权力是我们每一个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自愿让出的权力组合而成的，这是社会契约论的精髓。人们绝不可能同意一种侵犯自己权力的制度安排，因此人的权力（包括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各种自由）成为了宪政民主的出发点和归属，政府也就成了守夜人和看门狗。

第三，宪政也就变成了限政。政府的权力被限定在人民赋予它的提供公共服务这一目的上，超出此目的的行为将被视为威胁到人民的权力，就是违法的行为。所以，宪政民主中的政府是有限政府，不仅它的权力有限，它的目的也是有限的。由此，那种无限作为的政府就从此成为历史。

第四，宪政民主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就是不要相信执政者。这个假定人类为此付出了高昂的学费。中西方的先哲都曾经提出让那些高尚贤明者执掌权力为民造福的思想，儒家学说里的

君子通过修身齐家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和柏拉图的哲学王就是这种代表，但是事实证明这种思想实际太天真了，人们一次次包含希望，但收获的却是背叛。我们不否认这种思想无疑出发点是好的，但却是靠不住的，它实际在不知不觉间让人们放弃了对权力的监督与控制，或许，我更愿意将它比作精神鸦片。宪政民主对人性的假定是对掌权者不相信并不是不相信他们，而是没有必要相信他们。这样主次就明确了，贤者不损其好，而伪善者则无法行恶，他们只有通过忠实的按照人民这个主人的意志行事才能立足。

第五，民主是宪政的核心，民主意味着主权在民，人民是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因此，政府的权力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同时政府的权力必须在人民的监督之下。既然它是人民赋予的，那么它也是人民随时可以收回的，所以某种形式的普选和直选是必须的。我想不出离开了普选和直选人民的意志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表达，同时，我们也能看出那种把特殊的政治见解和具体的集团写进宪法作为先决条件是多么不符合民主和宪政的精神。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民主也是有局限的。苏格拉底是在民主制下被判处死刑的、法国大革命和文革的例子说明民主的旗帜下多数人的暴政也是必须警惕的。

第六，宪政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主张，同时它更重要的是有一套经过考验的成熟的制度，这是无数先哲的思想结晶，数千年历史经验的总结。代议制和三权分立是宪政民主制度的重中之重，代议制实际就是议会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是一个理想，但是除了小国寡民外，人人执政既是不现实的也是极不具效率的。代议制实际就是人人当家作主在操作层面的一个替代物，三权分立是宪政民主的制度保证。当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进行分立和制衡时，这三种权力的功能凸现出来，各尽其责，但它们相互制衡和约束则使国家权力不致成为危害社会的猛兽，而成为驯服的耕牛，政治学从白日做梦走向了理性的彼岸。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代议制和三权分立虽不是完美的，但是人类目前所能找到的最好制度。

第七，《零八宪章》提出设立宪法法院进行违宪审查，这也是非常必要的。宪政民主的精神如果不在具体的法律和行为中贯彻下去，就是一句空话，而没有审查和监督制度执行就无从谈起。由于宪法的特殊性，宪法法院应该从其它法律体系中分割出来，以保持其独立和公正，成为宪政民主的坚实屏障。

第八，在宪政民主中，军队的只能作为保家卫国的工具，而不再成为政治斗争的砝码和政客的私人奴仆。军队介入政治纷争，就是抛弃公平，向强权屈服，这显然不是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公器公用这并不是很难的道理。

第九，《零八宪章》提出了联邦制，这在中国民间政治主张中是比较突兀的，也是引来较多误解的一个主张。其实联邦制并不是一个奇怪的制度，或者象有的人想象的是分裂国家的桥梁。我认为联邦制是大国实行民主的手段，联邦制其实是一种高度自治，是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一种新型的关系，它的基础是承认各自的权利，它的精神是和平和妥协。联邦制至少是在尊重对方的权利下的现实的制度安排。特别是我们中国目前台湾统一问题，新疆、西藏的民族情绪高涨，都是非常容易引起巨大纷争和走向大家都不愿看到的局面的，还有香港、澳门的自治已经是现实，所以联邦制是一个科学和现实的选择。

宪政民主还有许多内容，《零八宪章》中提出了十九个主张，都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象开放党禁、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目前首先要达到的目标，但是限于篇幅就不再

论述。

我相信，《零八宪章》的起草者和联署人找到了正确的目标，这只是第一步，我们还需要正确的道路。

当今中国的现状确实令人堪忧，理想的缺乏、政府官员道德丧失、腐败和社会不公平在各方面吞噬这个国家的肌体。生存还是灭亡，这是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不得不回答的问题。也许我们尽力而为只是有一点机会，如果我们不去面对，不去正视，就一点机会都没有。

科学战胜愚昧，依靠的是其可以验证的结果以及有错必改不断更新的开放态度，宪政民主取代专制依靠的是其建立在公平正义原则之上的开明精神以及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完善的制度，当然还有无数人为此不懈的努力。

我们并不遗憾，我们没有生活在宪政民主国家中，但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可以宣称我们生活在宪政民主精神中，并为之奋斗！

（源于：民主中国）

支持刘晓波

陈子明

2009年6月23日，北京市公安局在软禁刘晓波半年多之后，正式逮捕了刘晓波。这一系列做法，严重地违反了宪法和法律，以及国际公认、中国政府也已承诺并签署的世界人权准则。我首先要说的是，这种倒行逆施的行径，达不到有关当局想要达到的任何一个目标，而只能成全晓波，并进而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的一句老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一）我和晓波结识于1989年5月14日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召开的一次学术沙龙。从1988年11月起，我和王军涛牵头的“中国现代化论纲”课题组，一共召开了十几次中小型学术讨论会，最后的两次会是在学潮期间召开的。在我的刑事判决书中，引用了我在4月23日会议发言中的一段话，其实那次会议与学潮没有任何关系。判决书中没有提及的5月14日会议，却多少与学潮有所关联。陈小平在《老顽童刘晓波：我有心成仁监牢奈我何》中说，他和晓波“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开始商量如何动员北京高校老师出来支持学生运动的”。晓波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关于我和“六四”》中回忆，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王军涛、陈子明、闵琦、郑也夫、吴稼祥、王润生、陈小平、郑棣、中国青年报社的记者和其他的人”。我记得这次会的出席者有20多人，除了晓波所提到的人，应当还有刘卫华等人。我在这次会上只是与晓波简短地交谈了几句，吃午饭时晓波与军涛挨着坐，曾有过长时间的争论。晓波与我们在这次的相识，成为他随后参加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的一个契机。

在我第一次“保外就医”期间（1994年5月13日至1995年6月25日），老包（包遵信）、晓波、周舵和原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陈子明、陈小平、闵琦、刘卫华等形成了一个新的工作团体。1995年2月20日，发表了由晓波起草，由包遵信、王若水、陈子明、徐文立、刘晓波、陈小平、周舵、吴学灿、闵琦、沙裕光、廖亦武、金橙 12 人签署的《反腐败建议书——致八届人大三次全会》。2月27日，发表了由陈小平起草，由上述 12 人签署的《废除收容审查保障人身自由——致人大八届三次会议》。5月底，发表了由晓波和陈小平共同起草的《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这个呼吁书的发起人是：王之虹、王丹、包遵信、刘念春、刘晓波、江棋生、吴学灿、沙裕光、陈小平、周舵、林牧、黄翔、廖亦武、金橙，签署人有：芒克、栗宪庭、蒋樾、王东海、马少方、陈龙德、郑旭光、马少华、吴双印、杨海、杨宽兴、刘贤斌、金艳明、勾庆惠、徐永海、陈权、宋旭民、汪青、李智英、王志新、张玲、黄庭金、纪晓、李国萍、李金芳、何德普、侯宗哲、王毓芳、李海、钱育民、晓韵、李继妍、海蓝、李爱民、杨靖、王永清、高军生、邓焕武、张宗爱、张健康、刘俭、王自强等。当时我仍在服刑期，大家建议我不要签名，由我的妻子王之虹代我出面。这个呼吁书发表时，晓波已经被公安局变相监禁，与 13 年后的情形几乎是一模一样。6月25日，身患癌症的我被再次投入监狱（保外就医时的病因是“皮肤瘙痒症”）。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团体就无法继续工作了。晓波于 1996 年 1 月释放后，他和刘霞夫妇、陈小平夫妇、刘卫华夫妇经常请之虹一起吃饭和休闲，给予了孤身一人的之虹以极大的安慰和帮助。

此后一直到 2002 年 10 月服刑期满，我无法再接触包括晓波在内的任何一位朋友。当我再次见到晓波时，我发现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工作方式和论说风格。虽然同为自由撰稿人，我的写作领域、题材与他有所不同，但是我始终欣赏、支持晓波的各种探索和努力。2004 年 2 月至 2005 年 8 月，我和何家栋先生办了一个“改造与建设”网站，服务器放在国内，并办理了 ICP 备案手续。新闻办官员后来明确告诉我，有人就网站转载刘晓波文章《昨日小延安今日大中国——毛泽东批判》打了小报告，是负责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层领导人亲自下令取缔这个网站的。

我和晓波，是被当局称为八九民运“黑手”而至今仍留在国内的不多的几个人。1991 年 4 月 2 日，我和王军涛、任晓町、包遵信、王丹 5 人从秦城监狱转移到北京市第二监狱的禁闭室关押。现在，老包已经去世了，其他 3 人先后被迫流亡海外。1996 年 10 月 8 日，刘晓波因为与王希哲联署《对当前我国若干重大国是的意见——致国共两党的双十宣言》而被劳教，王希哲随即逃亡海外。我们留在国内并且继续为中国民主化而奋斗而发声的人，理所当然要相互理解并形成联合阵线。

（二）在过去 20 年中，晓波已经四次被当局关押监禁。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三次的情形：

1989 年逮捕晓波的主要罪状，是他发起了“六·二”绝食。我们只要读一读晓波起草的《绝食宣言》，就可以理解他和周舵、侯德建、高新 4 人当时的心境：“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敌人意识成为中国人的遗传；1949 年以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更把传统的仇恨心理、敌人意识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极端，此次军管也是‘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的体现。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开始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李鹏作

为总理犯有重大失误，应该按照民主程序引咎辞职。但是，李鹏不是我们的敌人，即使他下台，仍然具有一个公民应享有的权利，甚至可以拥有坚持错误主张的权利。我们呼吁，从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放弃旧的政治文化，开始新政治文化。我们要求政府立即结束军管，并呼吁学生和政府双方重新以和平谈判、协商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对立。”由于晓波等人有劝说学生在“六·四”清晨撤离广场的功劳，1991年法院对他的判决是“免于刑事处罚”。

1995年5月18日晓波被当局变相关押的原因，是起草、签署和发表上述两封建议书和拟议中的《“六·四”六周年呼吁书》。《反腐败建议书》提出了近期改革的七项目标与远期改革的五项目标。前者是：（1）设立人大反腐败委员会，担任该委员会成员的人大代表应脱产全职工作；（2）人大为挥霍浪费国家财产制定特别法；（3）实行法官终身制、考任制；（4）制定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办法，可以参考南朝鲜制定的银行存款不得匿名、化名的法律。（5）制定国家公职人员不能在任期内从事商业经营的法律，其私人资产必须交给法定机构委托经营；（6）人大应该根据宪法第三十五条制定特别法律，支持设立民间的举报中心，允许创建民间的《反腐败报》；（7）取消执政党对现有传媒（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机构）的全面控制，制定新闻法。后者是：（1）开放党禁，实行多党竞争执政地位的公开的、全民的、平等的、直接的选举制度。使在野党成为有效制约执政党的合法政治力量。（2）实行权力分离，相互制约的宪政民主制。把人大和政协改造为独立于执政党的立法机构，使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真正分离。（3）创立独立的宪法法院，对执政党、人大、政府、检察院法院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和惩治。（4）开放报禁，允许民办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社的合法存在，使社会传媒真正成为制约政治权力的第四种权力——公众舆论监督的权力。（5）在宪法上明确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使现有的国有、集体、私有财产获得同等的法律地位，进一步实行产权明晰化的改革。《“六四”六周年呼吁书》重申了制定《新闻出版法》、《结社法》、《人的权利和自由宣言》、《宪法法院法》的要求，并指出：“我们从‘六四’的教训中提出的以上建议，仅仅是‘六四’所涉及的诸多法律问题中的四项，其他的诸如军队的性质与职能，执政党实际上集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军队指挥权于一身等问题，乃至独立的司法制度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地逐步反思和检讨。中华民族在走向现代化民主社会的过程中曾历经磨难，‘六四’是又一次大磨难。然而，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良知、智慧、勇气、信心和毅力面对泣血的伤口自省，那么苦难就是最宝贵的财富，一个历经磨难的民族就是富有的、深邃的、充满希望的。”由于公民提出上述建议合情合理，没有任何违法的问题，当局在非法关押晓波7个多月后，不得不将他释放。

1996年8月11日，刘晓波与王希哲会见于广州大北门外兰圃，就若干重大国是交换了意见，并商定于10月10日对国共两党发表宣言。宣言说：“我们的意见是，为早日取得两岸和平统一的共识，为达求同存异之目的，国共双方及海内外各民主党派，各政治力量都应该也可以重新回到1945年10月国共双方签订的《双十协定》和1946年1月各党派《政协决议》的原则基础上来。”“‘凡是人家民主国家有的，我们中国也应该有。’这就是中共在《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中主张的基本精神。”“周恩来致马歇尔的信说的很清楚：‘吾人相信中国将采取之民主，应效法于美国。’……周又说：‘军队制度，应该以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军队制度为改革的榜样。’”“我们郑重呼吁，北京当局，台北当局，应立即展开政治谈判，双方都应该抱有这样的共识：无论哪个当局，谁愿意回到当年大家都签了字的《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的原则上来，谁愿意在实践中真正实行上述文件中应诺给予人民的现代各民主国家人民都享有的人权和民主，这个当局（或联合当局）就必将真正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宣言批评“作为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江泽民，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据宪法交给他领

导的军队擅自宣布由‘共产党绝对领导’，这是极端违宪、极端错误的行为，他应该受到弹劾。”这一次，当局将晓波判处劳动教养3年，从1996年10月8日到1999年10月7日。

（三）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知道，对于晓波也好，对于其他签署者也好，《零八宪章》并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宪章所表达的主要内容，在10多年前就已经有过系统的阐述。公布宪章所采用的多人联署方式，每年就有十几次到几十次之多。联署并公布《零八宪章》，旨在对《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和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表示一种赞同与庆贺之意。《零八宪章》具有了历史性的意义，拥有了空前的联署人数，这完全是当局对刘晓波采取法外措施的结果。

当局在《零八宪章》公布前夕突然对晓波实行“监视居住”，表面上是针对《零八宪章》，实际上是针对六四20周年的纪念活动。当局通过各种手段得知，晓波和朋友们正在筹备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便打破了近十年来他们业已和大陆异议人士在反复博弈中实际形成的“红线”，企图通过“杀鸡给猴看”对后者造成一种新的威慑态势，以便平安度过2009年“六五二一”这个大坎。在“六五二一”办公室的眼里，晓波不是在法治国家享有不可剥夺的人权的一名公民，而是他们“维稳”排兵布阵中的一枚棋子。什么时候挪动这枚旗子，他们是经过精确计算的。

这种霹雳手段对于晓波本人是没有任何效果的。从劳教结束以来，晓波时时刻刻准备接受新的考验。现在的结果，对于他来说不过是“求仁得仁”而已。将来他和像我这样的“反革命颠覆罪犯”说话时，就会有更多的底气。更进一步说，当局此举是在为未来的反对党准备领袖人物，为诺贝尔奖的颁发机构推荐候选人。

这种恐吓手段对于晓波的朋友们也是没有威慑力的。历史毕竟是进步了。毛泽东时代可以枪毙遇罗克，邓小平及邓后时代只能让刘晓波坐牢。在当今中国，为了推动人权和民主化事业，不惜坐牢的岂止晓波一人。在晓波“监视居住”期间，大家考虑到他的安危，说话不免偏于谨慎；现在公然“以言入罪”了，大家说话也就没有必要多所顾忌了。

晓波被捕后，国际国内的声援风起云涌；而在官方的电视、报纸甚至网络上，却看不到有关此事的只言片语。谁得道多助，谁做贼心虚；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谁站在历史错误的一面；不是一目了然吗！

据我了解的情况，中共最高层在如何处理晓波的问题上，意见并非一致。现在晓波被捕，说明强硬派暂时占据上风。但事情还没有完结。虽然按照法条的规定，晓波这次会被判处5年左右的徒刑，但还有5%的其他可能性，不能排除再次“免于刑事处分”。世界上的朋友们都站出来为晓波说话，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就会促使事情向好的方面转化。我们仍然希望，当局能够认识到审判刘晓波的愚蠢性及其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危害性，及时悬崖勒马，从“镇压”转向“协商”，从“专政”转向“宪政”。

（源于：北京之春）

从柏林墙到《零八宪章》

楚江风

2009年11月9日是柏林墙被推倒20周年的纪念日，20年前的那一天，伫立了28年零3个月的柏林墙被民众愤怒地推倒，此举既标志着德国的统一，更标志着共产主义在东德的彻底土崩瓦解。柏林墙的倒塌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继柏林墙倒塌以后，1989年的12月底，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政权也被民众推翻，两年之后的12月26日，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苏联也宣布解体，齐奥塞斯库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显然与此存在一定的关系。

东西两德合二为一，拥有民主制度的西德最终统一了东德，让东德民众结束了几十年专制统治的痛苦历史，遗憾的是，前苏联的解体却仍然未能让之后的俄罗斯在政治体制上摆脱专制的宿命，但比起原有的政权，新的俄罗斯政权仍然要人性得多。提起柏林墙的倒塌和东德的解散，不能不让人想起同一年发生在中国的那场政治运动，也许，正是因为有了之前中国民众的觉醒和流血牺牲，才鼓起了东德民众对抗专制的勇气，提前促成了专制东德的破产和两德的民主统一。

柏林墙的倒塌对于中共以及其它共产主义国家统治者来讲，不仅并非一件高兴的事情，而且永远都是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如此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在中国却不太为一般的人所知晓，随着岁月的推移和互联网的发展，如今，中国媒体对有关柏林墙的报道不再显得像以前那般过敏，但在报道方向上却明显在避重就轻，它们更为看重的不是柏林墙的倒塌对东德政治制度的影响，而是导致两德统一的这种结果。其用意何在，相信是不言自明的。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均发生了政权更迭，原有的共产主义制度最后均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取代，史学家称这一系列的事件为“苏东剧变”。“苏东剧变”后，大多数专制国家只存在于亚洲，因为苏联的解体，中共所统治的中国最终成为了专制国家的龙头老大，诸如朝鲜、越南等小专制国家无不以中共的马首是瞻。

回顾历史，扫描世界，我们不难发现，在曾经的共产主义国家和继续存在的共产主义国家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位居世界的前列。邓小平曾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论马克思等人将共产主义社会描绘得如何美好，以邓小平的这种标准来衡量一个社会的先进与落后的话，可以说共产主义无疑是远不如资本主义。

邓小平善于见风使舵和明哲保身，并且也不乏一丝开明，但在政治思维上并不比之前的毛泽东先进多少。他在推行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之后，始终无法走出一党独大和自私自利的思维局限，在血腥镇压了当年的民主运动之后，便让继任人江泽民高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被封“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六四”以后，中国的政治改革不但没有继续推进，政治环境反而有每况愈下的趋势，但在经济方面却在不断地与西方先进国家接轨。

跛足改革虽然延续了中共的专制统治，但也将中国社会推进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深渊，严格地讲，从江泽民时代开始，中国就已经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国家，但说它是地道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符合现实，因为中国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自由度远都不能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财富基本为官员以及和官员有勾结的商人所掌控，而权力资源也开始由比较公平的分配走向今天的集体世袭和买官卖官。

和 20 年前相比，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态也和当年无法同日而语。走在中国的大街上，你会发现到处都是车水马龙的景象，但是，在表面繁荣的背后，中国社会却是民怨沸腾、危机四伏，因为官权对民权的压制以及对民财的收刮比 20 年前更为严重。德国的柏林墙倒塌了，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却有一堵堵比柏林墙更为坚实和高大的墙体在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虽然无数的民主人士在 1989 年的时候“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依然活着的人仍然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中国的变化和致力于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当年的北师大讲师刘晓波博士虽然因为参加学潮而锒铛入狱，但在获释后仍然是矢志不渝，即使几度失去自由，也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民主理想。2008 年 12 月 8 日，因为他和张祖桦均被当局视为推动《零八宪章》运动的核心人物，结果双双被带走，张祖桦幸而获释，但仍长期遭受严密监视，而刘晓波则至今仍身陷囹圄。

当局企图以抓捕刘晓波的方式来阻止《零八宪章》发布的阴谋最终未能得逞，原定于 2008 年 12 月 10 日发布的《零八宪章》最后不但未被扼杀腹中，反而提前一天公之于众。抓捕刘晓波的举动并不能让其他追求民主与自由的人们感到胆寒，《零八宪章》因为刘晓波的被捕而显得更加悲壮，更具吸引力。虽然众多的《零八宪章》签署人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骚扰，但其后的签署人仍然是接踵而至，数不胜数。正印了中国的一句古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德国的柏林墙早就轰然倒塌了，而中国的柏林墙却无处不在，网络柏林墙阻挡着人们获取自由资讯、经济柏林墙阻挡着普通老百姓发家致富、政治柏林墙阻挡着政治改革的推进和民主制度的到来。《零八宪章》虽然只是一个征集签名的文件，但它却向中共当局发出了呼唤民主的最强音，撞击着中国社会大小、各式各样的柏林墙。

柏林墙倒塌 20 周年之际，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领导人齐聚德国柏林，和德国民众一道共同庆祝推倒柏林墙 20 周年。包括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前波兰总统瓦文萨等在内的一些当年的历史性人物也作为贵宾前去参加这次纪念活动。可以想象得到的是，中共领导人绝不会去参加这样的活动，他们对这样的活动甚至是唯恐避之不及。从道义上讲，一个类似于前东德的政权也没有脸去参加这样的活动，除非中共当局确实有政治改革的意向和决心。

今年的 12 月 9 日是《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的纪念日，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大陆，当局无论如何也不会允许人们去公开进行纪念。因为他们很清楚，在他们这么多年的专制统治下，不知道有多少民众对这个制度怨声载道，对那些作威作福的官员深恶痛绝。《零八宪章》原本是帮助中共延续政治生命的一剂良方，如今却被视为威胁社会稳定的反动文件，《零八宪章》只是要求当局顺应历史潮流，启动政治改革，争取早日实现宪政民主制度，如此温和的文本却被打入另册，签署人被视为另类，这是何等令人痛心的现实。

不管中共当局如何抹黑《零八宪章》，这份文件都必将被载入史册，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也不管中共当局如何迫害签署人，这份历史性文献都必然会推动中国一步步向民主社会靠近。德国的柏林墙曾在一夜之间消失，中国的“柏林墙”也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轰然倒塌，迎来民主的春天。

2009 年 11 月 10 日

（源于：民主中国）

中国大陆人权理论的三大误区

胡显中

保障人权应该是一切主权国家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最高原则；也可以说，是否保障人权，乃是检验这个主权国家实行真民主还是假民主的试金石。《零八宪章》的精髓就是限制政权，保障人权。

近年来，中国大陆经常宣传说：今天的中国人权状况是历史上最好的。同时当局也承认，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对这些宣传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和批判。

长期以来，大陆当局对于“人权”一词采取贬斥的态度。其原因首先是由于人权概念与中共集权统治的体制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水火不相容的两极，无法兼容、并存；其次还因为中共当局顽固地坚持冷战思维，认为“敌人所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所反对的我们就要赞成”（毛泽东语录）；从历史上看，人权是资产阶级最先所提出来的理念，因此无产阶级当然就应该反对。这种封闭、保守的状况一直延续了几十年，直到改革开放的初期，仍然如此。1979 年 3 月 22 日的《北京日报》第一版在显著位置，用特别显眼的楷体字，发表了《“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文章说：“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它从来就不是无产阶级的战斗旗帜。不能把人权这个早已成为粉饰资产阶级反动专政的破烂武器也搬来作为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良药。文章还质问：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提出“要人权”，究竟是向谁要人权？文章的口气显得盛气凌人、咄咄逼人。看来是大有来头，显然是代表了官方的立场，而且是高层官员的意见^①。可见直到这个时候，“人权”问题仍然是一大禁区，仍然被看成资产阶级的“专利”。

直到近年来，在国际社会的推动下，同时也由于中共新的领导层大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并且多次出访西方发达国家，耳闻目睹，对于发达国家所尊奉的社会公共理论有了比较清醒、比较理性的认识，因而才逐渐接受了“人权”这个概念。1998 年，第一次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中共的文件——15 大报告；2003 年，在 16 大报告中，再次提到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并且于 2004 年正式写入修改后的宪法中。所有这一切，当然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是如果对这个进步作过高的估计，显然是太乐观、太轻信了。因为大陆的人权事业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而现实生活中许多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究其根源又在于理论指导的误区。

■ 最大的误区就是所谓“主权高于人权”之说

“主权高于人权”说的理由是：如果没有主权的保护，便谈不到人权。可是，我们也可以反过来问一下：如果没有人权，这主权又是什么性质的呢？换言之，这个主权是谁的主权？对老百姓来说有什么意义？老百姓能够享受得到吗？

对此，我们可以举出古今中外许多实例来证明。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最切近的例子莫过于 50~70 年代。当时这个国家对外当然有主权；但是对内来说，有人权吗？没有！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在那‘人妖颠倒’的年代，不用说普通的老百姓毫无人权可言，就连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庄严选举产生的、堂堂的国家主席的人权都无法保障，一张莫名其妙的大字报就可以置他于死地。当他拿出《宪法》来企图捍卫自己的人身权利时，竟然被一群用仇恨之火所煽动起来的红卫兵打得遍体鳞伤。可见在集权统治下的中国，根本就没有“人权”可言，有的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皇权”。由于造神运动日甚一日，皇权弥漫，人权扫地。这样的“主权”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再举一个现实的例子：有一个国家自称是什么“人民”“共和”国，但是实际上统治这个国家的却是世袭的、终身的统治者，不管叫什么名称：总统也好，主席也好，委员长也好，……实际上都不过是现代君主制下的皇帝。这个国家还不断地对西方大国叫板，表面上是为了维护主权，可实际上不过是维护其专制统治而已。在其专制统治下，老百姓不允许有收音机，普通人不经过批准不能打电话，离开本地需要凭路条才能通行②。在经济方面，连老百姓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要不断地向国际社会求援。这个国家的人口不过 2000 多万，但却拥有 110 万人的军队，占其人口总数的 5%（军民之比恐怕是世界上最高的），而且还要发展什么核武器，其目的不过是为了保护他们一家一姓的永久统治。这样的主权，对人民有什么积极意义？对历史有什么进步作用？对世界又有什么示范作用？几十年来，不断有人从这个集权国家出逃（包括曾经担任过高级职务的官员），就是最好、最雄辩的证明。

通过以上许多实例，可以说明：任何国家的主权应该是服务于、并服从于本国的人权。值得一提的是，“主权应该服务于、服从于人权”的说法，和最近中共高层所提出的“执政为民”目标应该说是一致的。既然你们执政是为了老百姓，那么，老百姓的人权当然应该就是这个国家主权所为之服务的对象。这是合乎逻辑的结论。反过来说：如果仍然坚持所谓“主权高于人权”的理论，人们必然要对当局近年来所宣传的‘执政为民’口号的诚意产生理所当然的质疑了。

保障人权应该是一切主权国家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最高原则；也可以说，是否保障人权，乃是检验这个主权国家实行真民主还是假民主的试金石。同样，实行法治的主权国家的最高利益也正是为了实现人权；没有人权保障的“主权国家”，也许有冠冕堂皇的宪法，但那只是为了掩耳盗铃，实际上还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这样的主权对于老百姓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老百姓不会也不可能真心实意地拥护她。而区别一个主权国家是实行人治还是实行法治的最好标准，就是看其是否尊重并且切实保障人权。

大陆政权长期以来强调主权高于人权，其消极的后果必然给当权者无限扩大、膨胀政府权力、任意剥夺公民权力、侵犯人权提供冠冕堂皇的借口。许多恶劣的罪行都是在保卫国家主权的

口号下进行的，发生许多冤案也就不足为怪了。

■ 另一个误区：“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

大陆一贯自诩在解决人民的生存权方面有过辉煌的业绩，因而强调生存权才是最基本的人权。可是，古代的大思想家孟子说得好：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矣。他认为：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只有那么一点点而已。虽然是“一点点”，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点”。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有理性，会思考。古代的西方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说得非常正确：“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人的社会性，人不仅仅需要温饱 and 生存，而且需要尊严、需要关怀、需要实现自我价值——这一系列的心理需求都应该得到满足。如果不能满足这一切，只有生存权，那么，人的确就和其他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了，那岂不是太可悲了吗？我们还可以举出《圣经》里的话来证明：《圣经》里说：“人的生活不仅需要面包，还需要被承认、被接受、被关爱，还需要一种使其生命富有意义的精神生活。”

由以上可知，人权应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生存权和其他权利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要不健忘的话，我们应该记得在 60 年代之初，由于毛泽东一意孤行搞乌托邦的实验，饿死了好几千万老百姓。准确的数字因为中共当局讳莫如深，一直没有公布过。但是，中国近代人口史的记录却是无情的；从中可以推算出来，大约饿死了 3000~4000 万人。国防大学教授辛子陵在《千秋功罪毛泽东》书中的数字是 37558000 人；而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书中的数字则是 3600 万。杨著并形象地做了一个非常精确的比喻，即相当于 1945 年 8 月 9 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 450 多倍。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 450 多枚原子弹。又相当于 1976 年 7 月 28 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 150 多倍。也就是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 150 次唐山大地震。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一千多万人）大饥荒的惨烈程度也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更超过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所造成的后果。

这好几千万饥民的生存权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剥夺了，他们的生命就成了毛泽东好大喜功、浪漫幻想的牺牲品。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当时，农民都有自由劳动权，可以由自己来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用什么方式结合在一起生产……，（就像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情况那样）还会发生那样的大饥荒吗？如果老百姓都有自由发言权，可以自由地表达对国家大事的看法，让国家领导人多一点清醒、明智与民主，还会发生那样的大倒退、大逆转、大灾难吗？由此可见，其他各项权利的有无，同样可以决定生存权的能否实现。这是几千万被饿死的冤魂用他们的生存权为代价留给我们的惨痛教训。因此，生存权是基本的人权，其他权利同样是基本的人权。如果只让人吃饭，却不允许人民说话，这样的所谓“基本权利”无异于对待动物，而不应该用来对待人。对人，就应该既让人家吃饭，更要让人家说话（包括言论自由和发表言论的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著名的学者海伦·达比希儿说得好：“言论自由是一项与其他人权不可分割的基本权利。她是享有和保障其他权利所必须的权利。没有言论自由和获得信息的自由，就无法参与有关政府经济政策的国事辩论，就不能对酷刑……等等侵权行为进行抨击。”正是因为没有充分的言论自由，社会和公众没有公开抨击司法不公的合法渠道，所以才屡屡发生许多冤假错案。这难道不是十分深刻的教训吗？

值得注意的是，1993 年 6 月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二次世界人权大会上，通过了《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在这份非常重要的文件里，明确无误地宣告：所有的人权都是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的发展权是基本人权的组成部分。以刘华秋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

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盛会并且在宣言上签了字的。而发展权当中就应该包括受教育权、政治参与权、知情权、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发表言论的自由……等在内，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由此可见，仅仅强调生存权是基本人权，实际上就是贬低其他各项人权的重要性。这样的宣传，如果不是由于无知，就是别有用心和动机。什么动机？说穿了，就是一来转移国内老百姓的注意力，希望他们仅仅满足于吃饱、穿暖而已，而不去追求作为一个人的、更高的生活境界；二来是为了在国际社会和国内舆论的双重压力下，进行狡辩。

■ 还有一大误区就是所谓的“舆论导向”

中共自从执掌政权以来，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舆论的控制，一直强调所谓“舆论导向”。经过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舆论导向的实质就是：我导你向，官导民向。官员是“导”的主体，人民是被“导”的客体。官员如何“导”，人民便应该如何“向”。官指向东，人民不得向西。在“导向说”理论发明者的视野里，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不见了，国家的根本性质即人民民主共和国当然更无从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中关于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这一原理更是被粗暴地阉割掉了。人民选出来的公仆一下子变成了高居在人民之上、发号施令、任意摆布人民的政治强人。国家的主人反而变成了任凭公仆随意导向、指挥和安排的群氓，听话的、驯服的工具，这难道不是主仆关系的大颠倒吗？这难道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大背叛吗？如果说，人民公仆变成了官老爷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现象，“导向说”就是这种异化现象的理论表达。“舆论导向”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说穿了，就是保持中共当局对于话语霸权的绝对垄断，与此同时，也就必然是对老百姓的话语权利的彻底剥夺，对民意的粗暴强奸，对基本人权的任意蹂躏。

如果追溯一下历史的话，这“导向说”的发明专利权并非属于中共宣传部门，而是沉睡在地下 2000 多年的秦国宰相李斯。他在上书秦始皇建议烧毁一切书籍的同时，为了解决老百姓的精神需要，他建议：“以吏为师”，也就是一切向当朝的官员学习，以官员的是非为是非，随官员的喜怒而喜怒，按官员的爱憎来爱憎。瞧！这不就是“导向说”的最原始说法吗？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来：李斯所倡导的“以吏为师”和今天的“导向说”之间具有浓浓的血缘关系。也可以这样说：“导向说”是“以吏为师”的现代版，而“以吏为师”就是“导向说”的老祖宗。再进一步来看，“吏”是为皇帝服务、一切行动听从皇帝意志的奴才而已，“以吏为师”实际上，必然是以皇帝的意志为意志。“天子圣明，奴才该死”。于是我们从“导向说”背后的阴影里，看到的竟然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幽灵。

一个自称是反帝、反封建旗手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以后，竟然继承了封建专制制度中最基本、最核心的手段——对人民进行包括思想、言论在内的全面控制。这难道不是历史的大倒退、时代的大悲剧吗？

其实，从“舆论”一词的本源来看，应该是指来自基层人民群众的呼声。“公众舆论是人们表达意志的无机方式”（黑格尔）“舆论就是多数人意见公开表示于外者”（梁启超）“舆论就是众人的议论”（《辞海》第 689 页）……既然舆论本来就是群众的呼声，却变成了官方用来引导人民的工具，这真是匪夷所思！也可以说是又一种“异化”现象吧！

其实，从近年的实践效果来看，所谓“舆论导向”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你导你的，老百姓心中如何想？信不信？那就很难说了！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说得好：“宣传也好像货币。

钞票发行得越多，就越贬值”。中共宣传部门的官员似乎并不懂得这个非常浅显的道理，这正是“当局者迷”啊！

最后，套用孙中山先生在“遗嘱”里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维权尚未成功，人民仍需努力！

注：

①《北京日报》1979年3月22日头版头条。

② 香港出版的《广角镜》第390期第27-28页。

（源于：民主中国）

百年梦想与“自由力量”的觉醒

牟传珩

去年12月9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的前一天，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各界有担当的303名公民，联合发布了《零八宪章》，倡导三权分立的普世价值，呼唤宪政民主，引发中外舆论的高度评价与广泛报道，导致官方高度紧张。为此，发起人代表刘晓波至今深陷狱中。如今，正当《零八宪章》发表一周年到来之际，中国官媒新华网主页，转发“特稿”《再辨“三权分立”》（来源《瞭望》）文章，只讲宪法，回避宪政，要继续重复中国百年来“有宪法、无宪政”的老套路。文章刻意对“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进行偷梁换柱的解读，声称“当前，一部分人简单地将西方国家政治体制认定为三权分立，以为三权分立就可以有效地制约权力，将制衡与三权分立混为一谈，视三权分立为不可取代和超越的‘普世’政治体制……。把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性、阶段性产物——三权分立，误读为终极的、‘普世’的政治体制，以为真的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模式。”

不言而喻，此文的主题，就是在阻击《零八宪章》所倡导的普世价值深入人心，为寻找中国特色的“党主民主”一叶障目。

追求实现宪政民主，一直是中国人民的百年一梦。这个梦想，如今并没有因“60年辉煌”而得以实现。寻求用宪政秩序代替皇权专制主义，是中国自19世纪末以来百年追求的主题。近代中国，人民一直处于被暴力劫持和主义利用的政权争斗之中而从未停歇，人民也早就厌倦了以自己的自由为代价来诠释“胜者为王”的伪真理轮回。人民对统治者正当性和执政资格合法性的追问，就是从中国人民追求宪政梦想的那一天开始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统治者多被以“革命”名义，用暴力的手段，虽几经政权更替、旗帜变换，但宪政梦想却至今不得实现。如今的事实雄辩地证明：苏联社会主义没有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没有做到。

100多年前，大清王朝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从这一天起，这个龙图腾的国家，就有了追求宪政的梦想。清末《钦定宪法大纲》虽不是一部民主性的宪法，但它的发布毕竟启开了中

国的立宪道路，这一路走来的岁月，充满着腥风血雨，至今历时 100 多个春秋。在这 100 多年间，这个国家先后炮制了 10 多部宪法，但却是“立宪法容易行宪政难”，“宪法”与“宪政”一字之差，却相区千里，百年难合。从 1908 年到 2004 年的百年来，全国范围内具有法律效力的宪法（包括宪法性文件）有：1908 年钦定宪法大纲、1912 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4 年中华民国约法、1923 年的“贿选宪法”、1931 年训政时期约法、1946 年中华民国宪法，解放后的 1949 年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4 年、1975 年、1978 年、1982 年宪法至 2004 年又经过 4 次 31 条修正。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有如此频繁的立宪、修宪事件频繁发生了。中国如此的反复立宪与修宪的结局就只有 6 个字“有宪法、无宪政”。

在中国，历史上宪政思想的最早鼓吹者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早在清末末期的“戊戌变法”中，康有为们就把制定宪法视为变法的总纲领，康有为在上呈给光绪帝的《日本变政考》文中称，“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日本如此而成效大著，中国今欲大改法度，可采而用之。”而最早鼓吹君主立宪思想的当首推梁启超。1901 年 6 月，梁启超在其发表的《立宪法议》一文中说：“现在世界上有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三种政体，而‘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研究梁启超的学者沙培德认为：梁启超是个立宪主义者，他关心的是权力的制衡和政府的管理以及一套有序的秩序。至于谁拥有权力，都不重要。他相信，只有宪法秩序才能给予政治斗争有序空间。重宪政和法治甚于民主，这是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立宪派的共同立场。中国政法大学张晋藩教授对比中日立宪成败原因时认为，日本历来是法文化进步思潮的输入国，容易接受外来的先进的法律文化；而中国从唐朝开始就是法文化的输出国，统治阶级思想保守，向来提倡“夷夏之防”，只能是以中国去改变外来民族，而不能容忍外来民族影响中国，文化排他性特别强。这种思想根源直接导致了清末立宪运动的破产。

中国在民国建立之初，就忽视宪政规则的建设，致使宪政秩序迟迟未能建立，由宪法所体现的权力分立与制衡制度始终没有到位。这导致了民国时期虽有宪法，但无宪政，国家政局始终处于动荡状态。那个时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始终让民主压倒宪政，让威权压倒自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本来提出的是“人权(自由)与科学”，但却在日渐崛起的民主主义思潮下，被偷梁换柱，竟演变成了“民主与科学”，这也给共产暴力革命以可乘之机。其实被誉为民国缔造者的孙中山先生，就崇尚暴力革命和国家主义，并由他始建立了帮会式的政党，且以党统军，以党训政，贯彻“一个国家、一个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一党专制的政治传统。时值“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引来了所谓更高、更广泛、更理想的“苏维埃式的民主”，中共建立起一个完全排除宪政，以“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空头宪法支票支撑起的“党主民主”国家。

近一个世纪的实践证明，世界上所有追求更高、更广泛、更理想的所谓“苏维埃式的民主”，对“以自由主义为基石的”宪政民主的所谓“超越”，都不过是对自由与民主的扭曲。如果说在欧美国家，在坚实的自由主义宪政平台搭建成功之后，再去修补、完善，是顺理成章的，那么那些一开始就宣称要搭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更高的“社会主义民主理想”平台的实践证明，它不过都是一些口号性的泡沫。如果我们不很好地梳理中国近现代宪政史，便无法澄清中华百年徘徊在民主、共和与宪政这几个制度目标之间的不同思路，我们百年来的宪政梦想，还会继续陷入误区而找不准明确的目标。

民主宪政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不仅在于强调三权分立的制度制衡，更强调“权出于法”、权力的运行必须始终以法律为依据。如今中国官方倡导“改革”30 多年来，仍在沿用政党集权体制——执政的政党合伙垄断权力，始终处于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即超然公众意志之上，

强加给社会以不容怀疑，不容制约，更不容改变的绝对领导权。这种“党主民主”体制，从表面看也承认宪法权威，党的意志也是借助“立法机关”使之形式合法化，并通过行政机关付诸实施。但实质上由于一切要服从党的绝对领导与安排，大权独揽，“法出于我”，公民根本无权决定自己的政治代表和行政首长，不允许媒体开放、言论自由和异见组织存在。因此它不过是背离世界主流价值的“苏维埃式民主”“有宪法而无宪政”的21世纪中国化。

美国总统布什2007年6月5日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举行的“民主与安全会议”曾发表《历史表明，自由最终会征服恐惧》的演讲说：“虽然经过了苏联占领的漫长的黑暗时期，但这个国家为争取自由的斗争却从未停止过。在布拉格之春的改革中，在77宪章运动的呼求中，世界看到了自由的力量。”是的，中国也看到了。那个一直沉睡在“中国特色”中的百年梦想，也被77宪章的公民运动唤醒了。中国1978“民主墙运动”和1989“六四学运”，都可视为是中华文化土壤里公民意识觉醒的“自由力量”。而去年底中国社会各界有担当的303名公民，联合发布了《零八宪章》，更是这种力量的积蓄与膨胀。我曾在《《零八宪章》横空出世——当代中国宪章派群体揭幕》一文中写道：“《零八宪章》的联署，无疑是所有参加者们为履行公民责任而克服个人恐惧，发出明确目的和愿望的政治呐喊。正是由于这些目的和愿望，才诞生了《零八宪章》这一活动及其群体。宪章签名活动，就显示了这样的公民意识、良心和责任的觉醒，这便是一种新型公民运动的尝试。”由此可见，《零八宪章》，同时建立在中华民族“百年梦想”的历史传承与《七七宪章》呼唤“政治正当性”的政治伦理基础之上，并直接连续着《世界人权宣言》的普世精神之源。

其实，历史上任何社会形态的政治变革，都旨在解决权力问题。现代民主意义上的宪政改革，所需要解决的也就是如何产生权力、行使权力，制约与监督权力，以保证权力的公正、高效与清廉。从社会管理功能的角度考查，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宪政模式，是人类发展至今付出血泪代价探索出现阶段最合理的社会管理制度。

当今中国的社会贪污腐败，分配不公，政府效率低下、官僚主义和社会的愤懑与各种不稳定因素，哪一种社会神经的紊乱，都需要全新的民主宪政加以治理。然而，今天的执政当局却不能审时度势，顺应民心，担当变革主角，而是以《再辨“三权分立”》之类文章，宣扬抵制普世价值的“宪法权威”论和“法出于我”不痛不痒的修修补补策略忽悠百姓。如此“30年改革”的信誉，已在民众中荡然无存。当此之际，更需要《零八宪章》所代表的普世价值来引发社会对这个国家政治正当性的拷问。

中国的百年梦想与“自由力量”在觉醒！

（源于：民主中国）

从学术角度看《零八宪章》

——以“亚细亚生产方式”批判为中心的分析

綦彦臣

《零八宪章》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最系统化的异议政治表达文本，由于有不少签署者是体制内人士，因此，它也是中国民主化政治改革诉求各方的共鸣。尽管当局羁押了主要发起人之一的刘晓波，但并不能阻止政治认识从精英向庶众传播的潮流。大量签名人是底层社会维权人士这一点，做了很好的说明。

我个人没有参与签名活动，只是和极少数民间学者交换了意见，这种交换更多地是技术层面的。在技术层面，我的基本表达是：对于政治民主诉求，我完全认同，但认为这种诉求在理论上有待体系化。另一方面，既然宪章是一个政治改革宣言文本，也不必在技术性细节上做过多表达，提出一个安排框架就十分不错了。

从学者的个人身份出发，我认为在《零八宪章》之下，形成一个理论探讨脉流，可以说是一九八九年之后的政治再启蒙。因此，我仍以观察者的身份来对待宪章文本及运动本身。

一、六·四事件遗产的增值

《零八宪章》不是中国民间（异议）政治精英突发奇想的宣言，它是解决1860年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内在矛盾的又一次努力，即对体用之辨的局限进行新的突破。如果不考虑1860至1989之间近一百三十年的相关争论，只看1989年六四事件的政治遗产，就能说明这一点。

按六四事件结束后的官方评价文本（即陈希同所做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来看，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双方价值的冲突焦点。陈报告有言：有的还提出“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等等。这个被批判的主张，在《零八宪章》里表达为“多党政治，联邦国体”。

其实，六·四事件之后，近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知识精英不分体制内外一直在探究“多党政治，联邦国体”的可能性。并且，对六四事件评价的争议一直存在，即陈报告并未真正能给事件定性。比方说，朱镕基当选总理（1998）时答记者问，说了很矛盾的一句话：对于那场政治风波早有定性，而且以后多次会议上大家认识都是一致的。既然早有定性，又何必在以后在多次会议中提及？既然多次提及，就不能说内部对此没有分歧！（关于公开资料，可查阅最近出版的《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

二、个人经历的文献意义

之于个人经历，我对“多党政治，联邦国体”也进行过理论探讨，不过彼时认识比较粗浅而已，但是，那些认识至少是六四事件后关于中国政治走向持续关注的一个指标。由于那个方向性探讨，我被当局指控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现在来看，当时的指控与判决也有相当

参考意义。现将官方文本作为历史文献来对待，并以一篇涉及“多党政治，联邦国体”文章《朱氏迷雾与政治生存策略》为专指对象：

其一，侦查机关的《起诉意见书》指称：1999年4月，綦彦臣撰写《朱氏迷雾与政治生存策略》一文，并与法国《欧洲时报》、新加坡《海峡时报》、美国《时代周刊》联系发表。文中倡导用“联邦国体加多党制”统一中国，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并号召、煽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外来的力量。”（此段中的引号与日期写法均为原文所具。出处：沧国安诉字（1999）第1号）

其二，公诉机关的《起诉书》指称：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被告人綦彦臣撰写《朱氏迷雾与政治生存策略》一文，并与法国《欧洲时报》、新加坡《海峡时报》、美国《时代周刊》联系发表。文中倡导“联邦国体加多党制”统一中国，煽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外来力量”。（此段中的引号与日期写法均为原文所具。出处：沧检刑诉（2000）24号）

其三，审判机关的《判决书》指称：1999年4月，被告人綦彦臣撰写《朱氏迷雾与政治生存策略》一文，并与法国《欧洲时报》、新加坡《海峡时报》、美国《时代周刊》联合发表。文中倡导用“联邦国体加多党制”统一中国，煽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外来的力量。（此段中的引号与日期写法均为原文所具，其中“联合发表”疑为“联系发表”，原文如此，本处不作改动。出处：（2000）沧刑二初字第49号）。

对比〇八宪章的集体表述与九年前我的个体表达，都说明“联邦国体，多党政治”之制度理性或曰价值理性，始终为关心国家命运的学者所关注。这种关注的是宪法规定权利范畴之内的行为，即第35条的自由表达权与第41条的公民建议权。现在看来，在宪法权益之下，更为重要的是要从理论上研究〇八宪章的核心主张，它至少包括：普世价值经济社会背景的一律性，以及中国传统政治民主基因存在的可能性。

三、宪章核心理念与普世价值相一致

作为《零八宪章》发起人之一的刘晓波被羁押的一个重要环境因素，是中共体制内对普世价值的争论，反对者占居了优势。普世价值显然是解决1860年中国社会现代化以来政治难题的一个有效办法——它可以超越体用之辩。作为价值理性，它能更有效地解决工具理性不足问题，使“联邦国体加多党制”不再是一个政治禁区。就中国六十年来的政治争论来看，无论在工具理性层面还是在价值理性层面出现巨大波折本不是历史的偶然。相反，诸如六·四事件之类的政治风波或曰血腥结果，乃是逻辑性的必然。

当然，在另一端，国家专门立法与宪法精神的一致性，又为“联邦国体，多党政治”提供了一个平行参照，即《反分裂法》所内含的在统一目标下“什么都可以谈”之伦理精神。同时，执政党本身越来越强烈的自我惕励口号也说明，一党政治本身的风险已经畸高，如党的接班人习近平要求党加强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否则将失去执政地位。还有，党的组织主管人李源潮近期也一再讲防止人亡政息的危险，凡此等等。

从执政党的舆论导向即宣传掌握方面来看，刘晓波遭受羁押后，反对普世价值的声音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话语权，尽管作为一个政治案件它尚没有可测度结局的信息。在刘晓波被羁押

（2008年12月8日）两个多月后，不到三个月（1999年2月19日），一直以来比人民日报体系少有左派色彩的新华社体系，其下属的《参考消息》发表了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一位学者的文章《当前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该文火药味十足地说：“西方世界一直喋喋不休地对中国人说，你们不民主，你们不自由，只有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念，你们才能进步。而他们的价值观是‘普世价值’，只容你照办，不容你质疑。”在稍后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时任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的叶小文回答记者（3月16日）“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是不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之提问时，公开声称：“民主是个好东西，我宁愿不用普世价值这个词。”

四、不能被忽略的普世经济

不管普世价值作为一个政治符号如何被曲解，它的经济社会背景是无法被消除的。简单地说，普世价值背后有普世经济。

普世经济，是指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由于分配机制的内在冲突带来普世价值的诉求。中共体制内人士不管是否认可普世价值，都不否认人均年收入进一千美元至三千（亦有称两千至五千）美元阶段，社会进入高冲突时期——这样的基本判断。这个基本判断也是当局“稳定才是硬任务”维稳目标的常识基础。

在文献引证意义上，我们可以发现：（一）早在《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官方就确认了普世经济的社会转型意义；（二）最近，应对重庆打黑带来的社会讨论时，重庆地方主官更是对媒体公开说：“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比如国际公认人均收入2000至5000美元阶段，是各种社会矛盾高发期，是集中出现的时段。”（可参见重庆地方网（华龙网2009年11月6日）的相关报道）

仅仅之于经济利益来论，中共内部的反普世价值力量的抉择，与其说是出于政治安全考量，勿宁说是出于对普世经济的独享。比方说，按普世价值原则开放新闻出版，最终结果不是舆论导向正确与否的问题，而是大量官办新闻出版机构将破产，利益集团将发生社会地位跌落。在普世经济线索下，我们继续往下看，由于经济分配机制的冲突，自由民主（而不是所谓的特色民主）仍是中国社会需求缺口巨大的潜在政治供给品。

五、福山修正的本质

普世价值的国际版本，可用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来表述。不过，福山最近对他的理论体系做了一定的修正，认为“历史的总结”过程会出现波折，“中国模式”或曰“北京共识”有一定参考价值。他说：“中国在威权环境下成功地发展了经济。甚至可以说，因为威权，他们成功更快。”然而，对于未来的展望，他仍认为中国会走向“繁荣带来民主”的基本归途，尽管他没有使用“普世经济”一词。（“普世经济”一词，系我在本文中首次使用。我也相信，它将对中国的政治学术产生深远的影响。）

福山的这种判断基于两点预测：一是，今后十到十五年，中国人的收入会翻一番；二是，资本主义造就富有的中产阶级，“他们要求用税收换代表权”。

对于“民主”概念本身，不同的政治群体暨不同的经济利益阶层（或集团），有着不同的理解，

但是没人彻底否认民主根本的社会政治伦理价值。只不过，它被分成“西方式的”或“中国化的”技术性表达而已。上引的有关叶小文的文献，仍有后续之言，他坚持说：“中国共产党是最真诚地追求民主的，也会根据中国的国情一步一步去完善我们的民主制度。当然，民主走急了也不行，它是有程序的，是个过程。”叶的如是表达等于与福山有不谋而合之机，背后仍是普世经济在起作用。

六、马克思历史哲学的伪发明

与叶小文较技术化的表达不同，上引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学者的文章，虽然大有激愤之情绪，但它的提问给出了一个体制内政治思维窘迫情况的描述。该文厉声而言：“我们想告诉西方，如果有‘普世价值’，应该把中国老百姓自古就懂的‘民以食为天’、‘和谐共处’、‘和而不同’这些宝贵的理念列进去，并且放在前面。”如此表达等于是说“普世价值可能值存在”，也存在扩大内涵的可能。然而，为什么体制内理论思维一直有一个先天性的排斥西方观念的定势呢？有人或许认为民族主义情绪使然。这只是答案的一部分。真正的谜底在于马克思在历史哲学中发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作为新的政治迷信，“亚细亚生产方式”之定论有着深远的负面影响。

马氏认为：中国、俄罗斯、印度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东方国家，其古典社会中形成的劳动密集、效率低下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基础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的风暴所触动”。它在政治方面又为专制主义提供了牢固的基础，人变成了政治迷信的驯服工具、传统规则的奴隶。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可能产生民主因素，它与希腊城邦国民阶级权力主张的习惯截然相反。

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中国六十年的政治哲学影响之深自不待言，而且它也是中国今日本身自认“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的思想根源。民族主义主张之所以被法定意识形态所认可，或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能够向民族主义退守，端在于中国六十年来被“亚细亚生产方式”迷信所束缚。

这个迷信是伪民族主义的体制内合法性依据，它与“文革”时期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是一样的极端原教旨主义。也正是由于新的原教旨主义在体制内大行其道，才出现了如今左风盛行的政治生态，那些欺骗性偶像如雷锋才有了“复活”的机会。

七、我们的传统中有民主基因

之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迷信，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并未能予以动摇。因此，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思想屠城”——围剿普世价值绝非不合逻辑，其内在道理正如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逻辑地放导致了六四事件的血腥后果一样。“亚细亚生产方式”迷信不会产生真正的民族主义，而它所产生出的伪民族主义恰恰是反传统政治文化的，即将中国政治文明中的积极因素予以摒弃。

站在“亚细亚生产方式”迷信的对面，简单挖掘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遗产，不难发现——我们的文化遗传里面含有大量的民主基因，简单列示即有惊人的收获：

（一）中国商周时期的城邦政治，不仅存在贵族体制内民主乃至采取武力方式实现体制内民主选举，而且《洪范》给出的政治决策模式是十分民主的，其程序中有贵族内部讨论，也有交付公众表决的宪法设计。

《洪范》是全球最早的宪法文本，远比它之前的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更具超越财产法的特征。

（二）中国古典宗教传统与经典记载包含着大量的民主因素，比如易学中涉及反对宗族内部民主而致力社会民主的主张。如同人卦警告决策者“同于宗，吝”，就是说你只在小集团内部寻求一致性，前途不会光明。递进而言，一定要突破决策咨询的身份界限。

以此比之于中共的“党内民主”，后者实在是远无前者有洞见力。所以说，“亚细亚生产方式”迷信产生的政治思维，是中国优良政治文化发扬的最大障碍。

（三）中国古典社会中，存在着顽强的经济自由主义内核，它是一切权力控制之外的最基本社会恢复动力。从《史记·货殖列传》对经济自由的肯定，到晚清洋务运动派生的实业救国思想，都说明支撑中国文明从政治灾难中恢复的原动力之一是经济自由主义。

毛时代深重迷信“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享受它带来的益处，如工农业剪刀差对农业的剥夺而造就的工业积累，再如城乡人口身份的割裂。其反经济自由主义的“割资本主义尾巴”，正是对抗中国历史上经济自由主义传统的。

简单概括以上所述，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必须以抛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前提。虽然说邓小平理论被传统的庙祭原则续补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但它的经济自由主义毕竟是与“亚细亚生产方式”迷信有本质区别的。这也是体制内开明派为什么以邓小平为宗庙新主，以捍卫改革为口号的原因所在。

中国积三十年改革开放，产生于民间及体制内“主动异议”（我本身就是一个个案）的自我解冻效应，对社会思想进步起到了巨大作用。历史会记住这一点。从1989年的六·四事件到2008年的宪章运动，近十年之积功，新的政治思维基本具备了消解“亚细亚生产方式”迷信的能量。

八、自由市场制度并没失败

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为中国反普世价值的势力提供了“有力证据”——既然自由市场制度不是最好的，那么建立在它之上的多党政治等民主制度肯定也是有问题的。由此而推，中国例外于民主制度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像《零八宪章》提出的“多党制加联邦国体”之类的政治主张也等于不攻自灭。用“中国模式”之经济绩效表达，伴以政治上的“北京共识”之全球攻势，目前已经成为反对自由市场制度的最有效话语。

中国正被全球反自由市场的理论力量所吹捧。比如，英国左翼学者马丁·雅克认为：中国将以文化霸权的方式在以后约五十年的时间里统治世界。不幸的是，在雅克们吹捧起来的中国统治世界泡沫之内，中国社会内部的分配不公积累的内在张力，随时都会使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破灭。此非危言耸听，中共内部高强度的政治道德砥砺信号亦大有自我警策之意。此种分

析在本文上篇已有所引述，此不赘复。

之于自由市场制度，中国的威权资本主义确实利用了它的优点，然而，归根结底，中国的威权资本主义是权贵资本主义。简单地说，国家在实现社会公平方面的作为微乎其微。中国试图努力解决政府失灵问题，但以降低市场灵敏度为代价的选择则是极端危险的。但，这种危险是雅克们所不予关心的。

结语：政府何以内含于市场制度？

现代市场经济机制确立以来，政府的作用并不是外在于市场的，而是被市场内化的，因此，它已经成为一个市场因素。在这个基础上，政府又不得不接受市场信号的作用，以避免政府完全失灵。比如说，现在银行信贷刺激经济的投放量过大，不少银行主动缩减投放规模——至少不再对一线以外的城市建设进行信贷支持，业界称为银行业的“不合作运动”。

银行业的“不合作运动”说明市场信息通过微观主体利益反应，作用于政府决策。这样一个逻辑仍然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性质，而不管所称的市场叫新教伦理资本主义，还是叫权威资本主义，乃至裙带资本主义。仍然回到普世价值涉及的经济利益方面去看问题，政治抵抗在更大程度上是经济抵抗。所以说，不管中国体制内的开明力量如何坚持改革，他们还是没法在短时间内为市场的要素分配找到合理平台，国企的经济统治不会放松，新闻出版业也不会与民间“割江而治”。

实质性的问题仍然是——中国需要再启蒙——《零八宪章》做出了这方面的重大努力。

2009年11月12日

（源于：民主中国）

从《零八宪章》看未来中道联合的可能

王光泽

我对传统文化有不少批评，但是也有不少肯定的地方，如中道文化。自上古尧帝以来，中华民族悉以中道为立国的根本，有人认为中道就是中国得名的来源。“所谓中道”也就是寻找合理点，并坚持实践。“中”即合理，坚守合理便是守中。《中庸》中有一名句：“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程子在《中庸章句》开头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道被佛教认为试最高的真理。所说道理，不堕极端，脱离二边，即为中道。《大形容词积经》卷一百一十二：“常是一边，无常是一边，常无常是中。”儒家根据阴阳平衡的原理提出中庸，论语中“执两端而用其中”，即不偏不倚的意思。五千年来，这个中道传统一脉相传，后人便称之为“道统”。历代兴衰，也都是得中、失中的结果。圣经里曾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基督教也强调正道，不要过分行义，也

不要过分行恶。

■ 以中道政治应对极端主义

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一场悖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极端主义运动，共产党就是思想极端行为极端的激进主义政治团体。如何应对这种激进主义组织，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中道政治来纠偏，另外一种就是以另外一种极端主义来针尖对麦芒，以毒攻毒、以恶制恶，以《零八宪章》为主体的公民行动即是属于前者。

儒教之所以强调中庸，是有一个仁字作为内核的，佛教之所以强调中道，是以慈悲作为内核的，基督教之所以强调正道，是以博爱，甚至爱自己的敌人为核心的。这也恰恰是中道政治的意识形态基础。

关于中道政治的内涵，国内学者范亚峰做过诸多论述。在范亚峰9月初发表的《中道取势与战略选择》中，他将“激进派以高、郭为代表；温和派以许志永为代表，包括笔会；中道派以范亚峰本人为代表”。我个人认为这种划分的准确性值得讨论，但是亚峰在中道政治的诸多表述上有可取之处。

■ 《零八宪章》的政治操作价值

关于《零八宪章》，我认为就是一份中道政治的模本文本。《零八宪章》除了具有整体性和全局观之外，《零八宪章》比较突出地体现了以下几个中道政治的特征：1、团结阶层的广泛性：可涵盖未来中国政治变革中最关键的三大板块：中产阶级、体制内开明派和体制外温和派；2、政治体制改革的可操作性：除了《零八宪章》明确提出联邦制遭到来自各界的非议和争论之外，几乎达成广泛的高度共识。联邦制这个概念，挑战了中国人既有的大一统思维，就实际情况而言，中国现在已经具备了联邦制的特点，已经成为既定事实。《零八宪章》不过只是对国体出现新的变化的现实肯定和外在延展。3、妥协性。现代政治的特征就是妥协，有人说妥协是金色的，可见妥协在实际政治操作中的价值含量；《零八宪章》内在的妥协性为未来中国各种政治力量进行圆桌会谈提供可能性；当然，《零八宪章》的妥协性也遭到激烈的批评，有些团体属下的媒体与《零八宪章》整体切割，《零八宪章》实际上造成了反对阵营中激进力量和中道力量的分野；4、可操作性，1989年的学生运动可以说把中共吓破了胆，他们绝无意向启动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中共只是进行浅层次的司法行政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但是绝不敢触及政体层面。而这些改革反过来孕育了一个日渐成熟的市民阶层，也就是中产阶级群体，他们必然会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零八宪章》就是一份中产阶级提出的政治文本，兼顾了各方利益，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

当然《零八宪章》不是中国民间的全部，它提供了一个中国走和平转型的图景。当然《零八宪章》也不否定其他政治力量，包括激进的政治力量，如果没有激进的政治力量，中道政治可能在当下失去了存在的价值。《零八宪章》有助于中国民间政治生态的进一步分化，使得民间政治光谱多元化。由于《零八宪章》倡导多元合作共赢的政治格局，同样也适用于民间的政治整合，这种精神可以同样适用于民间培养一种宽容协作的精神，来加强民间的自身建设，培育公民社会成长的空间。

（本文为作者在“公民维权运动与中共建政60年研讨会”上的发言，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源于：北京之春）

零八宪章，君子之光

夏 明

一百年前，中国的民主先驱孙中山先生已经清楚看到了世界大势：“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经过孙中山先生的不懈努力，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诞生了。海外的华人华侨，包括旧金山的同胞们，给民主建设的事业予以了道义上和经济上的支持。今天，中华民族又在艰难地从事着第二轮民主建设，努力在中国重建亚洲、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共和国。我们作为身处海外的炎黄华夏子孙，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在道义上和经济上对国内的民主事业和民主斗士进行全力的支持和关注。

站在旧金山中国城的孙中山纪念馆国父的铜像前，我能强烈地感受到，历史正在给予我们一个巨大的挑战，敦促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华人为中国的民主进程尽心尽力。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嘉宾也会深有同感，历史也正在给我们一个百年一遇的良机，通过我们大家的努力，我们可以影响和创造历史，让中国的未来更美好。而且，在我们改变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命运时，我们又会使世界更美好。

与我们一百年前来到美国的同胞相比，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更加完善了的美国。我们从美国的民主之下也得到了更多的善待，更多的尊严，更多的机会和更多的成功。作为民主体制的受惠者，我们当牢记，受恩点滴，当以涌泉相报。我们的回报，首先表现在我们对民主制度的忠诚、维护和推崇上。我们与一百年前来美的同胞相比，我们有更高的教育和更高的能力来帮助中国的民主事业。与一百年前的情况相比，今天我们要面对的困难和承受的代价要低得多；但由于全球化的发展，我们的努力却会事半功倍。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历史的邀请，我们不能继续以沉默来做专制制度的帮凶；我们必须推己及人，与我们的父老兄弟姐妹和同胞们一起分享民主所给我们带来的免于恐惧的自由和自由敬拜的喜乐。

政治上，中国人民还正穿越在漫长的专制政治的黑暗隧道中。一年之前，303位中国公民勇敢地在中国发动了《零八宪章》的签名运动，让我们在隧道中看到了光亮。在此，我以崇敬之心向他们致意，感谢他们孤独地站在阴冷的黑暗中为十三亿人高擎民主自由的灯火。我也要向随即应声响应他们的近万名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和许多同情中国命运的外国朋友致敬。当你们也点起一根蜡烛时，你们不仅仅只是驱逐走了更多的黑暗；更重要的是，你们谦逊的跟从为中国民主自由的举灯人驱走了风寒、增添了温暖。在民主化过程中和在民主体制下，我们依然需要民主领袖做引领人。但民主不只属于领袖集团，它更属于每一个公民。《零八宪章》的划时代意义正在于，它是一场孕育于多股深刻的历史合力的自发的公民运动。

■ 2008年：中国未来政治转型的母板

《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张祖桦提出“三加一”的分析方法来看中国历史的合力互动：三个政治因素是执政党、公民社会和国际社会，加上一个经济因素。《零八宪章》的诞生元年典型地反映出这种“三加一”的共振。

中国共产党曾经是一个不怕天、不怕地、不敬神、不信鬼的唯物主义政党。但随着其意识形态的崩溃和合法性的丧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越发恍惚窃冥，占卜信鬼。他们捡起了南岳文化中“逢八即发”的民俗，深信 2008，中共必发。为此，奥运会的开幕式选在了 2008 年的八月八日八点整。可惜中共未能如愿以偿，2008 年天不作美，地不吉利，人不配合；连年震灾不断。首先是南方新年雪灾带来的天震；而后是四川的地震；接近年尾，中国经济又赶上了全球金融风暴引发的钱震，让已经陷入制造业出口危机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但是是年最多和最大的震撼还来自人心；我们看到了无数的心震，震中在中国人的灵魂和思想深处。

“3.14”的藏民族抗暴是为了争取和捍卫他们追求灵魂自由、信仰和敬拜自由的权利。“5.12”川震后遇难学童父母的请愿游行抗争是为了给孩子讨回公道，能让他们的灵魂在天堂安息，同时让父母良心得以平静。“7.1”杨佳一人杀六警案、新疆喀什袭警案、云南文山警民冲突、和贵州瓮安的民变以及网络上流行的“草泥马大战河蟹”都直接反映出共产党在民心中的地位又创新低。最重要的是，2008 年以《零八宪章》漂亮收场。而《零八宪章》要掀起的是一场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思想启蒙。它有两个内心深处的敌人：一是民众普遍的恐惧心理，二是中南海中共领导头脑里的“敌对意识”。诡异的是，那一年许多重大变故的日子都可组合成“八”这一数字，更显共产党天命已断、气数已尽。

由于其复杂性，2008 年孕育了中国未来演变的几乎所有的动因和冲突根源，显现了几乎所有的冲突模式和冲突性质。中国的突变，可能会以灾变的形式出现，或以无序民众骚乱的方式发生，也可能以快刀杀人的梁山草莽英雄的面目出现。它可能由宗教精神信仰的力量引发，或以政府的失误腐败和好大喜功引爆，也可能由经济危机促成。2009 年的新的事件，例如“7.5”新疆维吾尔回民抗暴，湖北石首民变，“邓玉娇事件”和全国银行系统职工抗议强行买断工龄解雇员工，都秉承了 2008 年的逻辑。所以，我们可以说，2008 年是未来转型的母板，今后中国发展的所有的逻辑、模式、战略、路径甚至歧途都可也在该年找到本源。

中国的突变也可以以中国现代史上最通常的形式出现：知识精英引领时代风骚发动全民变革。面对纷繁复杂的选择，《零八宪章》正是中国一群“讲道理的人”牢记百年苦难的历史，用温和的、理性的、充满善意的态度提出的一项“和解和合作”的宣言（首批签署人杜光所言）。它正确指引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和路径，同时又准备了引领中国人民争自由、建民主的中坚力量：一群接受普世价值、有全球意识、有人文关怀、有牺牲精神和有道德力量的“讲道理的人”。

■ 零八宪章：中国民主运动的旗帜

纵观两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政治治理模式通常在“乱”与“治”的两极之间摇摆。用金观涛和刘青峰的观点来看，中国的王朝政治通常呈现出“超稳定结构”，而又逃脱不了被“无组织化力量”不断破坏摧毁的结局。用西方政治哲学家霍布斯观点来看，人们最初生活在人与人为敌的“自然状态”，为了结束自然状态，我们需要有一个全能的利维坦国家。“利维坦国家”取代“自然状态”带来了一个困境，或称之为“霍布斯困境”，即：谁来监护监护人？如何能保证利维坦国家最终不滥用权力、不演变为损民自肥的逐利集团？后来的西方思想家，

尤其是英国的洛克和法国的孟德斯鸠提出了人民主权、权力让渡、人民的“权利”监督权力、政府权力分权制约等诸多原则，来帮助国家走出专制者的困境，进入合作共赢的良治。用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的话来说，就是：“在设计一个人管理人的政府时，极大的困难在这里：首先你必须让政府能管住被统治者；其次，让政府能够管好自己”。民主制当然成为两全其美的制度选择。而其中的根本制度保障是人民有权利举行定期的、公开竞争的、自由的和公平的选举。

在1992年以前，专制体制始终是人类政治治理的主要模式；相对于无政府的自然状态，专制对保护天下苍生、制止生灵涂炭有着明显的优势。为此，我们很容易理解张艺谋式的英雄崇拜。但是，张艺谋的英雄崇拜和他暗合的共产党的“稳定压倒一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都只是在“大乱-大治”二元互换中的传统思维定势。今天看来，它是一种狭隘的“隧道世界观”。现代民主制的诞生，尤其是自1991年苏联崩溃后，民主制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绝大多数人民的治理体制后，政治治理的模式呈现出三维状态：无政府状态-专制体制-民主制。

基于这种三维观，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一系列推论：首先，结束和避免无政府状态（或中共所担忧的所谓“军阀混战”或“文革式的大民主”）可以有两条思路：专制的和民主的。在两千年前的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时候，中国人还不知道民主的治理模式，秦王暴政优于战国状态是历史的事实，甚至是历史的某种进步。今天，当我们已经认识到民主的理念在西方已产生了两千多年，现代民主的实践已有300多年（以英国光荣革命为肇始）或至少200多年（以美国为肇始）的历史；如果我们还只能用“大乱-大治”的“隧道世界观”来解读和引导历史，那只能是一种低能的表现，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反动。

其次，专制制度的崩溃可以有两个走向：无政府状态和民主制。当今的中国共产党只描绘和夸大了一种图景，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专制如果崩溃，全中国人民只能进入全面内战、生灵涂炭的末日场景。它的全部宣传机器所做的就是要将中国人永久地蒙蔽在洞穴中，让他们没有对民主良治的意识和憧憬。它的全部宣传机器所攻击的就是要论证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在中国要么不适用（因为那是西方的）、要么走不通（因为中国人的文化素质太低列）。在2009年全球近两百个国家中，只有42个国家被列为不自由（中国是最不自由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而其中的不自由状态还是由“失败国家”的无政府状态和专制暴政两类造成，这就说明当今世界政体转型过程中，民主制的几率已经高于专制体制。即便我们意识到中国的民主转型不是没有风险的，但成功的几率是高于堕入无政府状态的几率的。

第三，在无政府状态-专制制度-民主制三项目标选择中，尽管三者都可以成为某种稳态，持续很长时间；但毫无疑问地，三者价值尺度上是不相等的。就像我们不会质疑有利维坦国家总比无政府要好，我们也不应该质疑民主制要优于专制体制。其实道理很简单：无政府状态让人们的能量相互内耗，形成损人不利己的格局，最终伤害民生福利。即便在理想的专制状态下，一个专制者或一个寡头集团用强力制止了内耗，但专制者或寡头集团与人民的紧张关系，以及人民的奴役地位又制造出了许多的浪费和低效率。政治的稳定又时常沦为“墓地的安宁”，损害社会财富的创造和人民福祉的提升；尔后不满的人民又最终让寡头集团寝食不安，惶惶不可终日；这也不是一种优化的稳态。只有民主制，它不仅建立秩序，让人民不必把能量内耗，而是用于追求“各自的利益”；而且，它可以解除治者和被治理者之间的张力，让双方生活在平和的心境之中。这样的体制，它不仅制造出了历史上最大的财富，所以我们看到最早的富国和当今绝大多数的富国都是民主制国家；而且，这样的民主制还造就出喜乐

的国民，所以在民主国家，我们能看到更多的单纯而甜美的笑容。

《零八宪章》准确地把握了历史进步的脉动，指出，“在中国，帝国王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弘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零八宪章》打出了中国民主化的大旗，它正招扬在中国的上空，让人民在黑暗中可以看到希望的曙光，让民主的思想者和实践者容易找到同志和同道。它向世人骄傲地张显中国人民追求民主的决心和力量。

■ 宪章签署人：中国勇敢的君子

我是较早读到《零八宪章》的，也因此有幸加入首批支持宪章的海外华人学者之列。因为我不能肯定是否我在“海外华人学者就国内各界发布的《零八宪章》的声明”上的签名就等于在宪章上签了名，我专门再次上网签了名。自从宪章发布后，我每天都会以激动兴奋的心情阅读与日俱增的签名名单。

从近万人的签名中，我首先想急切找到我的老朋友。首先看到了第一签名人于浩成，他是我在25年前太原会议（政治学研究会主持的国家职能研讨会）上有幸认识的政治学大家（当时他是全国政治学会副主席）。我也找到了我们曾经在我的书房彻夜长谈宪政民主的学友滕彪。我的朋友朱建国肯定不会不在，这位“早叫庐”的主人在这么大的事情上一定会“宁死于鸣、不生于幽”的。我也找到了许多已经结识的朋友：高瑜、崔卫平、余杰、杨恒均、王怡等人。我也看到了几个我在自己的著述中已表钦佩的人物：艾晓明、浦志强、姚立法、凌沧洲、范亚峰和郑恩宠夫妇。在此，我要向所有的认识的前辈和同侪问声平安，我想说：有幸结识你们这一群仁人志士，我也没枉度此生。

然后，我想记住所有新朋友的名字。广东的农民朋友蔡金才、陈湛尧和冯秋盛，广东的工人朋友曾庆彬、安徽的工人朋友张劲松和农民朋友刘荣超、陶晓霞，尽管我们素昧平生，但《零八宪章》让我们成为了朋友。我想告诉湖南的一位叫夏军的工人朋友，我曾有个哥哥叫同样的名字；你也许就是我新的兄弟。我想告诉中石化的工人朋友刘沙沙，你为《零八宪章》付出的代价和经受的牢狱折磨让我心痛。我想对上海复旦大学的严峰副教授说，我为你这样的校友感到自豪，我相信民主广场不止有个纪念碑在小桥流水，复旦还有争民主的活的传统。我想对山东的“挣扎的80后”张超同学说，也许我这个好为人师的师兄某一天会与你相遇，来分担你挣扎的苦痛。我想对广东退役空军少校飞行员谭思说，作为第一代中国空军飞行员的后人，我敬重你如同敬重我的飞行员父亲。我还想对北京的“民主运动追随者”李元朋友说，我们都是追随者，我们追随的是伟大的理念，而不是崇拜一个个人领袖。最后我想告诉我的新忘年交、一个因为保留有江青早年电影照片而遭牢狱之灾的纽约88岁的何天开老人，你苦苦追问，“中国何日才能天开？”我想有你这样的“88”老人，有你这样“愚公移山”精神，你会看到中国乌云散尽，日出天开的！我想对所有的近万个新朋友说我的一个承诺：无论走到哪我们相遇，只要你告诉我你是《零八宪章》的签名人，你都会得到我的友谊。

最后，我又想发现哪些名字应该出现却又不见踪影。我的大学同窗好友们在那里？你们都是国际政治系的毕业生，现在官高位显，希望你们没有忘记风华正茂时的理想。有位同学说要作中国的安德罗波夫，希望你还记着你的少年理想。有位好友要我与他一起为中国的新启蒙

献身，希望你记着你的承诺。我在复旦培养的三届学生又在哪里呢？我所带的86国际政治班已有两位最具有个性的男、女同学直接和见解地死于专制制度下。你们可曾记得，湖南的文江平同学领导了1989年上海的学潮，被发配回乡，分到县化工厂的尿素车间，最后被逼自杀身亡。你们可曾记得，我班的美丽的北京女同学龚京伟为了追求一点个性自由，遭到了校方无端的羞辱和惩罚，最后在一连串的不幸中悲惨死去。我知道，你们中有的做了名牌大学的校长，省级电视台的台长，市长，军队的大校，和一连串的处长。我不希望你们轻举妄动，作出无端的牺牲；但我希望你们能做到“酒肉穿肠过，民主留心中”。我想告诉你们，一人签名，万人蒙福。我已经为你们做了，希望未来你们这些沉默的大多数能在关键时刻为中华民族做功。

我还想说说刘晓波。我从未曾与这位传奇英雄谋面，只是在“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上与他结为神交，而且还是以讨论的两方出现。也许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君子而和不同”吧。我非常同意高瑜给刘晓波的定位：公民刘晓波。他让我想起了公民潘恩。我们都知道富兰克林有这么一句名言：“哪里有自由，那里就是我的故乡”。怯懦和恐惧让我成了富兰克林的追随者。但美国有另一位伟大的国父，他就是《常识》的作者潘恩。他不仅在英国向英国的专制挑战，而且在北美大陆向英国的暴政挑战。美国革命胜利后，他不作官，不乐享其成，而是依然奔赴法国，投身法国大革命，因为他的格言是：“哪里没有自由，那里就是我的故乡”。屡次放弃北美自由回到故乡争自由的刘晓波就是当今中国的潘恩，他有一个响亮而伟大的头衔：公民刘晓波。

《零八宪章》的签署人是一群污泥不染、知巧不用，观物外物、思身后身的君子。面对守缺的昏官和专制的强权，他们有智慧和勇气乘道德而飘游，守义理而脱俗。“君子之怀，蹈仁义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谗佞以为身谋。”“君子与小人不两立；而小人与君子不同谋。”“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持；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他们都是这些中华古训的现代身体力行者。而孔子又言：“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当我们看到成百上千的中国公民把自己定位为“民主人士”、“自由人士”、“维权人士”、“独立人士”、“民间人士”、“公民”时，我们看到了一批“以自由为生，以民主为业”的中国人民。我们有理由乐观！我们就让那些专制小人在刘晓波这群君子面前恐惧发抖吧！

“君子虽在他乡，不忘父母之国。”我很高兴地看到，一大批中华海外赤子念念不忘自己的祖国，在《零八宪章》上签名。马丁·路德·金说得好：Injustice any 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 【译文：任何一处不义都是对天下所有正义的威胁。】无论我们在那里，我们都有义务为正义的事业助威出力。

君子之光，其晖吉也！

两千年前，中国出了一部奇书，专门论述世界万事万物变化之道。这本书就是《周易》。用古老中国的智慧来观察今日中国的变局，无不具有启发意义。正如该书“六四：未济卦”所言：“未济，征凶，利涉大川。”【白话译文：事未成，急于进取必有凶险，但利于涉越大河巨流以脱险滩。】今天中国的《零八宪章》运动还刚开头，尽管所有的参与者还会遇到政治风险、甚至身家性命的危险，但正如《零八宪章》首批签名人张大军引用《圣经》与所有的签名人共勉的诗句所说，“在指望中要有喜乐，在患难中要有忍耐。”乐观耐心的同时，勇敢地行动是有助于中国摆脱目前的险境的。

又如《周易》该篇所言，“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白话译文：手持正固，可获吉祥，悔恨消亡；以雷霆之势讨伐鬼方，经过三年奋战功成被封赏为引领大国。】只要我们能耐心坚持、行走中道，既不与专制政权合作，也不和无政府势力合流，那把中国建成民主的良治，就势必功成业就。

《周易》“六四：未济卦”又言：“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白话译文：守持正固可获吉祥；这是君子的光辉，心怀诚信必得吉祥。】我们没有原因怀疑我们的选择，也没有理由动摇我们的诚信。“君子之光，其晖吉也。”【白话译文：君子的光辉光耀焕发，正体现着吉祥】。《零八宪章》，君子之光。那是自由之光，那是民主之光。其晖吉祥，中华有福了！

2009年11月14日于旧金山

（源于：纵览中国）

中国民主进步缓慢，乃因现实的三个不够

宣昶玮

一、中国民主化进程当前停滞不前

无疑的，中国大陆的社会，在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再也不是70年代以前那种封闭与僵化的社会了。

改革开放以来，不但经济所有制发生了重大改变，而且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几乎是天翻地覆的改变：现在人们的思想意识观念，和过去的情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同时由于人们经济上的自由，而导致了人们政治上的某些自由，例如言论的初步自由（但仅仅限于日常人们的社会交往方面，而不是公开的报纸和媒体上的自由，在报纸等方面人们的言论还是不自由的）。

在原先的期望中，人们以为随着经济的初步发达，中国社会的政治民主应该是逐步跟进的。政治上的民主也会步步前进，中国的民主化，也会和经济的发展一样，很快就会成为水到渠成的自然而然的事实了。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如89年的事件和后来的法轮功，很快就证明这样的设想其实是一厢情愿：中国的民主化过程，比想象的要复杂和艰难得多得多。

中国当前的民主化现状大家已经看到了，国内的新闻与电视依然是被严格控制着的；网络上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让官方无法控制的言论自由；但官方的企图严厉控制的努力，一刻也没停止过，无论是金盾还是绿坝，还是招募大量的网络评论员，以及不断的威胁关闭各个敢于大胆言论的论坛，可以说是很不太平；言论控制的企图，几乎从来就没有放松。近期又发生了拘留公盟负责人许志永的事件，和签署《零八宪章》的刘晓波先生被逮捕，至今还没释

放。

无疑的，今天中国的民主化如果和东欧当年的民主化相比较的话，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极端困难重重的，到处是阻碍与限制，可以说是寸步难行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这样的问题，应该引起每一个希望中国社会文明与进步的知识分子的思考。

最了解中国情况的人，无疑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那些试图去到西方和东欧包括俄国思想家的理论中去寻找理论答案的人们，其实是吃错了药。

二、中国民主化进步缓慢，现实上是因为三个不够造成的

哪三个不够呢？

就是：与民主有关的思想理论建设上的不够；与民主进步有关的舆论与宣传启蒙上的不够（行动上的不够）；海内外民主知识分子的联合与团结的不够。

具体表现与原因有如下一些：第一是思想理论上的建设不够。表现就是：一是“在中国实行民主就会造成分裂与动乱”的反对民主化势力的观点，尚未被完全打破，有关的理论分析研究文章尚未被人们普遍的重视，这或者是因为有关的理论研究与分析尚有缺陷，或者是由于相关的成熟的理论文章与理论研究未被充分的宣传与给予应有的重视的缘故。二是合理的社会民主制度的制度设计，还停留在原有的那些制衡呀，三权分立呀，司法独立呀，舆论监督呀，等等老的思想家的理念水平上，而缺乏对中国现实社会的有针对性的思考与大的思想创造。三是总体的对中国民主势力和反民主势力，以及各个社会利益集团的，在中国社会演变过程中的作用、社会演化的内在合力轨迹把握不够，造成实际上的心中没底、行动上的没有方向，实际上的现实行动的缺乏理论上的指导。

第二是民主方面的舆论与宣传启蒙方面的不够，这是一种行动上的不够。主要的表现就是在国内和国外都出现了，在假冒的、第五纵队式的左派理论大佬的鼓惑与煽动下，许多左派群众甚至中间民众，都表示对于西方的不满，包括对于民主的不满；事情已经发展到了只要有人一提民主，那么这些民众立刻就认为是西方的民主，而且一定有西方收买的职业汉奸在那里推销西方的民主等等价值观念。现在在中国，实际上大量说话的，说一些反对民主的话的，主要的声音就是左派和中间派群众，反而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头面人物却不怎么频繁的说什么反对民主的话了。左派民众有一个特大的特点就是头脑比较简单，容易上当，正好被那些和特殊利益集团暗中勾结的第五纵队式的左派理论大佬利用上了，利用大量的左派和中间派群众来反对民主。这些群众到处都有，还在各个论坛的管理员职位上，他们反对起民主来，可谓铺天盖地。由于左派代表一些正义，例如维护弱势民众的利益、反对官员的腐败、同情社会上被官僚欺压的维权的人们，等等；所以左派民众的发言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量，而且容易获得人们的同情。现在这些左派民众几乎异口同音的反对起西方、反对起民主来，可谓声势浩大，这对中国的民主化，是一种极大的阻挡与抵制：在《零八宪章》发表的同时，这种反对民主反对西方的民众的声音曾经很是高昂，把签署《零八宪章》的人们和《零八宪章》本身，很是批判了一番；而且这种声音与反民主的势力，又被特殊利益集团很好的利用起来

了。造成这种情形的根子，就在与特殊利益集团暗中勾结的第五纵队式的左派理论大佬的身上，他们是这一切结局的始作俑者。

而我们民主正义的进步力量现在又怎么样呢？还不怎么关注这一情况，还在那里自顾自的在那里说自己的话，什么民主好哇，中国应该民主化呀，之类的，却对于反民主力量的形成与成长，丝毫不进行研究，甚至也不怎么过问，由着左派理论大佬在那里迷惑民众，继续鼓动民众对民主人士的厌恶与反对。也就是说，现实的情况是左派理论大佬千方百计的算计民主势力与民主人士；而民主势力和民主人士却根本就不注意这些左派理论大佬，根本不把这些理论大佬当作对手看待，以为他们只是和中国的民主化不相干的一些维护已经没落意识形态的遗老遗少而已。民主人士应该关注左派，应该关注工农，关心下层人民；那些第五纵队式的左派理论大佬，正是打着为下层人民说话的旗号，极尽其收买人心的政治的表演，迷惑了大量的左派民众，干成了专门保护特殊利益集团的反民主的勾当。而我们的许多傻民主们，还到今天都没明白过来呢。

中国的反对民主的声音今天这个样子，和第五纵队式的左派理论大佬有很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关系，傻民主们到现在还没看懂，真是傻得很可以呢。这些第五纵队式的左派理论大佬的所作所为最终的效果就是把民主力量打入万丈深渊，同时也让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即专制集团的地位稳固得牢不可破，从而使工农的被奴役地位永远也得不到改变，使工农群众一辈子翻不了身；工农与知识分子是满盘全输，官僚集团和这些理论大佬是满盘全胜；工农们当然看不清楚这一点，傻民主们也看不出来么？！

中国的民主化必须要吸纳下层工农进来，也必须要考虑他们的利益与要求；而实际上过去那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几乎都没有在维护工农利益上发表过什么有力量的言论：这是这些人的聪明，还是他们的糊涂啊？

不错，第五纵队式的左派理论大佬是不代表中国工农的真正利益；他们只是在利用工农来捞取政治资本；而主张中国民主化的民主势力也并不抛弃中国工农的利益，而且实际上是真正的代表着人民包括工农的利益；但是现在的情况是第五纵队式的左派理论大佬在那里极力的进行政治表演，以收买工农的人心；而实质上却干着坑害工农的勾当；但是呢，工农大众却看不到那么远，也看不到那么细；而民主人士又不去揭露，又不去亲近工农：这就造成了那些冒充的左派理论家的有机可趁，于是工农便一面倒的跟着冒充的左派理论家呼喊，于是反民主的声音便形成了。

冒充的左派理论家玩的把戏是：在理论上我既然说不过你们这些民主理论家们（因为反对民主说民主不好毕竟是不得人心的）；可是在利用工农群众来反对西方，又接着反对民主就是理所当然的：群众总是有理的，人民总是非常正当的。这些左派理论家玩的是让工农群众来和你们民主理论家们对阵，让你们的高深的理论有力量却在一个错误的地方使：让你们秀才遇到了兵，白白浪费你们的唾沫去吧。这是唤起工农和理论家对阵的伎俩。

最后的结局是：工农尽管没有理论，但是他们有非常多的声音，反对西方民主的声音：于是在中国的现在，主张民主的声音却变成不怎么主流的声音啦，倒是反对民主的声音很高：结果是什么，大家早就看到过了。这样的局面下，中国的民主化如何会不缓慢呢？

主张民主的知识分子们开始给工农启蒙了么？没有；开始揭露那些冒牌的左派理论家了么？没有；知道哪些左派理论家是真正的和主张民主的知识分子的同志了吗？不知道；有这方面的调查与准备了吗？根本没有。

好了，既然如此，那么你们还要在中国搞什么促进民主化？你们连自己当前应该做些什么紧要的事情都稀里糊涂的，你们怎么能把中国的事情做好呢？

因此宣昶玮才说，中国民主化的缓慢是三个不够造成的，其中有一个就是民主方面的舆论与宣传启蒙的不够，这是一种行动上的不够。

第三是民主力量缺乏联合，国内的民主力量缺乏联合，国外的也缺乏联合。

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民主力量缺乏民主领袖人物，因为许多民主人士都是个人主义者也是自由主义者，他们是为了自己的自由和地位而和专制奋战着的，而不是为了别人更不是为了国家而和专制奋战的。他们当初选择作为民主战士，是和他们自己当时的身份地位有密切关系的：当时他们不名一文，地位低下，因此选择了一搏；而现在既然地位已经有了，名气也已经有了，所以就不需要再奋斗了。这是个人境界的问题，也是不怎么能够改变的。现在问题的严重性是：就是他们自己的这一状况，他们自己还未曾看得清楚呢，还在那里抱怨别人为民主尽力不够呢。

这些民主人士个个身上长刺，容不得别人靠近；又到处拉帮结派，营建自己把持的小天地，去和别的人组成的类似的小圈子，争夺各种有限的资源与利益。当国内的民主人士处于孤立无援的绝境之时，也不去思考怎样帮助？而一概的给予不闻不问；于是郭永丰只有考虑妥协这样一条道路了。

国内的联合条件更差，组建政党是不可行的；中国公盟的下场大家也看到了。但是我们应该还有别的正当的合法的道路，足以让民主人士能够联合起来。这在后面再专门讨论。

其他的还有：中国知识分子由于传统文化和过去无神论教育等原因造成的不道德的见利忘义，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怎么关注民主对社会对民族对人类的价值与意义，他们只关心自己的钱包是不是里面的钞票越来越多？自己的小汽车是不是越来越名贵？等等。总之中国的很多的知识分子现在已经把什么国家什么人类什么正义早就抛弃掉了，他们成了很势利的一类人：和那些贪官污吏其实是一样的人儿。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民主化的进展缓慢，还有其他的一些很重要的原因，但不好公开的说出来，并不是什么东西都好公开讨论的，有些要害的讨论反会被专制势力所利用的。

三、促进民主化进展，现在应该做的事情

由上面的分析与梳理我们知道，中国民主化缓慢是因为三个方面的努力不够等原因造成的，就是思想理论武器上的不够、宣传与舆论行动上的不够、民主力量团结与联合上的不够，主要是这几个方面，其他还有一些方面，已经不属于短期的人力所能改变的了。

针对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应该是：培养与发现理论领袖；对左派理论大佬加强理论揭露与围剿；民主人士要为工农的利益说话；发起团结联络运动；发起中国公民民主进步联络促进运动，使民主知识分子团结与联合起来。

思想理论武器不够的解决，必须进行培养与挖掘理论人才的努力，要注意培养与发现民主思想家和民主理论家，给予他们以各种支持，注意发掘理论领袖；但也不能采用拔苗助长的方式。民主人士在过去可以说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下过什么力气和花过心思，民主人士中可以说很少见到具有政治家和战略家眼光和头脑的人物，这是一项很大的不足。

对那些第五纵队式的左派理论大佬，要进行研究与揭露，这项工作主要应该由国内的民主知识分子们来做。要揭露这些人物的真实面目，宣传他们的卑鄙与无耻，网络上要形成一种对这些第五纵队式的左派理论大佬的围剿态势。在围剿揭露这些第五纵队式的左派理论大佬的同时，要把一般的左派群众和这些阴谋家区别开来对待，我们要团结左派群众，要做团结工农的工作，要积极的为工农的切身利益发言，民主化运动必须吸收工农参与，否则会无法成功的。

要注意形成民主朋友联络圈子，要把民主知识分子尽量团结起来，成为一个个小圈子，能遥相呼应，方便交流，互相学习，形成气氛。

这些民主知识分子的联络圈子不应该是组织，也没有什么章程和纪律之类的约束，也没有任何条文与内部的明文规定，仅仅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的联络与团结，一种促进交流与团结的方式而已。

知识分子在宣传民主思想与民主理论的时候，在进行理论探讨和对时局进行评论，在对某些人和某些团体进行批评和建议的时候，言论要合法、合理、和平、理性，要具有建设性的态度，要诚恳，要有耐性；以促使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更快的进展，促进中国的民主与进步。

这一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以温和的、理性的、合法的、建设性的、持久的行动促进中国民主与进步的运动，可称作“中国公民和平民主联络与团结运动”，是中国公民与知识分子，为促进中国文明与进步的一种新的实践与尝试。

四、结束语

中国过去的民主化进程，实际上在有过短暂的思想松动与言论松动之后，现在已经基本上停止了，甚至还在倒退。

人们的已经有过的促进民主的努力和行动，实际上是很缺乏大的理论上的全盘思考与安排的，几乎就是以随波逐流、漫无目标的方式，以散兵游勇式的个人勇敢与行为，在做这种非常艰巨的“愚公移山”的工程。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是民主运动的思想 and 理论人才的缺乏，没有人具有战略头脑与战略眼光，特别是理论领袖的非常缺乏。

而造成民主势力到现在还是处于一盘散沙状态原因的，则是民主人士之中，缺乏具有政治家头脑的人物，各个著名的民主人物只会个人奋斗，和带领少数人奋斗；却不会、也没有想到民主促进运动要有统一与联合的筹措。

现在是到了应该改变这种混乱格局的时候了。

（源于：民主中国）

《零八宪章》与中国民主化的条件

杨 光

一、在哪些类型的非民主国家中，民主转型更容易发生、且更容易成功？在哪些文化背景、哪些经济社会情况下，新兴民主政体更有可能持久生存、健康发展？从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理论家们对民主政体之形成与巩固的条件已经有过诸多的分析。尤其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相关的研究著述汗牛充栋。比如，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戴蒙德（Larry Diamond）、摩尔（Barrington Moore）、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和维巴（Sidney Verba）、帕特南（Robert Putnam）、罗斯托（Dankwart A. Rustow）、达尔（Robert A. Dahl）、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林兹（Juan J. Linz）、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等政治学界的名家高手，都曾提出过关于民主条件的精辟论述。

在这些论述中，有一些是对民主条件的正面立论，有一些是对某项条件的质疑，还有一些则是对任何民主条件的否定性论述。其中，李普塞特关于经济发展对民主的决定性意义、摩尔“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论断、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理论、萨托利关于民主之“历史条件”的底线标准等等，均是有着广泛影响的重要论述。

理论家们所提出的民主条件大概可分为两种：一为民主化的启动与发展条件，一为高质量、高稳定性的民主持续存在（或民主政体巩固）的条件。这两种条件虽然在程度上大有差别，但在名目上、性质上大多是重叠的，无非是说，只有达到了一定标准之后的某种“好经济”、“好社会”、“好文化”，才有可能形成政治民主化的动力，而在达到了更高的标准之后，则有望最终收获到持久运行的“好民主”。

概括起来，关于近代自由民主或宪政民主（此处排除雅典式的古代直接民主和现代共产党国家所谓“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的条件，大约有以下五类：

- 1、经济发展条件：包括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程度（比如人均 1000 美元以上），有较高的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大多数家庭已经温饱无忧，等等。
- 2、国民素质条件：包括较高的教育普及率，较高的（超过 50%或更多）的成人识字率，生产生活方式的文明化，较高的国民健康水准和较高的平均寿命，等等。

3、社会结构条件：包括身份地位的平等化，收入分配的“扁平化”，社会阶层之间有充分的流动性，有一个“橄榄型”的贫富结构，有一群足够数量的独立于政治体制的知识精英，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等等。

4、政治文化条件：包括高度的文化同质性（也有人认为高度的文化异质性更有利于民主），牢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神权“祛魅”、极端意识形态衰减、“原教旨主义”消解，足够的宗教宽容与政治和解，公民意识的普遍化、“公民文化”的兴起与公民社会的壮大，等等。

5、国际环境条件：包括有利于民主化的国际压力的增强，或者，有害于民主化的外部强制的解除，以及有吸引力的邻国的民主示范，等等。尤其是来自与本国交往最密切的那些国家的政治与外交压力和来自原同种政体国家或同一族源国家的成功的民主示范更为重要。

上述这些民主条件大都既有理论上的来源，也得到了历史经验的部分证实。

从世界史上的民主进程和当代世界的政体分布图来看，民主宪政确实其来有自。其前进脚步似乎有迹可循，其成败兴衰亦非凭空产生。民主化的全球历史，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串模糊的足迹：

其一，最早建立起民主政体，且民主运作早已得心应手、臻于成熟的那些国家，大都是有基督新教文化传统的国家；

其二，经济最发达、国民教育水准较高的那些国家，大多数已经建成了稳定可靠的民主制度；

其三，社会阶层较为平等、中产阶级规模较大的那些国家，往往是民主转型成本较小、民主政体较易巩固的国家；

其四，有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民族、白种民族、非白种的英语民族，比其他民族较易实现民主化；

其五，曾沦为英属殖民地、或曾被美军占领过的非西方国家，相对较易实现民主化；

其六，如果同一民族或同一文化传统中已经出现了成功转型的民主楷模，则该族系、该文化圈中的其他国家要比缺少民主榜样的国家更易实现民主化；

其七，在完全不能满足上述任何条件的贫穷落后国家，即非西方、非白种、非西语、非基督教文明、非政治世俗化，且缺少外部动力与楷模示范，兼一穷二白、民不聊生的那些民族国家，民主往往很不可行。要么从来就没有产生过民主化的任何冲动或任何努力，要么曾因幼稚冒进的民主实践而自找麻烦，从此陷入长时期的革命、骚乱、动荡和内战。

二、然而，尽管如此，前述五类民主条件的普遍有效性不能成立。因为其与民主化或民主巩固的因果关联时有时无、此有彼无，相关性相当可疑。而且，有一些条件过于模糊、不可定量，甚至难以定性。比如，“中产阶级”是否足够强大、“国民素质”是否足够优秀、“公民文

化”是否已经兴起，这些都很难在民主化之前作具体的衡量，因此也就缺乏实践指导意义。

事实上，在民主化与民主巩固这一领域，迄今为止，人们所揭示的只有或然条件、而没有必然条件，只有成败百分比的高低、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因果律。前述每一项民主条件（或任意组合的若干个民主条件）均有明显的（甚至是“扎眼的”）反例存在——某些早已满足了条件的国家迟迟不能实现民主，而某些离条件差距尚远的国家却已稳居民主国家之列。人们也不难发现，各国民主化的实践既有诸多的相似性，也有诸多的个案差异：对一国民主曾经发生过重要作用的某些客观条件，在另一国未必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反之亦然；曾经有助于一国民主的同一些条件，在另一国，反而可能会有害于那里的民主。这也就是说，上述每一项条件都不是民主化与民主巩固的必要条件，更非充分条件，其既无由此及彼的穿透力，亦无一票否决的决断性。经济、社会条件如此，文化、国际条件亦如此。

其实，政治理论家们劳神费心所列出的那些个民主条件，在严格的意义上，均不足以称之为“前提条件”或“先决条件”。准确一点说，它们仅仅是一些民主的“有利因素”而已，且其相对重要性对各国不尽相同，因而，并不具备可靠的普适性或通用性。所以，我们应该重视这些民主条件，但却不必要拘泥于这些民主条件。

对于尚未实现民主的国家如中国来说，假如说我们有什么“后发优势”的话，看起来，这优势并不在于我们已掌握了一套现存的、可以套用的民主公式。我们也无从期待得到这么一条“民主是怎样炼成的”物理学定律。我们所能从先进国家汲取的，除了思想、信念、价值观，只有经验与教训。中国的民主，仍然有待于我们自己独特的创造性、建设性的努力。坐等客观条件成熟而轻松收获民主的想法，大概是永远没有指望的。

三、中国是否具备民主转型的条件？如果不具备，中国还缺少哪些民主条件、怎样才能补足这些条件？从清末至今，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人一直在理论上思索、在实践中探讨这一问题。

当年，晚清政府拒绝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的时候，“上谕”给出了这样的理由：“民智未尽开通，财力不敷分布，操之过蹙，或有欲速不达之虞”。就是说，国民素质、财政经济尚不具备立即转向立宪君主制的条件。平心而论，以当年民穷国弱、财政窘迫、社会闭塞之状况而言，清廷的说辞并非完全无理，但是，当年的立宪派与革命派均不认可此理。此后，民国总统袁世凯欲毁共和而称帝，革命先锋国民党欲缓立宪而“训政”，他们却又食起清廷的余唾，所提出的理由与昔日君主并无二致。袁氏称帝的辩护者说，中国贫穷落后、人民愚昧无知，民主共和之制与中国的国力、传统、民俗皆不匹配。除了超级强人袁世凯之外，其他的任何政客、任何政党均无力维持一个稳定的共和国家，若不废共和而立帝制，中国必将在袁氏身后陷入空前的内乱。当时最博学的宪政理论家之一杨度、美国一流的宪法学者古德诺，为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作出了“有理有据”的论证。而国民党“训政”的依据则是堂而皇之的“总理遗教”。孙中山说过，“久经束缚、骤然解放”的中国人民根本没有能力去行使政权、监督治权，甚至在不知不觉之中很容易就“陷于反革命而不自知”，“人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之幼稚上，实等于初行之婴儿”，此等人民，必无实行宪政民主之资格。因此，必须先由伟大的党国“保养之，教育之”，人民才能有朝一日获得革命政府的信任。可见，大清、袁世凯、国民党，他们虽然是政治上的死对头，却有一个一脉相承的共同观点：他们都认为，别人掌权的时候倒是不妨立宪、也不妨革命的，而自己所掌权的这同一个国家，却必定达不到民主宪政的基本条件。

中共作为最最彻底的革命派，其对于民主条件的“理论口径”比起它的专制前辈，显得更加颠倒错乱、反复无常。早在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之际，中共就曾经号召结束一党专制、速行民主宪政。那时的中共声称，举选式、代议制的民主在中国已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除了国民党顽固独裁之外，并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条件限制（这有笑蜀所编《历史的先声》为证）。此一时彼一时，到了五十年代初期，权位巩固的毛泽东变得雄心万丈，毛氏认为，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已将民主淘汰，“旧民主主义”已经不合时宜，“新民主主义”（即一个领导阶级与四个破落阶级之间的所谓协商式“民主”）也因四个阶级的奄奄一息而变得无聊和多余。民主早已不再处于条件是否具备的阶段，而是发生了“质的飞跃”，中共声称，社会主义中国的制度条件已经“高得无比”，可以毫不费力地向它的“人民”提供一种比虚伪的西方式民主“优越得无比”的新型民主，这一种民主，就是与“无产阶级专政”二语一义的“无产阶级民主”或曰“人民民主”。

到了邓江胡时代，中共所统治的中国从“高得无比”的“民主”云端跌回与晚清、民国相似的政治处境，它站在民主化的边缘，再一次面临民主条件是否已经具备的老掉牙问题。奇怪的是，在仍然伟光正的中共大佬们眼里，原本“低得无比”的宪政民主，如今却在“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左右挤兑之下，又变得遥不可及，甚至连最基础的条件都不具备了。在清廷“预备立宪”已过百年之际，按照李慎之先生的说法，中国民主转型的“条件已经烂熟”，然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江泽民、胡锦涛们在解释为什么中国还不能举办比村庄更高一级的民主选举时，竟然又搬出了清、袁、孙、蒋曾经用过的那套理由：民主虽好，但条件尚不具备。一百年的革命奋斗、流血牺牲，中国的统治者在理论上、实践上，守权固位的欲望上、拒绝民主的心态上，终于又轮回到了当初的起点之上。

四、当今中国，在经济发展、国民素质、社会结构、政治文化、国际环境等各方面，与一百年前的清末民初，与八十年前的北伐前后，与六十年前的中共建政，与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情况已然大不相同，几至不可同日而语。那么，果真如中共所言，我们仍然达不到扩大民主、实施宪政的条件吗？

对此，《零八宪章》作出了完全相反的、极其响亮的回答。

《零八宪章》并不赞成那种“欲民主，则民主至矣”的浪漫主义民主观。它承认，民主化与民主共和的巩固不仅需要机遇与努力，也需要满足某些客观条件。关于辛亥革命，《宪章》指出：“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在这里，“特定历史条件”是当初民主转型失败的解题钥匙。

然而，《零八宪章》绝不认同以条件作挡箭牌的中共民主观。它认为，当今中国已不存在条件上不可逾越的障碍，民主转型已到达历史的临界状态。《宪章》指出：“（威权主义政治）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在这里，落后的已不再是民主的条件，而是比现有一切条件更加落伍的一党制威权政体。这就是《宪章》对中国民主条件的回答。

2009年11月10日

（源于：民主中国）

由二十年民间抗争谈《零八宪章》的意义

杨宽兴

从民间抗争的意义看，六·四后的20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自1989至1998年间的9年间，虽然八九抗争的余波从未中断，有过1992年的胡石根案、1995年的《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签名等悲壮的努力，但六四镇压造成的极度震撼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沮丧感，使民间很难对强权形成新的冲击，这种局面直到1998年才结束。

■ 中国民间抗争的新阶段

1998年的民主党组党是一次较大规模的全国性行动，其参与主体是八九民运的受迫害者，他们用再一次的勇敢行动，用再一次的个人牺牲尝试维护宪法确立的自由结社权利。98组党留给我们很多经验和教训，总体而言，民主党的组党理论和实践并不激进，是一次理性的意见表达，至今仍有极大的思想价值，但由于参与组党者大都有七九民主墙、八九民运等政治经历，是中国政府眼中的敏感人物，组党行为很快导致中共斗争神经绷紧，对于组党打压力度超出人们的想像。组党运动被迅速镇压，未能持续发展下去，这是很遗憾的。

目前我们所谈的维权运动大致可以从2001年、2002年算起，其参与者主要有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权利受损的普通民众。我们知道，八九民运之后，中国政府加强了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其目的是所谓的社会稳定，但加强权力控制的同时，法治的权威遭到损害，导致大量侵权事件发生，来自受害者的自发抗争迅速增加；第二部分是网络时代的知识分子和良心人士。网络信息传播加快了思想启蒙的步伐，也使民间人士的联络成本大大降低，分散的良心力量开始在网络上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官方的民间话语场。借助于网络等现代信息传播方式，知识分子、良心人士与普通民众逐渐走近，形成了声势越来越大的维权运动。维权运动的参与者大都没有遭受历次政治事件的直接波及，生存状态比较正常，而且较少存在恐惧心理，因而更容易形成对专制权力的持久冲击力。

但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目前的政治和司法体制下，从个案维权来讲，存在着成本高、收效小的问题。由于司法及信访体系受制于党权，受害人的维权活动很容易成为漫长的上访马拉松，耗费受害人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致使其身心疲惫，甚至造成对于受害人的二次伤害。由于专制政权侵权问题的系统性和侵权现象的广泛性，维权运动消耗了民间的大量资源，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了所谓的“维稳”，消耗更多的公共资源对维权者围追堵截，这成为一场零和游戏。要解决这个矛盾，必须有整体性解决思路，消除权力系统性侵权的根源，而不能单纯依靠个案维权。

■ 维权运动与《零八宪章》有机结合

民间抗争事件的迅速增加和矛盾解决的困难，从一个方面证明了《零八宪章》的现实意义。《零八宪章》基于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的普世价值，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提出共19项主张，这是解决目前中国现实矛盾的系统表述，是中国长治久安的根本之计。《零八宪章》签署人包括长期呼吁中国民主、宪政的知识分子、体制内人士、一般职员、工人、

农民、学生等，但维权人士所占的比例可能是最大的。这并不奇怪。

在邓小平的 92 年南巡讲话后，邓小平主义全面形成，它的主要内容是，1，政治高压；2，全力发展经济，3，社会自由度增加。经济发展空间和社会自由度的增加释放了民间的抗争动能，使专制权力获得了喘息空间，也使自由、民主、宪政的呼吁在现实中部分受阻。但在维权者这个群体中，《零八宪章》的呼吁是非常容易获得共鸣的，一位遭受暴力强拆的受害人曾亲口对我说：“在遭遇政府蛮横的拆迁之前，虽然也知道社会上有些不公，但总体上觉得社会和政府还是正常的，在拆迁维权中，才发现当民众遭遇政府侵害时，全无效的申诉渠道，社会完全不是自己以前所想的那样，于是我逐渐意识到中国的问题是缺少民主，没有民主的政治体制，我们就随时可能被侵犯。”在受害者当中，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心理过程。我的个人经验是：在维权上访群体中宣讲民主、人权理念乎没有任何阻力，几乎就象对沙漠中的行人推销矿泉水一样容易。《零八宪章》并非独立于维权运动的抽象宣言，也是对民间维权的理论总结和归纳，因此，对参与维权运动的知识分子和其他活跃人士来说，有意识地持续宣传《零八宪章》，是至关重要的。系统化的理念表达指明了社会整体努力的方向，将各阶层变革力量凝聚在一起，增强个体维权者对于未来的信心，当人们意识到维权是影响中国未来的整体运动，而不只关乎个人成败的时候，他更有可能承受自身维权的暂时受挫，同时，《零八宪章》的理念也可以使体制内有识之士形成解决中国诸多现实问题的新思路，通过对话与协商，而不是任意打压来对待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我们应当看到《零八宪章》的旗帜性意义，维权运动自身不能无法成为政治符号，而《零八宪章》具有这种功能。

《零八宪章》用简练的文字表达了关注中国民主未来人士的一种思想和行动愿景，体现了解决目前中国社会诸多复杂矛盾和诸多零和游戏的政治智慧，是思想启蒙与现实努力的结合，但它并无行动方案，也无具体民主日程表，《零八宪章》的作用在于它的基本理念能否被中国社会广泛接受，形成包括体制内开明人士的共识，它对中国政府并不构成即时挑战，因此，中国政府对于刘晓波的抓捕是愚蠢而难以接受的，在这里，除了向其主要起草人刘晓波先生表达敬意，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不断地向中国政府表达释放刘晓波的呼吁。

和维权与所谓“维稳”的零和游戏不同，《零八宪章》追求民间与政府的共赢，希望以最小的代价完成社会转型，实现社会正义。但历史早已证明，中国政府不会倾听来自社会良心的微弱声音，民主理念只有转化为社会运动，才可能形成对于政府的压制力量，迫使其启动政治改革。因此，将维权运动与《零八宪章》形成有机结合，是维权者及追求民主、人权的各界人士的共同历史使命，只有通过这样的努力，让中国成为一个民主、自由而尊重人权的国家，每一个公民的切身权利才能得到根本保障。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公民维权运动与中共建政 60 年研讨会”上的发言，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源于：北京之春）

从柏林墙到《零八宪章》

楚江风

2009年11月9日是柏林墙被推倒20周年的纪念日，20年前的那一天，伫立了28年零3个月的柏林墙被民众愤怒地推倒，此举既标志着德国的统一，更标志着共产主义在东德的彻底土崩瓦解。柏林墙的倒塌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继柏林墙倒塌以后，1989年的12月底，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政权也被民众推翻，两年之后的12月26日，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苏联也宣布解体，齐奥塞斯库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显然与此存在一定的关系。

东西两德合二为一，拥有民主制度的西德最终统一了东德，让东德民众结束了几十年专制统治的痛苦历史，遗憾的是，前苏联的解体却仍然未能让之后的俄罗斯在政治体制上摆脱专制的宿命，但比起原有的政权，新的俄罗斯政权仍然要人性得多。提起柏林墙的倒塌和东德的解散，不能不让人想起同一年发生在中国的那场政治运动，也许，正是因为有了之前中国民众的觉醒和流血牺牲，才鼓起了东德民众对抗专制的勇气，提前促成了专制东德的破产和两德的民主统一。

柏林墙的倒塌对于中共以及其它共产主义国家统治者来讲，不仅并非一件高兴的事情，而且永远都是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如此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在中国却不太为一般的人所知晓，随着岁月的推移和互联网的发展，如今，中国媒体对有关柏林墙的报道不再显得像以前那般过敏，但在报道方向上却明显在避重就轻，它们更为看重的不是柏林墙的倒塌对东德政治制度的影响，而是导致两德统一的这种结果。其用意何在，相信是不言自明的。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均发生了政权更迭，原有的共产主义制度最后均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取代，史学家称这一系列的事件为“苏东剧变”。“苏东剧变”后，大多数专制国家只存在于亚洲，因为苏联的解体，中共所统治的中国最终成为了专制国家的龙头老大，诸如朝鲜、越南等小专制国家无不以中共的马首是瞻。

回顾历史，扫描世界，我们不难发现，在曾经的共产主义国家和继续存在的共产主义国家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位居世界的前列。邓小平曾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论马克思等人将共产主义社会描绘得如何美好，以邓小平的这种标准来衡量一个社会的先进与落后的话，可以说共产主义无疑是远不如资本主义。

邓小平善于见风使舵和明哲保身，并且也不乏一丝开明，但在政治思维上并不比之前的毛泽东先进多少。他在推行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之后，始终无法走出一党独大和自私自利的思维局限，在血腥镇压了当年的民主运动之后，便让继任人江泽民高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被封“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六四”以后，中国的政治改革不但没有继续推进，政治环境反而有每况愈下的趋势，但在经济方面却在不断地与西方先进国家接轨。

跛足改革虽然延续了中共的专制统治，但也将中国社会推进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深渊，严格地讲，从江泽民时代开始，中国就已经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国家，但说它是地道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符合现实，因为中国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自由度远都不能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财富基本为官员以及和官员有勾结的商人所掌控，而权力资源也开始由比较公平的分配走向今天的集体世袭和买官卖官。

和 20 年前相比，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态也和当年无法同日而语。走在中国的大街上，你会发现到处都是车水马龙的景象，但是，在表面繁荣的背后，中国社会却是民怨沸腾、危机四伏，因为官权对民权的压制以及对民财的收刮比 20 年前更为严重。德国的柏林墙倒塌了，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却有一堵堵比柏林墙更为坚实和高大的墙体在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虽然无数的民主人士在 1989 年的时候“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依然活着的人仍然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中国的变化和致力于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当年的北师大讲师刘晓波博士虽然因为参加学潮而锒铛入狱，但在获释后仍然是矢志不渝，即使几度失去自由，也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民主理想。2008 年 12 月 8 日，因为他和张祖桦均被当局视为推动《零八宪章》运动的核心人物，结果双双被带走，张祖桦幸而获释，但仍长期遭受严密监视，而刘晓波则至今仍身陷囹圄。

当局企图以抓捕刘晓波的方式来阻止《零八宪章》发布的阴谋最终未能得逞，原定于 2008 年 12 月 10 日发布的《零八宪章》最后不但未被扼杀腹中，反而提前一天公之于众。抓捕刘晓波的举动并不能让其他追求民主与自由的人们感到胆寒，《零八宪章》因为刘晓波的被捕而显得更加悲壮，更具吸引力。虽然众多的《零八宪章》签署人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骚扰，但其后的签署人仍然是接踵而至，数不胜数。正印了中国的一句古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德国的柏林墙早就轰然倒塌了，而中国的柏林墙却无处不在，网络柏林墙阻挡着人们获取自由资讯、经济柏林墙阻挡着普通老百姓发家致富、政治柏林墙阻挡着政治改革的推进和民主制度的到来。《零八宪章》虽然只是一个征集签名的文件，但它却向中共当局发出了呼唤民主的最强音，撞击着中国社会大小、各式各样的柏林墙。

柏林墙倒塌 20 周年之际，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领导人齐聚德国柏林，和德国民众一道共同庆祝推倒柏林墙 20 周年。包括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前波兰总统瓦文萨等在内的一些当年的历史性人物也作为贵宾前去参加这次纪念活动。可以想象得到的是，中共领导人绝不会去参加这样的活动，他们对这样的活动甚至是唯恐避之不及。从道义上讲，一个类似于前东德的政权也没有脸去参加这样的活动，除非中共当局确实有政治改革的意向和决心。

今年的 12 月 9 日是《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的纪念日，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大陆，当局无论如何也不会允许人们去公开进行纪念。因为他们很清楚，在他们这么多年的专制统治下，不知道有多少民众对这个制度怨声载道，对那些作威作福的官员深恶痛绝。《零八宪章》原本是帮助中共延续政治生命的一剂良方，如今却被视为威胁社会稳定的反动文件，《零八宪章》只是要求当局顺应历史潮流，启动政治改革，争取早日实现宪政民主制度，如此温和的文本却被打入另册，签署人被视为另类，这是何等令人痛心的现实。

不管中共当局如何抹黑《零八宪章》，这份文件都必将被载入史册，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也不管中共当局如何迫害签署人，这份历史性文献都必然会推动中国一步步向民主社会靠近。德国的柏林墙曾在一夜之间消失，中国的“柏林墙”也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轰然倒塌，迎来民主的春天。

2009年11月10日

（源于：民主中国）

《零八宪章》——自由社会的基本“常识”

易 尧

2008年12月9日世界人权日前夕，303名中国各界公民以实名签署和发布了《零八宪章》，强有力地展示了中国公民追求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法治、共和、宪政的坚定信念。在笔者邮箱中，有封当时网友群发过来的邮件，邮件称：“无论你的政治观点如何，恳请认真读这份《08宪章》，为此，刘晓波先生被刑拘了。2008年12月9日发表这份文件之前一天，8日，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了宪章发起者刘晓波等人。303名在宪章上签名的各界人士，目前也处于危险之中。我签名了，就在昨天，惊闻刘晓波被拘之后，以此声援刘晓波等人。尽管我们普通人的名字也许只是加到骆驼背上的一根稻草，但我相信，我们不是最后一根。”

邮件内容言辞恳切，网友们对自由的热望溢于言表。我们可以看到，《零八宪章》言必“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法治、共和、宪政”等词汇并不时髦，几乎是老调重弹，不具有任何标新立异之处。但是，对于我们这个被专制统治糟蹋得千疮百孔的国度和熏染得几近麻木和冷酷的民众来说，它带来的是一股晨风般的清新，给人鼓舞，让人振奋。与官方打压同步的是，从12月10日到17日，仅仅七天，签名人数就超过五千，迄今联署签名人数已近万人。签名者遍及各地，跨越各个行业，有学生、记者、律师、普通职员、维权人士等等，超越了六四以来民间一直重复的小圈子式的政治动员，它可以与托马斯·潘恩的《常识》相媲美，也是可以用来建设民主中国的基本常识。

1774年10月，潘恩被迫作为契约奴而去美洲。到达北美后，正值北美人民反英斗争风起云涌。但是，当时人们的君主制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独立”的口号为人民所忌讳。即使是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等政治家，也视“独立”为畏途。斗争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这成了当时一个迫切需要解答的突出问题。在这些革命家们的眼里，政治追求与价值的实现需要靠制度而不是靠多数人的意志。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自觉地把民选政府置于共和的、宪政的、自由法治的制度框架之中。民主的基石是自由，没有自由，那么民主也就是空中楼阁了。18世纪的美国革命就是这样一次争取公正与自由，并最终为这些自由和公正制定制度保障的运动，为争取自由，帕特里克·亨利在他著名的演讲中喊出：“不自由，毋宁死。”

要不要为《零八宪章》签名？这是许多中国人所面临的一个选择。它跟当年的美国民众要不要自由的选择有着相同的境况。刘军宁在《保守主义》一书中写到，“美国革命则既是一场自由的革命，因为它为当地民众争取到实实在在的自由，也是一场保守主义的革命，因为这场革命没有触及革命前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宗教文化和道德风尚，没有试图将社会与（从英国继承来的）传统彻底打碎后再进行全盘性的改造。”当时的保守派在强调“民主与和平”的命题下，反对这场革命。当着“要和平还是要自由”这两个政治价值摆在北美人民面前的时候，潘恩的《常识》适时出现。《常识》告诉美国民众：长期以来，我们受到历史久远偏见的迷惑，为迷信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自由，比所谓的“民主与和平”更重要；政府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政府的意图和目的应该致力于公民的自由与安全。

潘恩的《常识》为独立战争吹响了号角。《常识》一问世，人们就争相传阅，爱不释手，到处都有人学习和议论。《常识》还直接影响了北美的《独立宣言》，《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坦率地对潘恩说：“你为你的国家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你说出了我们大家所想的意思”，并说，他在《宣言》中引用了《常识》，并对此“引以为荣”。“我们认为，”杰斐逊如是说，“这些真理是神圣的，不可否认的；人人生而平等和独立。”值得欣慰的是，《零八宪章》也受到了中国普通民众的欢迎而得以广泛传播。它同样重申和普及了这样一个“常识”：“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众所周知，没有自由的奴隶必须服从主人，而平等享有自由的自由人则可以为自己建立一个政府，政府借助法律，而不是靠主人不受约束的意志来保证秩序。然而，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总是有那么些人凭借着手中的刀枪奴役着其他处于弱势的人们。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讲演录》中指出，普遍的自由已成为近代德意志世界的伟大成就。他说，在东方专制国家，一个人自由；在希腊和罗马人中，一些人自由；而在近代欧洲，所有人都是自由的。黑格尔死后的几十年，在欧洲的所有属地和美国的奴隶都获得了自由。恰恰在这个时期，共产主义出现了。共产主义通常的解释是，以公有制、公共生产、公共消费、公共自治甚至还有公共性生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结尾告诉工人们，他们将得到空前的解放，失去的只是锁链。

遗憾的是，共产旋风迅速波及世界各地，却滋蔓成了人类文明的一大瘟疫，它以自由的名义蜕变为自由的天敌。2007年6月12日，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上，美国总统布什在演讲中如是说：“……有数百万或更多的籍籍无名的人死于共产主义的毒手。他们有在斯大林的大饥荒中活活饿死的无辜的乌克兰人，有死于斯大林清洗的俄国人，有将全部家当装上牛车背井离乡被流放到北极这一苏联共产主义死亡集中营的立陶宛人、拉托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他们有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的中国人，有在波尔布特的杀戮战场中被屠杀的柬埔寨人，有为了投奔自由试图挖掘柏林墙而被射杀的东德人，有在卡廷森林被屠杀的波兰人，有在‘红色恐怖’中被屠杀的埃塞俄比亚人，有在尼加拉瓜桑地诺独裁政权中被谋杀的摩斯基多印地安人，有为逃离暴政而溺死在海上的古巴人。”

在共产主义的灾难中，中国人民遭受的茶毒最为惨酷和漫长。虽说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已成为历史，但今天仍有大批人因政治异议而被监禁在监狱。如刘晓波、王炳章、秦永敏、郭飞雄、胡佳、高智晟、何德普、郭泉、谢长发、杨天水、陈光诚、靳海科、吕耿松、吴义龙、余万宝、陈忠和、胡明君、王森、李大伟、孔佑平、宁先华、李智、许万平、陈树庆、王荣

清，谭作人、黄琦等等，他们大都是只有手中有笔的异议人士，是文弱书生，而扣压在他们头顶的罪名却无不是煽动或颠覆国家政权。

《零八宪章》指出，“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这里说明的只是一个事实，而非追究责任。它比潘恩的《常识》要温和许多，它是善意的。文明社会是向前发展的，执政当局应该理性地看待，多一份与人民大众的和解而不是漫无边际地打压。近一年来，疯狂地抓捕和讯问《宪章》的签名者，除了暴露出自身的短视和无知外，它激发的更多民众参与到要求自由的运动中来。1775年，埃德蒙·伯克作为英国议会议员请求与北美殖民地和解时说：“所有的政府，甚至每一种人类的利益和享受，每一种美德和每一种谨慎的行为，都建立在和解和互相交换的基础上。”事实上，《零八宪章》营建的也是这样一个平台。

在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农民即为贱民的今日中国，《零八宪章》要求“平等”不仅仅是权利的伸张，它还可以看作是一种道德上的宣言。绝对的平等可能难以做到，但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任何文明社会都不容置疑的。然而，在一个当权者要求法院的审判工作要讲政治的时代，“平等”只能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正如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有国父之称的孙中山先生慷慨陈词的：“共和的观念，是平等、自由、博爱嘛。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粪土。民众，仍被奴役着。”

“共和”在中国社会喊了整个世纪，但在这个喊着“共和”的百多年里，中国人一直在自我倾轧、杀戮和奴役，“黑砖窑”和“毒奶粉”让孩童也未能幸免于难。《零八宪章》对“共和”的阐释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即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也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潘恩在《常识》中早就断言：“任何政体愈接近共和，需要国王做的工作就愈少。”“英国人引以自豪的，不是英国政体的君主的部分，而是共和的部分，也就是从他们自己的团体中选出下议院议员的那种自由——并且我们很容易看出，当共和失效时，奴役便接踵而来。”

可是，在当前中国，虽然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共产专制的党皇帝却借尸还魂，依然盘踞在人民大众的头顶恣意妄为，让一大部分人生活在贫穷和不幸之中，处境甚至远远不如封建王朝的底层民众。官僚们依靠种种不平等的法规条文和军警、城管、乃至监狱等强权机构，把野蛮作风蔓延至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并通过医疗、教育、房产等垄断式的压榨，把穷人身上本应用来维持他们的生计大部分收入掠取后，全部用于奢靡无耻的吃喝玩乐。这是一种全新的奴役，它让普通民众在不知不觉中失去自己的血汗收入、健康、家庭，甚至生命。

而阻止“奴役”的一个最行之有效的措施显然就是具有宪政保障的自由和民主。在美国的宪法中，民主是作为民众的权利得到充分肯定的。对于当权者而言，强调民主不是描述它的统治方式，而是确认它的权力来源。如果要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宪政”就是一种必须。如此，才能使人们真正享有那些现在被专制官僚阶层所剥夺的富裕生活。概括地说，如果那一天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来临了，《零八宪章》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明晰地对中国民众普及了一个“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的理念，因为这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基本常识。

（源于：民主中国）

终将冲破专制黑云和物欲阴霾的精神光芒

张世航

尽早实现民主转型，不独是海内外民主人士的渴盼，也是很多中国民众的祈愿，在体制内也有相当数量的开明人士怀此希冀。一个社会实现良性转型的直接推动力，主要在于为私之心的淡化，在于精神价值的追求，在于道德水平的升华。一言而蔽之，决定一个社会实现良性转型的直接推动力是意识因素而不是物质因素。譬如，普遍良知意义上的“德性”，对自由的本能渴求，对弱者的同情怜悯，对强暴武力的本能厌恨，独处静思的道德自建本能，对物欲的被动克制和主动克制，对意境美的向往，对善良人性的后天性本能依恋（关于人性，我以为，人没有自我意识时，无所谓人性。所以，人性是后天产生的；依恋善良人性的本能也是后天性的。人在走出幼年懵懂状态之后，会逐渐体会到自身的脆弱性，同时，对自身脆弱性的担忧、无奈、力图弥补等情绪会有意无意地转为对待他人的渐趋于理性的思维方式，这就是人性）等。“物质决定意识”之类的马列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人性、美、精神价值的自我发现等意识因素对现实的主导作用。其理论被断章取义后所力倡的“阶级斗争”、“专政”、“暴力”等成分，为共产政权建政理念的非人性化、压制自由、排斥审美注重实用、不在意纯粹精神价值等恶劣倾向奠定了基础。

自毛泽东逝世之后，迄今为止，大陆社会所发生的对良性社会转型有积极意义的一些较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其直接推动力都是以意识因素为主。信仰团体所进行的维护信仰的非暴力抗争自不必说。而侧重于争民主反专制的群众运动，如“六四事件”，其直接推动力也是以意识因素为主。

“六·四事件”爆发前夕，被视为党内开明改革派的胡耀邦的突然去世，以及关于胡耀邦被排斥、打击等传闻引发了广大民众的恻隐之心。这是被人性火花点燃的导火索。当然，当时的反“官倒”反腐败的社会意识潜流里带有一定程度的“物质要求”成分。但这只是背景原因。如今的腐败和权贵经济戕害民生的严重程度远甚于当时，而并未爆发大规模民主运动。可见，意识因素对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推动作用主要的。再说，“六四事件”的主要发起群体是心志纯直、胸怀天下的大学生，他们愤而上街并非缺吃少穿和利益追求所致。他们尚未真正走入社会，他们发起游行，初衷主要是希望推动国家走向民主和法治的道路，没有太强烈的特定社会阶层之利益诉求色彩。至于在“六四事件”的高潮、尾声阶段，社会责任感远强于今的市民们自发走上街头支持、援助、救护学生，更是为“六四事件”添上了毫无私心的精神价值光彩和悲悯博爱的人性光辉。

“六四事件”至今，已二十春秋。这期间，除了信仰团体所发起的较大规模的非暴力抗争运动，再没有纯粹性的以争民主反专制为目标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客观地说，当今大陆社会所暗蕴的以意识因素为主的民主转型推动力，比之“六四事件”时，整体而言确是衰弱了。然而，当今大陆社会中，仍然有大量的潜而未发、涌而未荡的以意识因素为主的民主转型推动力。这些以意识因素为主的民主转型推动力，比之“六四事件”时，虽合力有减，但有了多元化、阶层化、成熟化的特点。这些愈趋于多元化、阶层化、成熟化的以意识因素为主的民主转型推动力，已在专制黑云和物欲阴霾中焕发出隐然之光彩。一道道精神光芒，在各个阶层中隐隐放射出来，交叉闪现，相互辉映，愈来愈强，终有一朝将冲破专制黑云和物欲阴霾，

照耀出一个生机勃勃自由民主的中华。这些足令每个中国人都充满对未来之希望的精神光芒，由赤绿橙黄青蓝紫诸色光合成：

（一）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所导致的贫富分化等因素，对物欲的压制作用远强于刺激作用。被压制的物欲却为私心的淡化和精神的自调提供了条件。从大多数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中折射出来倾向于“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平淡却持久的德性光彩。在官僚权贵阶层中，也有少数人因其坎坷遭遇、特殊经历所致而富有良知，洁身自好，不为物欲、权欲所累，在黑暗的专制统治阶层的一隅焕发出各所独具的德性光彩。

未写这篇文章前，我心里一直盘亘着这样一个问题：当今大陆社会，一方面是“物欲横流”（“物欲横流”是在民主人士的文章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我每见之，必心头一凉），一方面却是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各种宗教尤其是被打压的“地下宗教”的人数的剧烈增长。这个显然可称作悖论的现象，为我苦思许久。而今，通过写作本文之前的思考，基本理清了思路。

“物欲横流”“人人都向钱看”等，在当今语境中一般用作贬义形容，指对金钱的强烈贪欲。而对金钱的强烈贪欲，主要源于获得金钱的轻松和简单。而普遍贫困的下层民众，获得金钱的方式既不简单又不轻松。各个方面日趋不公的当今大陆社会所涵纳的如民间利润空间狭小、贫富分化、物质财富增长等因素，对人的物欲既有压制作用又有刺激作用。就当今大陆社会整体来看，多数普通民众的物欲到底是被压制了。民众对金钱的欲望之强烈程度，远不及中共官僚权贵及其附庸者，远不及那些形形色色的以损人利己方式获得不义之财的人。

当今大陆的官僚权贵经济已臻空前强盛之地步。我们看看现实，就很容易搞清这一问题。譬如在大陆县城里，很多行业如教育、房产、医疗、通讯、自来水、电力、烟草等，都是高度垄断的。教育，一般是县一中、二中、三中……而民办学校或濒临破产、或依靠行贿等手段不顾一切地依附于公办学校而维持残喘。通讯，还不如教育，移动、联通、网通、电信四大家族垄断了全部通讯资源，皮毛也不给民间。医疗，也是公办医院一手遮天，除了有特色的技术力量较强的专业医院之外，其它的盲目求全的民办医院基本都不怎么景气。至于房产，更是官商一体狂敛民财的绝对垄断性行业。绝对垄断的背后是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加上绝对垄断，为官僚权贵群体掠来绝对利润。滚滚暴利中的每一分钱，都附有无法洗脱的原罪。官僚权贵经济占据着九山九水，余下一山一水也不甘愿抛给民间，仍要努力蚕食。另外，民间的“一山一水”中，有相当部分是官僚权贵体系洗钱之后的产物。与官僚权贵经济毫无瓜葛的狭小的纯粹民间利润空间里，普遍也是分割完毕、各有山头。官僚权贵资本主义的血盆大口吞噬了绝大部分利润空间。极其有限的剩余利润空间无法形成对广大民间的普遍性激励。缺少足够利润激励的民众，对于金钱的欲望之强烈程度要大打折扣。

另外，在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相对贫困的广度深度都在加大等各方面原因的综合影响下，很多无权无势的工薪阶层、中下层市民、打工仔、农民工、农民等，百般努力饱经挫折仍生活拮据或度日艰辛，“致富无望”对他们而言，成了一个愈来愈明朗的判断，渐渐将他们的生活之激情和躁动之物欲一起冻住。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淡化再淡化，更倾向于“安贫乐道”“知足常乐”。尽管他们的物欲的淡敛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奈的被动克制，但终究是淡化而不是增强了。

所谓“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怎么过都是一辈子”，由于传统文化中务实观念的影响，中国人普遍是比较善于变通的。他们会为自己琢磨一套“活法”或“玩法”，使自己的物欲在长

久的显性或隐性的压制过程中实现“注意转移”，自觉不自觉的形成一套抗拒欲望、平衡身心的生活结构和思维方式，以“平平淡淡才是真”而悠然自得——这种社会生态基础普遍是倾向良性的。另外，很多下层民众在出力流汗才获得了可供维持生计的金钱的艰辛过程中，也建立了牢固的“辛苦才有收获”的朴实而健康的谋生观念。健康的谋生观念，能对强烈物欲、贪婪私心等负面人性形成强大压制。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之下，广大民众的物欲、贪婪、私心等负面人性在很大程度被压制，进而自行弱化。是故，当今大多数普通民众的普通生活中，都会不同程度地折射出来平淡却持久的倾向于“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德性光彩。这也是多种宗教在饱受打压之时还依然能广传于大陆的根本原因。

在官僚权贵阶层中也有少数德性高洁之士。这一类人群之大部分，因在官僚权贵中经受内争互斗之苦，对自己所属群体的种种作为有着深刻的反思；除此，多是虽基本未受本阶层所加之舛难却因其有着特殊生活经历和较为独立的思考而有着“出淤泥而不染”特质的年轻人。官僚权贵阶层中的有德之士，多洁身自好、富有良知，不为物欲、权欲所累，在黑暗的专制统治阶层的一隅焕发出各所独具的德性光彩。官僚权贵阶层中的德性高洁之士，其深蕴的精神力量对民主转型的促进推动作用，是不可小觑的。但，这一类人群所蕴含的有利于推动民主转型的精神力量不具有普遍意义，故不作过多论述。

这样一分析，竟然得到这样的结论：假“改革”之名拼命掠夺民众财富、榨取民众血汗并内争不休、内耗无己的中共，原来是促使道德相对平衡（或相对增强）、削弱物欲私心、推动宗教（地下宗教）广泛传播的重要动力！尽管这种动力作用是中共间接、客观为之。分析至此，可谓令人哭笑不得！你逼人家去“安贫乐道”、洁身自好，又绝不肯让人家在“安贫乐道”的基础上再作一点良性变通。由这一点也可看出，任何专制政权都无法逃脱最终灭亡之结局。所有专制政权，无论它怎么折腾，都是自己直接或间接地给自己掘墓并促使多数人为自己掘墓。

在推动民主转型的意识因素中，我们很有必要看到，在大多数普通民众的身上都会不同程度地折射出来的倾向于“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平淡却持久的德性光彩。虽然，这种光彩不强，但发光范围很广；虽然，这种光彩看似无奇，生命力却顽强，虽得于黑暗之专制而缓韧地消解着专制之黑暗；虽然，这种光彩是被黑暗燧石打出的，却从不曾被专制黑云和物欲阴霾遮住和湮没，它一直熠熠闪射，并衍射出其它颜色的色光。

（二）各种信息传播工具的广泛普及，使普通民众获得各种信息的机会大大增加。在被专制之苦刺激出的“趋利避害”本能的带动下，人们普遍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逆向思维”来辅助正向思维，最大限度汲取着、发掘着与自由、民主、人权等有关的各种信息。在官僚权贵阶层中的德性高洁之士中，因饱受内斗之苦或因特殊人生阅历所致，也不乏认同普世价值、民主理念者。民主自由观念愈来愈深入人心，加上昭示着中国之发展方向的《零八宪章》的催化作用，熊熊燃烧的千万颗矢志求民主之心，在专制黑云的笼罩下焕发出令人心醉的夺目光耀。

中共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我估计，中共的头头们一听到“自由门”“无界”“自由亚洲”等，都不免会出现皱眉、咬牙等条件反射症状。他们咬牙切齿、丧心病狂、不顾一切地挪用巨额民脂民膏去干“防民之口”的勾当。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拼命而为的封锁，确有暂时之效。最近几个月——大约从八月份开始，破网时的速度明显变慢，愈近十月，破网速度愈慢，在

九月下旬，“自由门”家族的全体成员都在“网络高墙”前败下阵来。调动“无界”家族，仍无济于事。我很是心灰意冷了一阵子。唯一让人欣慰的是服务器在境外的免费邮箱，经试验是封不住的。十月下旬，我自度，中共已尽得所谓“六十大庆”之亢奋，紧绷的神经应稍稍放松了。遂于深夜（直接负责封网者大概会在夜间放松警惕、或因疲劳而稍麻痹）使用破网软件。终于成功。立下载“自由门最新版”等软件。经实践，在白天和晚十一点（大约时间）之前，只有新版自由门和“绿坝克星”管用。看样子，网络封锁和反封锁的恶斗真的到了最剧之程度，出击和招架的时间间隔愈来愈短。那就看谁能坚持得久。看到底是堤能封洪，还是水可决堤。

其实，就算中共能全面取得网络封锁的成功，也无法全部消灭网络上的不利于其专制统治的信息。再说，除了互联网，还有卫星接受电视、收音机、手机等各种信息传播工具。当下，在与自由、民主、人权等相关的各种信息传播过程中，在音画虚拟世界与现实的互动过程中，现已普及的所有的信息传播工具都有着尚未得到充分发掘的巨大潜能空间。所有信息传播工具都尽得其用之日，便是专制统治彻底败亡之时。

除了如何充分今已普及的所有信息传播工具的现实课题，广大民众接受信息的一般性思维规律亦值得深究。据我的观察经验和思索分析，由于大部分民众都直接或间接地受过和正受着不同程度的专制之苦，在“趋利避害”本能的驾驭下，对于有利于中共的信息，很多情况下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于“逆向思维”，进行反面思考；会本能的、不自觉的接受那些抨击、揭露、对抗中共专制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大部分都和民主、公正、自由有关。通过分析民众接受信息的一般性思维规律，不难看出，这一点和本文第一条关于“安贫乐道”的德性光彩的产生机制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共对民间的压迫之力、剥削之功，很多都已返还或正返还自身。你给物体一个作用力，必定得到一个反作用力。天道循环，相克相生；报是要报，时候不到。悖天逆理，必食其果。狂作孽，岂可活！？

促进民主自由观念加速传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官僚权贵阶层中的德性高洁之士，或因饱受内斗之苦，或因特殊生活环境、人生阅历所致，也不乏认同普世价值、民主理念者。值得一书的是，昭示着中国之发展方向的《零八宪章》，已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当然，《零八宪章》所倡的理念未必能被一些民主人士全部认可（比如，我固赞同在民主化之后实现全民的土地私有制，但不太赞同《零八宪章》主要倾向于保证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的理念。我以为，由现在的土地使用状态平行过渡到土地私有制，对农民之外的民众尤其是弱势市民是一种巨大的不公）。但若说，《零八宪章》昭示着中国之发展方向，最大限度地传达出了最大范围内的渴望民主自由的国人的心声，稍存理智、稍有辨析能力的人对此应都不会有异议的。至于《零八宪章》的广大签署者们的认可、宣传、实践《零八宪章》的言行，我认为只是见仁见智的个人选择问题，绝不会、也不应导致未签署者对《零八宪章》自身理念的大范围否定。《零八宪章》的传播、影响和《零八宪章》的理念不能混为一谈。执意混为一谈，只能是欲掌所谓“话语霸权”（这个短语本身就有难以自圆之嫌：真正意义上的“话语霸权”只属于专制统治阶层，其他人们能有不充分的“话语权利”便已大幸了，遑论“话语霸权”）的别有用心之举。

未来的历史必将会证明《零八宪章》的非凡价值。《零八宪章》能够日益显现其价值，其原因不仅在于《零八宪章》符合了人心向民主、万众盼自由的历史大势而具有无尽的潜在价值，还在于《零八宪章》有着深厚的基础价值。《零八宪章》的基础价值在于，它既是当代民运的

结晶，还是历史价值的凝聚。在《零八宪章》的孕哺能量中，不仅有可敬的刘晓波先生等人的巨大付出，还有历史上、现实中一切为推动民主而战的人们的付出和牺牲。《零八宪章》字里行间，都涌荡着所有中华儿女力争民主的澎湃热血，燃烧着一切反专制人士的炽热之情。正如民主同道所言，“《零八宪章》面向中共、面向现行专制政体。但是，又绝非仅仅面向中共与现行政体。唤醒公民社会、凝聚体制外共识，是‘宪章’更为迫切、更加重要的使命。”确如此。《零八宪章》因深涵着巨大的价值感染力和道义召唤力，在当今大陆民众的民主自由等意识因素还未积累到一定程度、尚不足以引发质变之际，起到了并正起着巨大的催化作用，《零八宪章》如耀目的星辰，穿破物欲阴霾和专制黑云冉冉上升，使万千民众受之激励、遽然觉醒，愈来愈多的渴求民主之心熊熊燃烧，在专制黑云的笼罩下焕出令人心醉的夺目光耀。

（三）各类宗教团体尤其是饱遭打压的“地下宗教”，虽受百创而生命力不减，如火燎原，愈来愈盛。各类宗教团体在专制黑暗中显现着的信仰光彩，使得愈来愈多的沉于物欲、权欲之泥沼的灰暗心灵被召唤，从堕落中回升，并焕发出道德的热力。各类宗教团体尤其是“地下宗教”的广传，使这一被专制黑云和物欲阴霾包裹着的灰暗时代镀上了信仰者所独具的圣洁光华。

当今大陆宗教之最强盛者，不是被中共允许“合法存在”的“地上宗教”，而是饱遭打压的“地下宗教”。“地上宗教”虽传播条件好，但人数很少，不少“地上宗教”的信仰基础并不牢固。中共对“地上宗教”，在允许其公开活动的同时，一方面以一系列方式限制其发展，另一方面，对“地上宗教”赖以存身的活动场所进行商业化处理，将其变成景点之类，以利益来淡化、瓦解这些“地上宗教”的信仰，最大限度地使其世俗化，使其因信仰淡薄或无存而没有多少生命力和发展潜力可言，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了这些“地上宗教”对专制统治的潜在威胁。另外，中共以一系列组织对这些形存而神散、人丁稀少的“地上宗教”极尽行拉拢、钳制之能事。相对而言，少数民族的“地上宗教”的发展条件要好些。但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共的限制甚至打压。少数民族的“地上宗教”的传播范围一般仅限于本民族生活地域。少数民族整体力量的不足，决定了少数民族“地上宗教”的弱小。

相反，汉族地区的各种“地下宗教”虽饱遭打压，却因为没有“地上宗教”所受的种种限制、腐蚀和掣肘，发展速度一直是有增无减。我曾因为信仰团体的朋友撰文鸣冤而被抄家毒打和非法劳教，和此信仰团体的朋友同囚一处。与我同在一囚室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国保警察审他时，曾对他说，你们的人数不是少了，而是越来越多了，而且还有年轻化的趋势。我所在的大队，确实有不少人很年轻。而且都是在该信仰团体被打压之后加入此信仰团体的。我所在的大队，有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人是“二进宫”。这些人告诉我，他们“一进宫”时（大约从零零年到零三年），队里所有的人平均年龄是四十五左右。而我与他们同囚之时（零六年到零七年），所在大队的所有人的平均年龄仅三十七、八。据一些针对所谓“邪教”而建的网站的相关资料分析，汉族地区的其它“地下宗教”的总人数也都在逐年增长。

汉族地区的各种“地下宗教”逐年壮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本文第一条关于“安贫乐道”的德性光彩产生机制之分析中，我已对各种“地下宗教”发展壮大的社会生态基础进行了一定的说明。广大普通民众身受着专制统治的重压和重重剥削，很多人已安于贫贱。生活普遍不如意的他们，需要从宗教中获得生活信心和感情慰藉。宗教为他们营造了美好的精神家园，他们的信仰同时也是其生活状态的精神支持。当他们有了生活困难和不虞之灾时，还能获得其他信仰者的帮助。这些，都使他们对所信宗教产生强烈的归属感。需要这些的，不惟是普

通民众。一些官僚权贵阶层中的德性高洁之士，何尝不需要这些。关于官僚权贵阶层中的高洁之士的德性色彩的大致产生条件，我在本文第一条已有论述。官僚权贵阶层中的高洁之士的德性色彩的大致产生条件中，基本具备了走进宗教的客观心理因素。这些遍布各阶层人们在享受宗教所予的种种美好时，不因高低贵贱而有别。宗教所予的种种美好都是中共不可能给他们的。不仅不给他们，还要强制他们放弃。他们怎肯放弃。大陆所有的“地下宗教”都饱遭打压，却都以非暴力方式顽强抗争。他们的人数在不断增长，这和他们坚韧不屈地进行非暴力抗争有着密切关系。他们与中共抗衡至今，纵然谈不上胜利，却终归没有失败。他们以各自所特有的非暴力抗争方式，感动并教育了相当一部分大陆民众，并在世界很多国家赢得了很好的声誉。

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地下宗教”自身不是没有问题的。譬如，他们所制作的对中共进行揭露的书籍、材料，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有一些不符实之处。他们对中共的揭露抨击，多从本团体立场出发，不是十分在意广大民众的所思所想，他们对中共的批判立场和多数民众对中共的批判立场很不相符。而他们所制作的最大限度地排除了本团体立场的揭露抨击中共的书籍材料，又多有断章取义的成分，逻辑性不强，切不中要害。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虽然，他们自费制作很多宣传材料，初衷都是好的，却使不少民众反感。我曾多次亲眼看见，他们省吃俭用挤出资金、耗费很多精力制作的材料，被人信手一掷，抛在地上。

尽管，“地下宗教”自身有着一些缺欠，但整体而言，“地下宗教”的存在，在积累非暴力斗争经验、揭露专制政权的罪恶、消解专制政权的能量、加速专制政权的瓦解、鼓舞其他受压迫民众的反专制的勇气、整合民间力量、促进多元化社会的形成、推动和平民主转型等各个方面都是有积极意义的。最重要的是，各种“地下宗教”的广泛发展，对飞速滑坡的大陆道德，起到了极其重要的阻遏作用。各类宗教团体在专制黑暗中显现着的信仰光彩，使得愈来愈多的沉于物欲、迷于权欲的灰暗心灵被召唤、从堕落的泥沼中回升并焕发出道德的热力。而道德的回升、私心的收敛、物欲的淡化等因素是增强全体民众的社会责任感、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的重要条件。只有很多民众有了比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民主转型才能最为顺利地顺利完成。毫不夸张地说，对飞速滑坡的大陆道德的阻遏，是当今大陆各种“地下宗教”为民主转型和未来中华所作的巨大贡献。各类宗教尤其是“地下宗教”的广传，使这一被专制黑云和物欲阴霾包裹着的灰暗时代镀上了信仰者所独具的圣洁光华。信仰者所独具的圣洁光华，与“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德性光彩，是各有姿彩而又交相辉映的。

（四）被专制之恶震荡、激怒的各个阶层的良知之心迸发出无法被遮掩的正义之光。专制势力为恶愈剧，正义之光愈强，这样相持下去，愈来愈强的正义之光必将汇集到某一邪恶目标点上，聚焦燃烧。

这一条，和第一条很有些相似。不同的是，在第一条中，中共所起的作用还是比较间接的。但在“用邪恶唤醒正义”方面，中共所起的作用直接的。由于中共专权者执迷不悟、在体制内外一律是排斥民主因素顽固坚持高压专制，加上愈来愈大的官僚权贵经济的“胃”和愈来愈大的部门权力、地方权力之“口”，日益处于弱势的广大民众还要饱受城管交通、凶警淫官等专制恶势力的直接的陷害宰割和打压欺凌。专制恶势力欲以民众为鱼肉，然而民众终究不是鱼肉。刀砍在肉上很舒服，砍在硬骨头上，便是刀挫骨损的两败俱伤。对民众任意欺凌肆意宰割N次，总会有那么一次要获得等量或超量的反馈。只要民众能保持敢怒不敢言的准奴隶状态，那些形形色色的专制恶势力就应知趣了。如果杨佳事件、邓玉娇事件还不能使专

制恶势力稍事收敛，总还会有人替老百姓还以颜色。

不过，你想让专制势力不作恶也难。人一旦成群，且没有足够的道德自我约束力和外在钳制力，与猛兽无别。对待猛兽，没有笼子也要用链子锁着。没有笼子，没有链子，猛兽定然要咬人伤人吃人。不能和美国比。一比就比得我们心烦意乱。我们在冷静时，好好看看自己的历史，有助于增长勇气 and 希望。我们没有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但我们总算还有孙中山。民主转型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只要还有和平转型之路，只有疯子才会用其它过激手段。但如果一切和平转型之路都被堵死，很多人会被逼成疯子。史海今事，历历在目，可察可鉴；果要顽固到底，勿谓言之不预。在此，我想再用本文前面的话对那些读到本文的钟情专制者敲一下：天道循环，相克相生；报是要报，时候不到。悖天逆理，必食其果。狂作孽，岂可活！？

灭亡，是一切专制政权的无可回避的终极命运。

因为，你消灭不了普遍良知意义上的“德性”，你消灭不了人们对种种自由权利的本能渴求，你消灭不了人们对心灵家园的向往，你消灭不了人们对强暴武力的本能厌恨，你消灭不了人们独处静思的道德自建本能，你消灭不了唤醒良知的自我反思力量，你消灭不了人们对欲望的克制潜能，你消灭不了人们对意境美的向往，你消灭不了人们对善良人性的后天性本能依恋。你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悖天逆理、胡作非为，都是要抛掷能量的，这些能量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反馈给你自身。你用实际行动给广大民众书写的反面教材，在不断增厚，很多民众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了专制之恶，自觉或不自觉的萌生出对正义、民主的渴求。专制恶势力一次次的暴虐之举，一次次的震荡、激怒着各个阶层的良知心，亿万颗被震荡、激怒的良知心迸发出无法被遮掩的愈来愈强烈的正义之光。一道道愈来愈强烈的正义之光，逐渐汇集到一点——此即民众精神力量的整合——一道道愈来愈强烈的正义之光，终将汇集到“专制”这个目标点上，聚焦点燃，在专制灰飞烟灭之时，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那些美仑美奂的精神光芒，我们会看到，平淡广泛的德性光彩，各具姿彩的道义之光，熊熊燃烧着的捍卫民主之心焕发出的夺目光耀，信仰者们的圣洁光华，和千万道强烈如电的正义之光织在一起，在民主中国大地上交相闪耀，撼人心魄……

作于 2009 年 11 月 1 日—4 日

（源于：民主中国）

《零八宪章》：中国人普遍性身份的宣言

——在《零八宪章》签署人荣获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第 23 届杰出民主人士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讲

陈奎德

主席、各位来宾：

今天站在这里，出席民主教育基金会对《零八宪章》签署人的颁奖仪式，我深感荣幸。这是

历史性的一刻。我回忆起一年多以前，当宪章面世之前近两个月，刘晓波先生传来宪章文稿征求意见。阅读之下，不仅想起了七七宪章，同时还唤起中国一百多年前“公车上书”的鲜活想象，想起了发生在今天开会的旧金山孙中山纪念馆周围的百年风云，甚至还追溯到更远的中国道统，从中听到东汉时期太学生学潮的潮声、明代东林及复社的士大夫的以道统学统抗衡政统的遗训，以及二十年前天安门广场《首都各界爱国维宪社会协商联席会议》的未遂之愿。接读文本，我已意识到这将是一份载入历史的文献。但即使如此，我仍然未曾预料到它会激发如此重要的反响，仍然没有意识到它会引来上万名前赴后继不顾身家性命的签署者，而且，迄今为止，在重重威胁利诱下，择善固执，无一退出。这在中国，是破记录之举。

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中国读书人，为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获得内地十八省与中国东北、台湾举人共一千二百多人联署，5月2日，康、梁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结在「都察院」门前，请为代奏，此举惊天动地。虽然上书被清廷拒绝，但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此，维新思潮风起云涌，“变法图强”成为主流，开启了戊戌变法及其之后中国宪政努力的一系列变迁。

今天在中国，从三百零三直到到一万人之众，在严酷铁幕下，把自己的真名签上《零八宪章》，实际上是中国经历百年曲折迂回之后，重续先贤薪火，再启变法革新。它象征着，在森严的暴政之下，出席一场公众集会，交托一份庄严承诺，投出一张神圣选票。但其重心，已不是奏请当局，而是诉诸民间；其签署者，也不再局限于知识精英，而是遍及各个阶层。

如此，《零八宪章》，进入了历史。

《零八宪章》的焦点，是普世性。

宪章，凝结了我们的基本认同。它表明，中国人并非异类，并非自外于文明人类的特色族群。我们同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的人一样，同样应享有人的尊严，享有言论、信仰、免于恐惧、免于匮乏的基本自由，同样应分享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和基本人权。

中国人也是人，不是特殊物种。我们首先是人，是地球公民，然后才是中国人。把中国人排除于宪政民主之外，是对国人的侮辱，是对我们每个人权利的冒犯。在基本权利面前，不存在自外于普遍人性的所谓“中国特色”、“中国国情”。

《零八宪章》，就是确立我们这一普遍性身份的现代宣言。

所谓中国特色的“三个代表”，未经我们同意，无权代表我们。《零八宪章》，经由我们自愿签署，才是代表我们价值认同的文明符号。同时，正如有签署者所强调的，他之所以毅然签署，是而且只是认同文本，不管其他签署者或未签署者是谁。这种“只认文本内容，不管人际脉络”的行为准则，超越了历来政治传统中那种“党同伐异”的无原则派系纠纷，彰显了现代政党政治的风范。在这一心态下的签署，就承载了现代文明真正的“重迭的共识”，界定了民主宪政的普世价值和判断标准。

《零八宪章》，是中国软实力的基本典范。

人们注意到，近年来，北京当局竭力向外推销自己的“软实力”，在“硬实力”支撑下，慷慨纳税人之慨，不惜以亿万民脂民膏，收购海外媒体以为喉舌，同时办起二百多所孔子学院，来势汹汹，洗脑天下，企图重建合法性。

不过，我可以在此断言，就是把这二百多所孔子学院加在一起，它们的软实力，也不敌薄弱的一纸《零八宪章》。这并非说宪章有多么高明，原因无他，仅仅由于它奠基于现代的基本常识上，它诉诸“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就赋予它不可摧毁的道义力量及合法性。而北京全球开花的孔子学院，除了是对中国古代先贤的第二次侮辱外，还可能是什么呢？它提醒人们的，无非是当年他们的批林批孔闹剧罢了。

只要深入思考一下软实力的原初涵义，我们当会发现，某事物的软实力，其实是可以由该事物被封锁的程度来界定的。被封锁愈森严，其软实力就愈强大。而《零八宪章》，正是由于其孕育了强大软实力，而被封锁禁闭的。谓予不信，那么，请解放《零八宪章》，让它与北京出钱的形形色色喉舌们以及孔子学院们，在话语市场上公开公平地竞争吧。在这里，当局的对开放宪章的恐惧将映证我对软实力强弱之势的判断。如若不服，请“推到这堵墙”，解禁宪章，公开竞争！

我想他们不可能有此胆识。其怯懦竟到如此地步，连拘禁和逮捕刘晓波先生的真正原因是《《零八宪章》》竟也不敢公开承认；面对全球滔滔舆论，只能以晓波近年来公开发表的文章入罪。而能发表这些文章，与当局当年与民间异议人士之间的某种默契有关，而且已持续多年。这次他们竟公然出尔反尔，打破默契，冒天下之大不韪，直接诉诸暴力。这就表明，所有的手段已经失败，图穷而匕首现，只剩下赤裸裸暴力镇压了。有鉴于此，与其愿望相反，这种逮捕所显示的，是其虚弱，而不是强大；是其失败，而不是胜利。是丧失软实力，而不是赢得软实力。

《零八宪章》，是中国公民社会的粘合剂。

李慎之先生曾判断，中国人迈进宪政民主的条件，在今天，“已经烂熟”。《零八宪章》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它把大家所拥有的“烂熟”的精神条件和诉求，凝结在五干言中。而这五千言，又将进一步发挥精神整合的功能，在构建中国公民社会的进程中，创造历史。

在此，我必须提到刘晓波先生、张祖桦先生等各位执笔者和签署者为此付出的代价。我相信，晓波所遭受的磨难，将成为十字架，为宪章运动注入了沉甸甸的道义力量，使之具有更广泛的价值认同和更深厚的道德感召力。

《零八宪章》，是公民维权的基准法典。

今天，人们日益体会到了，我们的权利，是高度相关的；倘若他人受难我们不伸出援手，那么，明日我们受难，也将孤立无援。我们将被切割开来，各个击破，普遍受害。因此，人溺我溺，守望相助，日渐成为共识。今天的中国民间，众目仰望的，不是管制我们的人，而是维护我们权利的人；不是官方典范雷锋王杰，而是民间英雄蒋彦永、胡佳、赵紫阳、鲍彤、高智晟、高耀洁、丁子霖、刘晓波。众人寻觅的，不是中央文件官方报刊，而是披露真相的博客网刊。一切社论官话，都成了笑料。一切谎言虚构，都成了废话。《《零八宪章》》的破土

而出，以权利为根基，凝结了人们的基本愿景。这份万人签署的重迭共识，划定了我们权利的范围，是公民权利的守护者，是政治合法性的基准标杆，是一次公开地系统地界定我们政治身份的当代宣言，是中国加入现代文明世界的身份证。

就共产国家转型的脉络看，从1917年共产主义在俄国得手，到1977年《七七宪章》出土，是六十年。与此平行，自1949年中共建政，到今年《零八宪章》成势，也是六十年。虽然，为政治过程算命是无稽的；但时间的长度，增加了变化的可能性空间，的确孕育了历史演化涵义。明乎此，不难判断，中国社会今日的成熟度，与东欧当年的社会成熟度，有其重要的比较意义，有其基本的相似特征。基于这种成熟度演化的宏观历史比较，可以断言，在本世纪上半叶，中国转型为宪政民主将是不可抗拒的。

从中国本身的历史脉络看，恰如刚刚过世的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指出：“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按照唐先生的大体算法，中国穿越历史三峡之日，也将落实在本世纪上半叶。

这当然不完全是巧合。可以预见，无论是与东欧苏俄的历史比较，还是观察中国现代的演变趋势，不管基于哪种脉络，我们都将看到《零八宪章》在中国大转型中所具有的枢纽地位。它正在成为当代中国民间的一面旗帜。它是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以适当的姿态，发出的适当的声音。仅仅基于这一点，它也已经镌刻在中国历史上了。谢谢大家！

（源于：纵览中国）

《零八宪章》与我的“爱情”

赵常青

【提要】 胡石根先生断然指出：“《零八宪章》绝不仅仅是一部历史文献！”的确，《宪章》绝不仅仅具有“历史文献”的意义，就如《权利法案》背后的故事是“光荣革命”、《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书写的是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光辉历史一样，《零八宪章》必将开辟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新纪元！

在我的简陋的书桌上，靠左边的位置摆放着一本书。

这本书的封面是天蓝色的，上面印有淡蓝色的中国地图图案，而辉映在这幅地图上面的四个镶红大字便是“零八宪章”。

是的，这是一本名为《零八宪章》的“珍藏本”图书，由张祖桦、李晓蓉两位老师编撰，由

香港开放出版社于2009年5月出版。2009年5月底，一位北京的朋友来西安送了我一本，捎书的朋友说：因为第一版印数有限，所以在大陆只有少数人才能得到。

■ 物以稀为贵！

今年的我虽然搬了好几次家，有两个月时间几乎连固定的住所也没有，但这本书却始终不离我的左右——它或者在我的枕边躺着，或者在我的旅行箱里躺着，或者放在我的书桌上，或者干脆就拿在我的手上。在我所有的图书里，除了《圣经》外，恐怕就数这本书让我如此如此地爱之不已了。

■ 爱之若何？

曰：若初恋，若寻之而不得、寻之又寻的爱情！

是的，《零八宪章》，我的美丽的“爱情”！

（一）其实，客观地说，早在二十年前，我就开始了自己的“爱情”历程。

彼时，我二十岁，如日之升，如月之华，朝气蓬勃、青春灿烂。在反思、批判与变革的时代主旋律中，我有了自己的思考，有了自己的忧患，继而便表现出切合时代脉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时间不长，胡星陨落，举国同悲。为革除千年老病，为挽救民族危机，我中国青年掀起了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之时代怒潮，希冀通过呼唤、呐喊、请愿乃至生命的抗争以求自由之花开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岂料执政当局竟搬来机枪坦克对付我血肉之躯，一时间枪弹乱发、碧血横飞、六月飞霜、万民染泪……在大屠杀和大清洗中，我亦被“反动”军警捆绑，重刑折磨后推进高墙电网“保护”下的秦城监狱。

但也正是在二十年前的这场被屠戮的民主运动中，我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爱情。在89年的五四游行中，我为游行队伍制作了第一面大旗，并亲自高扬着这面写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八个大字的旗帜行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此后，这八个大字便成了规范我、引导我所有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最高宪法，“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不仅仅成为我的政治初恋，而且成为二十年来我始终不渝的政治爱情！

1998年初，为了这份美丽的爱情，我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了南郑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的竞选，结果被汉中市国家安全局逮捕，不久便被汉中市地方法院盗用“人民”的名义判处我三年有期徒刑，使我成了中国当代史上因为竞选人民代表而被判刑的第一人！

2001年出狱后，我又继续从事民主人权活动，不料执政当局再次表现出它的野蛮性，于2002年底第三次加我以镣铐，并于2003年8月再次盗用“人民”的名义判我五年徒刑，并处剥夺三年政治权利！

这样，在从89学潮以来的二十年时间里，为了寻求民主、自由，为了我那美丽的政治爱情，我竟前后三次被执政当局赶进监狱，先后被十三所监狱（包括看守所）关押，失去人身自由比八年抗战时间还长。不仅如此，在监狱里，因为拒不认罪和抗拒改造等原因，我还先后被

监狱当局关过四次禁闭，睡过十个月的水泥地板！

Oh，我的民主、自由！

Oh，我的那凄美无限的政治爱情！

（二）但所有的打压都没有减少我对民主的热爱、哪怕一丝儿！

所有的磨难都没有摧毁掉我对自由的向往、哪怕一丝儿！

不仅没有一丝儿减少，而且相反，在经历了诸多的打压和磨难后，我对民主和自由的爱情更加浓烈了，因为我知道，得不到民主和自由，不仅我会经历那样多的苦难，而且我的孩子（尽管还没有）、我的邻居的孩子、我的朋友、同学、同事乃至一切中国公民的孩子（包括江泽民、胡锦涛的子孙）都有可能因为类似的制度性原因而去承受同样的灾难和磨难！

这是反人道的！

这是反人类常识的！

这样的苦难我们的下一代不应该再去承受！

这样的悲剧我们这一代必须演完！

也因此，我将继续自己的理想！我将继续自己的“爱情”！

（三）2008年10月12日，我收到了《零八宪章》的征求意见稿，我是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看完这个文本的。我激动是因为《零八宪章》草案不仅勾起了我对既往苦难的回忆，而且在我内心深处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和共鸣。

《宪章》草案不仅总结了近代以来中国的经验和教训，不仅揭露了“新中国”乃“党天下”的实质，不仅历数了执政党执政五十年来所制造的人权灾难，而且直接剖析了中国社会“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的“政治现实”。尤其重要的是《宪章》起草人系统地重申了“六项基本理念”即“自由、人权、平等、民主、共和、宪政”，这使我想起了1989年我为游行队伍所扬起的大旗上面所写的八个大字——“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我想我在89年所提出的“八字宪法”与《宪章》草案的六项基本理念在精神上是完全相通的，只不过《宪章》草案更为系统地进行了解释和建构，有着更为缜密的政治哲学基础。

读罢《宪章》草案，我以拥抱恋人的态度热烈的拥抱了“她”，随后我积极的参与到《宪章》草案的讨论和修改中，最后在12月上旬我向《宪章》发起人表示愿意以“中国公民”的身份签上我的名字——尽管当时我还处在政治权利被剥夺的时期！

2008年12月10日，在《世界人权宣言》发表六十周年的纪念日，由303位中国公民签署的《零八宪章》终于向全世界庄严公布。当我在网络上看到自己也成为首批签名人之一时，我

的心里真是有些骄傲。不过，当看到发起人将我的身份说成是“作家”时，我的心里又感到十分的不安，我哪发表什么作品呀，我只不过是一个热衷于寻求理想的普通中国公民而已，说我“作家”，不仅使我有“滥竽充数”之嫌，就是警察先生也会笑话我的（果然，不几天时间，警方就对我进行了传唤，开口便是“哎呀，你现在成了‘大作家’呀……”把我弄了个面红耳赤……呵呵！）

尽管我的身份被搞错了，但我还是十分高兴，我感到在寻求理想的道路上我不仅不孤独，而且“同志们”越来越多，在此情况下，我咋能不为新诞生的《零八宪章》而激动呢？我咋能不为自己早已拥抱的理想和爱情而欢呼呢？！

（四）马克思在草拟《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宣布“共产主义”象“幽灵”一样“徘徊在欧洲的上空”。的确，“共产主义”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折磨人类的“幽灵”，这个幽灵至今还在中国大地上游荡着、肆虐着。但是《零八宪章》一经诞生便如惊雷、如闪电、如旋风一样给游荡在中国的“共产主义幽灵”以沉重打击。在《零八宪章》面前，奉“共产主义”为圭臬的执政当局如临大敌，一阵手忙脚乱后，便开始了全局性的围追堵截——

先是拘押了《零八宪章》主要发起人和起草人刘晓波先生；同时传唤了《宪章》的另一位主要发起人和起草人张祖桦先生，并查抄了他的家；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对《零八宪章》签署人进行了大面积的传唤和讯问。

同时调动大量“五毛党”人对互联网进行“信息”过滤和技术屏蔽（《零八宪章》初公布时，随便一个引擎搜索都会是成千上万条甚至几十、几百万条，但现在在“谷歌”中输入“零八宪章”词条，只有几百条相关信息且多为负面信息，而在“百度”网站中则连一条也搜不出来）。

不仅如此，各层各级各单位还或明或暗地开展了对《零八宪章》的清剿活动，秦晖、徐友渔、刘军宁等自由主义学者均分别“被谈话”或“内部警告”，北大法学院的头头甚至发邮件要求全院师生抵制《零八宪章》的影响。

到6月23日，北京地方当局更是明目张胆地正式逮捕了《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人刘晓波先生！

但是——

但是当局的围追堵截和高压态势并未能阻止《零八宪章》的迅速传播，相反，自第一批303人签过名后，又有第二批409名、第三批519名、第四批1183名真名实姓的中国公民跟了上来……截止2009年10月2日，签名支持《零八宪章》的中国公民共有十六批，总计人数接近10000人。签名人中不仅有男性，也有女性；不仅有老人，也有学生、甚至是中学生；不仅有汉族人，也有少数民族人；不仅有高层知识界、文化界人士，也有下岗职工和进城农民工；不仅有持不同政见者、维权人士、宗教修炼者，也有中共党员、官场人士及军人；——犹如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先生所说的那样“《宪章》所提出的观点有着广泛的支持度”。

令人难忘的是，在这场伟大的签名运动中，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情。有许多人是在突破

了重重心理障碍、克服了种种心理恐惧的情况下才完成签名“程序”的，如上海的波斯小昭（唐小昭）女士就经历了反复的心理斗争，最后经过一场“花若听见，花也溅泪；鸟若听见，鸟也惊心”的“嚎啕大哭”后，若凤凰涅槃、若浴火重生，毅然决然地在《零八宪章》上签署了自己的大名……！（参阅波斯小昭《大哭一场，签上我名》）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有的人不仅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且以不可抗拒的勇气走上街头宣传和散发《零八宪章》，及至被地方当局拘捕，如河南南阳的刘沙沙女士……

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程上，《零八宪章》正以其独特的风景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团结在她的旗帜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正以其罕见的动力和勇气在这个古老的民族书写着新的历史、新的爱情和新的神话！

（五）至于我，不用说，既然二十年前就拥抱了这份爱情，二十年后，我自然会更加热烈地拥抱这份爱情！

前面说过，《零八宪章》公布后，官方开始传唤所有能够找得到的签署人，我当然也未能“漏网”。不过，为了保护《宪章》的主要发起人，我始终保持自己“一问三不知”的既定方针。当然，由于自己是首批签名者，我无法说自己是从互联网上看到文本并签名的——而是说有无名人士将《零八宪章》发到我的邮箱里来征求签名的，我认为《宪章》代表了我的政治诉求，所以我便签了名；而对于所有其它问题如“谁是发起人？”、“谁起草的？”等等我一概回答“不知道！”

但是6月23日，北京地方当局对刘晓波先生的正式逮捕引起了我的巨大愤怒！

还在学生时代我就对刘晓波先生甚为尊敬。我读过他的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特别是他所写的《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给我的影响非常大（因为这本书，我本来特别敬仰的李泽厚先生开始在我心灵的圣殿上倒塌）。89学潮中，他以“广场四君子”之一的身份见证了当代中国最黑暗的一夜，六四之后，他被清洗……二十年来，他过着一种入狱、再入狱、被骚扰、再被骚扰的生活。但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刘先生始终不渝地在做着自己的批判、呐喊、牺牲、奋斗，这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真是“罕有其匹”的现象。

2008年12月9日，刘晓波先生又因为起草《零八宪章》而被北京当局拘捕——本来我以为当局在对他进行一段时间的监视居住后就会恢复他的人身自由，却想不到在进行了半年多时间的拘押后，当局依然罔顾民间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强大呼声，仍然对刘晓波先生执行了正式逮捕——呜呼，是可忍乎？！尤其，晓波先生是因为《零八宪章》被逮捕的，而《零八宪章》又是什么呢？她是我的“八字宪法”呀，她是我为之奋斗了将近二十年的“爱情”呀——当局要扼杀我的爱情，行吗？当然不行！为了我那美丽的爱情，我必须挺身而出——没有什么可商量的！

于是在今年6月29日和7月1日我分别在《博讯》和《民主中国》杂志上连发了两篇文章，我认为逮捕刘晓波就是逮捕《零八宪章》。在刘晓波先生被逮捕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每一个签署人都应该站出来去勇敢地承担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我呼吁所有的签署人都能够像圣雄甘地那样，以实际行动开展一场非暴力的“自请入狱”运动，从而证明我们与刘晓波先生的不可分割，证明我们对于《零八宪章》的爱情和忠诚！而为了方便当局对我的逮捕行动，我

在文章的最后，特意公布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果然，文章刊出的第二天，穿着便衣的“国保”先生们便找上门来。在饭桌上，他们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我“脑子进水了，有毛病”，警告我说“这样下去很危险！”，我说：“你们也不用说多余话，直接逮捕我好了，我愿意为《零八宪章》付出任何代价！”想不到他们却说：“看把你玩的大的，你说逮捕你就逮捕你，你不让逮捕就不逮捕，你以为你是谁呀！”在他们“拒绝”逮捕的情况下，我之“抗议”无效，“自请入狱”行动也就只好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六）窗外的天空正飘着羽毛似的雪花，今年的冬天似乎来得特别早，还没到正常供暖时间，就已经下了两场雪，而且是两场很威风、很暴虐的雪。

■ “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

不知正在牢狱受难的晓波先生现在情况怎么样，以我数度牢狱生活的经验，只能以“冷酷”二字加以总括。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古拉格群岛”是“苦难”的代名词，中国的劳改营也绝好不到哪儿去，甚至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更加疯狂的冷酷性和残酷性。不幸的是刘晓波先生现在正身临其境——正在承受由中国共产主义庞然大物所强加给他的铁血牢房，正在为《零八宪章》编织着一部不朽的传说！

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想到狱中的晓波，再看看摆在我面前桌子上的《零八宪章》，我感到自己的眼睛有些湿润，甚至，此时此刻，泪水竟然无声无息的顺着面颊淌下来……对于一个四十岁的男人来说，眼泪也许是不合适的，甚至会令人笑话的，但是谁又能否认得了这眼泪不是我的呢？谁又能否认得了我现在的心里很难受呢？没人，连上帝也不会否认的！想一想吧，在从“民主墙”至今的三十年多年时间里，有多少中华儿女在为这个国家的民主理想去坐牢、去流亡甚至直接付出生命的代价呢？！魏京生、徐文立、刘青、胡石根、王丹、秦永敏、王有才、胡佳、刘晓波等等等等，这个名单能列得完吗？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能不让人触目惊心吗？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能不让人黯然下泪吗？

但泪水是必须擦干的！

■ “革命”确未成功，我们必须“努力”！

擦干了眼泪，我再次拿起了《零八宪章》，再次翻阅了其中的六项“基本理念”和十九条“基本主张”，再一次感觉到了她的厚度和分量！

前几天我曾与友人一块去看望了曾被中共当局一口气关押了将近十八年的胡石根先生，在谈到《零八宪章》时，胡先生断然指出：“《零八宪章》绝不仅仅是一部历史文献！”的确，《宪章》绝不仅仅具有“历史文献”的意义，就如《权利法案》背后的故事是“光荣革命”、《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书写的是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光辉历史一样，《零八宪章》必将开辟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新纪元！

尽管当局逮捕了刘晓波，并对《宪章》主要发起人的张祖桦先生给予常年的全天候监控，但

这种政治高压并不能扼杀《宪章》的生命力，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宣布自己的信仰、尊严和承诺！

今天（11月13日）早晨，西安警方还给我打电话说想找我“聊聊”——电话那边说“能不能见个面，咱们交流交流”——有什么可“聊”的，有什么可“交流”的，无非是想了解我的动态，从而更好地控制我罢了。我想借此机会告诉警察先生：有时间的话多读会书，多研究一下200多年前的《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多研究一下60多年前的《世界人权宣言》和40多年前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多研究一下《零八宪章》，我可以免费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并免费充当这方面的顾问！若要问我将来有何打算，我也会坦诚相告：开展《宪章》运动，将“爱情”进行到底！

■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在《零八宪章》面前，我的曾经的政治爱情，不仅获得了新的形式，而且必将增添新的内容。我相信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中国——也是我的那古老的祖国必将焕发出新的生机，必将开辟出骄傲于整个人类的光辉前景！

2009年11月13日

（源于：民主中国）